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丘吉尔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小引

1938年9月底,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踌躇满志地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许多人以为此举赢得了一代人的和平。在一片颂扬声中,有一个人却忧心忡忡地说:“这种姑息政策究竟是制止了还是鼓励了更加贪婪的欲望,到明年今日便可见分晓。”果然,不出半年,希特勒就出兵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撕毁了慕尼黑协定;又不出半年,波兰遭到大举进攻,迫使英法对德宣战。这个唱反调的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丘吉尔出身名门,祖先马尔勃罗公爵战功彪炳,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保守党领导人之一,曾任财政大臣。母亲珍妮·杰罗姆是美国人,但由于她的母亲,即丘吉尔的外祖母,有四分之一的易洛魁人(北美洲印第安人)血统,因此丘吉尔的血统并不“纯正”。

丘吉尔1874年11月出生于牛津郡的布伦海姆宫,早产了两个月。命运注定他一出世就要为生存而斗争。先天不足使他体质羸弱,毛发稀疏,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他是靠后天的刻苦锻炼,才得以克服身体上的缺陷。他后来不仅能游泳、击剑、打马球,而且还成了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家之一,活到了90岁之高龄。

1940年5月10日,当纳粹德国以压倒性优势的兵力从陆空两路入侵荷兰和比利时、英国朝野震动之际,丘吉尔临危受命,以65岁的高龄,肩负起英国战时首相和三军最高统帅的重任。

丘吉尔素来以反对绥靖政策著称。30年代,绥靖政策盛行一时,有些国家在德国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面前还抱住和平幻想不放。他作譬喻说:“每个人都认为,如果他能给鳄鱼以足够的食物,鳄鱼就会到最后才来吃他。”他曾一再敦促政府面对现实,不要让和平、裁军的海市蜃楼蒙住了眼睛。可是这些话都被当权者视作耳边风。直到战争爆发后,长期受绥靖派蒙骗的人才如梦初醒,不得不惊服丘吉尔的预见。

丘吉尔就任首相后,在向议会作的首次演说中就坦言直陈,他说:“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你们问,我们的方针是什么?我就说:是以上帝赐予我们的全部精力,竭尽全力在陆海空作战……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因为得不到胜利就得不到生存。”他不仅是这样想、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上任之初所能运用的唯一有力武器就是他的辩才。他通过公开演说,有力地鼓舞了本国同胞。

接着,荷兰失陷了,德军向西直指法国北部;比利时又投降了。马奇诺防线成了不起作用的死工事。5月底开始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军33.5万多人的装备和重武器全部被迫抛弃。在这一紧急时刻,丘吉尔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他以明确的措辞、震撼人心的力量,重申了英国决心战斗到底的坚强意志。他说:“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这个岛屿或它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这是我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的——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仍要在英国舰队的武装保护之下,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用它的全部力量和能耐,前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从8月开始的“不列颠之战”,使英国遭德国空军猛烈空袭达10个月之

久。9—11月，仅仅是对伦敦的轰炸就持续了57夜，平均每夜有200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首相官邸、议会大厦和白金汉宫都中了弹。丘吉尔始终以坚定的信心、充沛的精力，奋不顾身地指挥着这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他在下院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说：“敌人正在切实地部署入侵的准备工作，舰艇和驳船也正在不断地集中起来，他们随时可能向本岛大举进犯……我相信我们将打败目前威胁着我们的这次大规模进攻，并使敌人遭受严重损失。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将不怕牺牲，战斗到最后的一息。”丘吉尔的一位早期朋友艾默里曾写道：“温斯顿·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立战胜法西斯势力的战略目标时，丘吉尔知道，很重要的一条是必须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尤其重要的是要结成一个“伟大的同盟”。他对美国展开了大量工作，使美国先是撤销了中立法，后来又通过了“租借法案”。于是，英国在战争的危急关头得到了不可缺少的物资援助。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了一封4000多字的长信，分析形势，晓以利害，并重申英国为了击败纳粹和法西斯暴政，不惜遭受最大牺牲。他直率地说明了英国目前的财政状况，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驱逐舰、作战飞机和其他武器。他委婉地表明，英美两国的命运是不可分的。如果英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半途而废，那么美国也会来不及进行防御。他在这封信的结尾对美国总统说：“请你相信，为了正义事业，我们决心忍受一切痛苦，作出最大牺牲，而且我们也将因为我们是维护这一事业的斗士而感到光荣。我们满怀信心地把其他的事情留给你和你的人民去考虑，我们深信，你们一定能够找到将会为大西洋两岸的子孙后代所赞扬的途径和方法。”“总统先生，我深信，如果你认为摧毁纳粹和法西斯暴政对美国人民和西半球是一件大事，那么，你就不会把这封信看成是乞求援助的信，而将把它看作是一份陈述书，其中说明为了达到我们的共同目的而应当采取的最低限度的必要行动。”

丘吉尔把这封信看作是他生平写过的最重要的一封信。罗斯福接信后一个月就派哈里·霍普金斯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英会晤丘吉尔。霍普金斯说，丘吉尔的信使美国总统深入地沉思了两天，后来在一天晚上，他拿出了一整套计划，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租借法案”。

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丘吉尔在当夜便发表演说，表示政治上的分歧绝不许阻碍英苏两国进行推诚相见的合作。这是他最有影响的演说之一。他说：“在过去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那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要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面对着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这种情景，那一切都黯然失色了。”丘吉尔宣布，英王陛下政府已决定给予俄国和俄国人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他并且呼吁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朋友和盟国，请他们采取同一方针，并且同样坚持到底。他说：“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由于结成了反法西斯的同盟，英国的形势不断好转。1944年夏开辟第二战场时，丘吉尔曾想亲自随同登陆部队在诺曼底登陆，只是由于英王乔治六世亲自劝阻，才使他未能成行。

丘吉尔虽然是军人出身，又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可是他首先是政治家，而且还是具有全球观点的战略家。他的战略利益的落脚点，首先是在英帝国。

对他来说，争取和维持大英帝国的世界地位和殖民利益，是天经地义、至高无上的，为了这一目标，他可以一往无前。

丘吉尔对欧洲新出现的革命力量是极为敌视的。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不能撇开对现实政治的权衡。他在前后约半个世纪中，对苏联的态度就十分复杂。十月革命成功后，他坚决主张把布尔什维克“扼杀在摇篮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俄国内战仍在进行时，他竭力支持俄国的反革命势力，派联络官维持同邓尼金的联系，还运送 10 万吨武器去海参崴接济白俄叛军。他曾考虑过派远征军干涉，结果未成。这种坚持干涉俄国革命的行径使英国纳税人白白耗费掉 1 亿英镑，引起了极大非议。到 1920 年，他还主张用封锁来迫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屈服。事实当然证明他是徒劳的。

30 年代，他曾说过宁可要纳粹也不要苏维埃俄国，可是随着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日益暴露，欧洲的处境日益危殆，他转而敦促西方国家同苏联结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次年，他以在野之身访问美国，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接受名誉学位并发表演说时，又首次提出了“铁幕”一词。他说：“在整个欧洲，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降下了一块铁幕。在这条界线后面有着中欧和东欧各个古国的全部首都，……全部落入了苏联的范围……几乎每个国家都是警察政府掌权，迄今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都没有真正的民主。”他说各国共产党“对基督教文明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危险，……我们若不及早断然应付，将愚不可及”。这又暴露了他顽固的反共立场。50 年代，他又主张同苏联和平共处，以在东西方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和缓”局面。

丘吉尔认为这样的态度变化并非出自动摇或混乱，而是出自对不断变化的情况所作的灵活反应。一般的保守党人或者看不清问题的出现，或者无法采取求实的态度，而他虽然强烈反共，却能在关键时刻摆脱不适时宜的反共教条，比其他的传统保守分子更迅速地改弦更张。

不少传记作家都认为丘吉尔的个人特性是富有勇气和想象力的，智力超群，富有胆识，常有独创的见地。同时，他又是个自我主义者，顽固偏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是个赌徒，最喜欢冒险。他

的人生哲学也受到过达尔文的影响。他认为生命就是一场斗争，适者生存。因此他不相信什么永久的和平。他曾写道：“人类的历史便是战争。世界上除了短暂的、不稳定的间歇之外，从来没有过和平。”

丘吉尔

祖系家世

他有一个显赫的家庭。祖父是第七代马尔勃罗公爵，外祖父是美国地产业富商，父亲曾任保守党的财政大臣，所以他被认为是“口含银匙出世的”人。

本书主人公温斯顿·丘吉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肩负英国战时领袖之重任而著称于世。他一位祖先的名字也叫温斯顿·丘吉尔，那是生卒都在17世纪的他的第九代祖先，也是丘吉尔家族中鼎鼎大名的第一代马尔勃罗公爵约翰·丘吉尔的父亲。17世纪的温斯顿·丘吉尔不是贵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替国王查理一世同克伦威尔的军队打过仗。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建立政权后，这位身为保皇派军官的温斯顿·丘吉尔自然碰上了厄运。到1660年，逃亡在法国的查理二世回来，王朝复辟，温斯顿·丘吉尔时来运转，后来又被封为爵士。爵士仅是一种荣誉称号，并不算贵族。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1620—1688）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德雷克生育了十几个孩子，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日后成为第一代马尔勃罗公爵的约翰·丘吉尔，以及成为约克公爵情妇的阿拉贝勒·丘吉尔。约克公爵是国王查理二世的弟弟，又是王位继承人。查理二世虽然拥有不少情妇，也有不少私生子，可是没有正式的王储。于是约克公爵便成了英王詹姆士二世。约翰·丘吉尔（1650—1722）原是约克公爵府中的侍从，后从军任骑兵上尉。他曾在丹吉尔（摩洛哥）立过战功，回到英国后，凭他的头脑机灵、相貌英俊，以及同王室的关系，竭力在宫廷中钻营。不少传记作家都谈到，他经常同宫廷贵妇人厮混，凭此获得不少好处。国王查理二世众多的情妇中有一位名叫克利夫兰的公爵夫人，她生了不少私生子，其中的一个私生女儿就是这位英俊的青年军官。有的传记作家这样描绘约翰·丘吉尔：他卓越高傲、野心勃勃，不仅是个勇猛而聪明的军人，而且是个更为勇猛而聪明的假公济私者。他又是耍阴谋诡计、见风使舵的能手，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背信弃义也在所不惜。约克公爵府中有位宫女名叫莎拉·杰宁斯，同公爵前妻所生的女儿安妮公主十分要好。莎拉·杰宁斯也是个野心勃勃、对权势财富谋求甚殷的人。约翰·丘吉尔和她结婚后，他俩凭着在王室和贵族中的关系，平步青云。约克公爵于1685年继承王位，成为詹姆士二世后，前国王查理二世的一名私生子蒙默斯公爵欲谋取王位，兴兵反叛。约翰·丘吉尔自告奋勇，领命去镇压。他击败了蒙默斯公爵，并将其斩首，因而受封为男爵，晋升于贵族阶层，同时还在军队中领取了少将军衔。可是当詹姆士二世于1688年的一场政变中，即所谓“光荣革命”中被推翻时，约翰·丘吉尔便转而支持前来继承王位的荷兰执政者奥兰治亲王，即威廉三世。后者于1689年加冕时，封约翰·丘吉尔为马尔勃罗伯爵。威廉三世本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婿。他的妻子玛丽公主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儿，也是安妮公主的姐姐。不过威廉和玛丽都信奉新教，而詹姆士二世却是天主教徒。威廉三世统治英国12年后，于1702年逝世，因无子嗣，小姨子安妮公主继位为王。这对约翰·丘吉尔夫妇当然是莫大喜事。果然，安妮女王登基不久就把约翰·丘吉尔的伯爵爵位加封为公爵，并且任命他为总司令。至此，马尔勃罗公爵的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公爵是贵族中等级最高的爵位。约翰·丘吉尔成了第一代马尔勃罗公爵

后，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颇有建树。1704年他率军在布伦海姆打败了法国及其盟国，还打了其他几次胜仗。为此他得到安妮女王的赏赐，在伍德斯托克地区封地数千英亩，赠金50万英镑，以修建豪华的宫殿。这座被称作布伦海姆宫的雄伟建筑实际上成了马尔勃罗公爵的纪念碑，其精致华贵的程度据说是空前的，比皇宫还漂亮。

当时马尔勃罗公爵的名字在欧洲大陆到处都是令人敬畏的。在公爵夫人莎拉·杰宁斯的襄理下，马尔勃罗公爵不仅权势倾城，财富也可敌国。也算是物极必反吧，公爵夫妇权高位尊所滋长的骄横和贪婪，使他们树立了不少敌人，更招致了安妮女王的厌烦。30年的深交一下子冷淡了下来，后来公爵又被控侵吞公款而遭放逐至德国和荷兰，直到安妮女王于1714年逝世后才回到英国，从新王乔治一世手中获准恢复一切官职。第一代马尔勃罗公爵于1722年病逝，他的妻子莎拉·杰宁斯于1744年才逝世，享年84岁。

第一代马尔勃罗公爵逝世后，由于儿子早逝，英国议会通过一项特别议案把公爵的爵位和领地传给其女儿及其后嗣继承。因而他的女儿亨丽叶塔，即戈多尔芬伯爵夫人，就成了马尔勃罗女公爵。

女公爵的妹妹安妮是第三代森德兰伯爵查尔斯·弗兰西斯·斯宾塞的夫人。安妮的长子罗伯特·斯宾塞继承了第四代森德兰伯爵的爵位，次子查尔斯·斯宾塞则后来继承他姨母的爵位，成了第三代马尔勃罗公爵。那是由于女公爵没有直系继承人，因此爵位传给了斯宾塞家族。自此以后，这一公爵爵位便在斯宾塞家族内一代代直系继承下去，一百多年后传到了查尔斯·斯宾塞的玄孙，即第七代马尔勃罗公爵约翰·温斯顿。他便是本书主人公丘吉尔的祖父。

在第五代马尔勃罗公爵时，1817年国王特许将家族的姓氏斯宾塞加上丘吉尔这一姓氏，成为斯宾塞-丘吉尔，以使家族姓氏同其显赫的祖先第一代马尔勃罗公爵的姓氏联系在一起。如果当年没有这样做，那么本书的主人公恐怕也不会名叫丘吉尔了。

从第一代马尔勃罗公爵逝世以后，这个爵位便没有再闪过过光彩。中间几代马尔勃罗公爵大都是王孙公子类型，沉湎于饮宴游乐，逐渐将祖传家产挥霍殆尽，有的在临终时还负债累累。

19世纪后期的英国，尽管工业成长和城镇扩展使社会逐渐改观，并对大地主的地位和威望构成一定的威胁，可是仍有相当多的政治力量和权势财富掌握在贵族地主们的手中。公爵们则是其中的领袖。可是有些公爵由于挥霍过度或经营不当，结果陷入债台高筑的困境。第七代马尔勃罗公爵便是一例，他于1875年把家族在邻郡白金汉拥有的土地卖给了富有的犹太金融家费迪南·德·罗特希尔德，甚至还把祖传的珍贵宝石也送去拍卖。所余的财产只剩下了在牛津郡的约25000英亩土地，从中每年可收益35000英镑。1876年时英国首相狄斯累利曾对维多利亚女王说，第七代马尔勃罗公爵已“不像一位公爵那么富有了”。

第七代马尔勃罗公爵约翰·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是个拘谨、吝啬、严肃、笃信宗教的人。据说如果他不曾当公爵，倒很可能去当牧师。他给儿子写信也像在宣教讲道一样。他主持家庭也按照宗法家长制，譬如一家人进餐时须保持严格的礼仪，公爵还亲自动手为全家人，包括所有的孩子，切割和分配烤肉。

公爵夫人弗兰西斯在21年内生育了五男六女，其中三个儿子夭折，另外

两个儿子也都没有活过 50 岁，而所有的女儿却都高寿。公爵的长子乔治成了第八代马尔勃罗公爵，次子早亡，第三子生于 1849 年，取名伦道夫·亨利·斯宾塞-丘吉尔。他就是本书主人公丘吉尔的父亲。

伦道夫长相不很端正，暴突眼，小脑袋，在伊顿公学读书时常受同学们嘲笑，可是却也因此激励了他着力锻炼自己的机智和辩才。他就学于牛津大学，但学业平平。可是他在他父亲第七代马尔勃罗公爵的扶掖下，凭着自己的坚强意志和雄辩之才，也成了一位著名的政治家。24 岁时，他代表他们家族所控制的议员选区伍德斯托克，进入议会。他被称为伦道夫勋爵，并不是因为他本人已建立功勋，而是因为他是公爵的儿子。按英国规矩，勋爵是公爵以下的世袭贵族都可采用的一般称号，也是对公爵和侯爵的儿子或伯爵的长子所用的称号。在后一种情况下应用时如不连名带姓一起称呼，则勋爵一词只同名字联用，因此，他只能称伦道夫勋爵，而不称丘吉尔勋爵。

1873 年 8 月（伦道夫勋爵进入议会前一年），他在舞会上认识了美国姑娘珍妮·杰罗姆，两人一见钟情，不久便决定结婚。双方家长起初都反对这门亲事。身为英国贵族，却去娶一个美国平民，这在马尔勃罗家族史上似乎是闻所未闻的。女方的父亲莱纳德·杰罗姆是纽约的一名从事地产及股票交易的富商，要他同英国贵族结亲，虽不算最满意，但勉强可凑合。最后由于双方当事人的坚持，婚礼于 1874 年 4 月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内举行。莱纳德·杰罗姆从纽约赶到巴黎参加婚礼，还置办了嫁妆和礼物，公爵夫妇则认为此事有失尊严而未去参加。

珍妮的外祖母生过六个女儿，个个都是黑头发、黑眼珠，颧骨高突，有着明显的易洛魁（北美洲印第安人）血统，但是其起源已很难查清，可能在更早的几代中有易洛魁血统的祖先。

伦道夫勋爵和珍妮·杰罗姆婚后不久便一起回到英国，居住在牛津郡的布伦海姆宫。生在纽约长在巴黎的珍妮，对新的生活环境很不适应，感到极为枯燥。到秋天她已经大腹便便，不能去参加伍德斯托克的一些欢乐的舞会了，但是她仍和众人一起去打猎。11 月下旬她在几次外出活动后，由于受到震动，28 日夜就感到腹部阵痛。请来医生后，经过星期日一天的折腾，还是未能推迟产期。30 日星期一凌晨 1 时半，珍妮生下一个早产的男孩。这个只有七个半月便呱呱落地的男孩便是本书的主人公丘吉尔。他的全名是温斯顿·莱纳德·斯宾塞-丘吉尔。其中，莱纳德是他外祖父的名字。

伦道夫勋爵身为议员，不能常住故乡，便把家搬到了伦敦。珍妮由于曾在巴黎居住多年，对欧洲上层社会的社交应酬相当熟悉。她本人年轻貌美，风度优雅，因而在英国的上层社会也赢得了不少朋友。伦道夫勋爵夫妇有着可观的经济收入，足以供他们应付所需的开支，所以生活得相当如意。

可是不久，在贵族之间露出一件涉及伦道夫哥哥乔治（即第八代马尔勃罗公爵）的丑闻，闹得满城风雨。伦道夫为了维护哥哥的情面，轻率地得罪了王太子，即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结果招致贵族们的联合抵制，都和他断绝往来。这件事不仅使马尔勃罗公爵和夫人十分难堪，也使伦道夫勋爵夫妇难以下台。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公爵决定接受狄斯累利首相的邀约，担任爱尔兰总督，并把伦道夫一家也带往都柏林，让他充任私人秘书。三年后，即 1880 年的大选中，狄斯累利政府被击败，爱尔兰总督也卸任，全家回到伦敦。伦道夫一直未放弃议员席位，回到伦敦后，参加政治活动更加积极。在自由党的格雷斯东担任首相期间，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同另外一些独立的保

守党人一起组成了“第四党”，提倡一种更符合社会政治改革需要的新保守主义。1884年他任保守党社团全国联盟主席，主张让更多群众参加保守党，这就同党魁索耳兹伯里勋爵有了分歧。但是保守党自1880年大选失败后在议会中便没有足以与自由党的格雷斯科特抗衡的发言人。辩才出众的伦道夫·丘吉尔便应运而起，在议会辩论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他发表的演说都经过精心准备，演讲时又运用了演员的技巧，因而博得了很多人的赞扬，不久便成了全国知名人物。

1885年保守党上台，首相索耳兹伯里考虑到伦道夫·丘吉尔的声望，让他担任了印度事务大臣。同年11月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格雷斯科特再度组阁。可是，后来他的一项提案遭到了否决。

1886年7月又是一次大选。这次保守党获胜，索耳兹伯里再任首相，他任命伦道夫·丘吉尔为财政大臣兼下院领袖，这是伦道夫在政海宦途上的最高成就。可惜的是他身为内阁核心成员，学有余而识不足，本应辅佐首相却经常闹分歧，越来越难合作。他在制订预算时主张大幅度削减军队开支、减少税收，这等于在推行反对党格雷斯科特的路线。他还插手外交政策，公开要求同德国、奥地利加强联系。他的主张在内阁中遭到强烈反对。可是他自恃政府少不了他，达不到目的便以辞职相要挟。头两次索耳兹伯里都向他作出了让步，而第三次索耳兹伯里首相感到把伦道夫·丘吉尔排挤出内阁的时机已经成熟，竟不动声色地接受了他的辞呈，使他目瞪口呆。他当财政大臣仅5个月，便脱离了内阁。

伦道夫勋爵后来也意识到以辞职相挟之失策，可是等到下次大选来临时，他的健康情况已极差，不再对政治前途抱有希望。1891年他远赴南非，一来疗养身体，二来对采矿业进行投资，然而他的健康情况并未好转。1894年他携同珍妮作环球旅行，年底回国时病情恶化，1895年1月24日病逝，那时他还不满46岁。

伦道夫勋爵安葬于布雷登的教堂墓地，那是不少丘吉尔家族成员安息之地。那年本书主人公丘吉尔才20岁。

伦道夫勋爵逝世之后，丘吉尔曾一度成了公爵爵位的假定继承人。由于伦道夫的长兄乔治是第八代马尔勃罗公爵，乔治的儿子即丘吉尔的堂兄便是第九代公爵。在第九代公爵有后嗣之前，丘吉尔便是第十代公爵爵位的继承者。如果他真的继承了爵位，就不可能成为日后英国大名鼎鼎的战时首相了。

学生时代

传记作家笔下的大名人，往往小小年纪即聪颖过人，样样鹤立鸡群。然而，他却从小缺少父母的关怀，由保姆一手带大，上学后，因性情孤僻、性格倔强、学业成绩不佳而屡遭体罚……

丘吉尔是由一位 40 岁出头的中年保姆一手带大的。他很少见到亲生的父母。这也是当时英国上流社会流行的风尚——夫人们生孩子而不抚养孩子。伦道夫勋爵忙于自己的政治活动，对儿子的存在毫不关心。夫人珍妮则忙于上流社会的社交应酬，间或来看儿子一眼。在丘吉尔的心目中，父亲只是一个板着面孔、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关于母亲，他在许多年之后这样写道：“我深切地爱着她——但却是从一段距离之外。”于是，有些传记作家便认为，丘吉尔之脾气倔强，同他年幼时缺少父母的关怀有关。

保姆伊丽莎白·安·埃夫列斯特太太对丘吉尔悉心教养，爱护备至，成了他幼年时代唯一的亲人。直到他长大成人后，还一直同老保姆保持着联系。按当时的习惯，年满 7 岁后便该进学校。

1882 年 11 月，丘吉尔不得不离开辛勤照料他的埃夫列斯特太太，被送进圣乔治学校住读。那是一所兴办才四年的设备较新的学校，装有电灯，建有游泳池，这在当时都是比较稀罕的。校长是一位年轻牧师，教学方法非常死板，对倔强的孩子经常运用体罚，甚至打屁股到了皮开肉绽的程度。

不足 8 岁的丘吉尔，来到圣乔治学校后，就陷入了悲惨的命运。他性情孤僻，性格倔强，对校长的权威并不顺从。他的成绩在全班总是殿后，只有地理和历史课还不错。学校发的报告单经常说他的品行是“常惹麻烦”，后来竟说是“极端恶劣”了。他上课时常迟到，在学业上败坏了学校的名声，成了学校中一名表现极差的学生，自然逃不了挨打。1884 年暑假他回家后，埃夫列斯特太太发现了他身上的答痕，并让他母亲看了，决定把他转学到南部海岸布赖顿的一所学校去。

虽然圣乔治和那位有些虐待狂的校长留给他的只是厌恶和痛恨，可是两年的逆境也锻炼了他的反抗性格。他决不屈服，他会叫、喊、打、踢，甚至有一次还把校长的一顶硬编草帽踩得粉碎。他会尽自己所能，使得压迫他的人不好受。他的这种反抗性格也曾一度对拯救西方文明起了巨大作用。1941 年 10 月，当英国处于单独抗击希特勒的境地时，丘吉尔在向小学生发表讲话时高呼：“决不屈服！决不屈服！”他认为不论战局暂时如何不利，也决不能投降，必须战斗到底。

进入新的学校后，丘吉尔生活得比过去愉快，学业也比过去有所进步，古典文学、绘画、英文、法文等课程都进入全班前七八名，并且能背诵不少诗歌和开始写文章。学校里还教骑马、舞蹈和游泳。主持学校的汤姆逊小姐对丘吉尔也还喜欢，只是对他的乖僻而古怪的性格、捉摸不定的火爆脾气，难以理解，因而他始终难以达到优秀学生的标准。

1886 年 3 月，他因患感冒转成肺炎，生命遭到了威胁。父母急忙赶来看他时，他已神志不清，奄奄一息了，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才告恢复。这场大病留给他很深的对人生的体会。

1888 年 3 月，他结束了在布赖顿的学习，由汤姆逊小姐陪同来到哈罗公学。按照家族的传统，他是应该进伊顿公学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伊顿公学毕

业。可是，鉴于哈罗公学位于伦敦郊区的山坡上，自然环境所提供的清新空气对他受过伤的肺部有益，因此让他改入哈罗公学。校长威尔登博士同意接受他入学，只是先须参加一场简单的考试，考察一下他在希腊文、拉丁文、代数、几何、算术等方面的程度。汤姆逊小姐已经给他补习过，估计不会有问题。但是考试时他过分紧张，当把一段拉丁文翻译成英文时，突然两眼一片黑，什么也写不成，交了白卷。希腊文和数学等科，还考得较好。校长认为他具有某些优秀的品质，当然部分地也由于他是伦道夫勋爵的儿子，最后录取了他。

他开始写自己的姓名时，当然写成 Winston Spencer-Churchill。由于字母 S 的位置靠后，他在哈罗公学学生中排名也在最后，他排队也排在最末。于是，他决定把姓名改写为 Winston S. Churchill。姓氏成为 C 字母开头，位置当然就大大提前了。可是学校当局始终把他作为 Spencer-Churchill 对待。

哈罗公学也是一所名牌中学，与伊顿公学齐名，可是出身名门的丘吉尔，学业上却始终居全班末座。学习成绩不佳，行为又很怪僻，这使得老师们莫名其妙。家里人都是为此伤脑筋，只有他的美国外祖父莱纳德·杰罗姆不发愁。外祖父曾写道：“让他去吧，男孩子在找到了可以显示才能的场合后，自然会变好的。”丘吉尔在哪些方面有过出色的表现呢，那就是当他显示无畏和勇敢的时候。所以后来大家觉得他也许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丘吉尔幼年时就喜欢玩打仗游戏，他拥有铅铸的玩具士兵 1500 个，时常将它们摆开阵势，进行交锋对垒。哈罗公学有操练和射击课程，使他非常高兴。对军事的浓厚兴趣，使他自然而然地参加了学校的特别陆军班。在这个班里学习，目标是将来报考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可是在一般同学的眼里，特别陆军班无异于“蠢才的天堂”。

那时候，出身名门的青年所热衷的职业，最普遍的是当牧师、法官和军官。前两种职业要求掌握经典学识，这正是丘吉尔的弱点。他不愿意在不感兴趣的学科上下功夫，只有历史课成绩很好，另外他善于击剑、游泳、骑术，因此选择军官职业倒也顺理成章。这也是他父亲伦道夫勋爵早就了然于胸的。

在哈罗公学读书期间，丘吉尔除了曾在一次全校公开背诵比赛中获过奖，在一次各公学参加的校际击剑比赛中得过银牌外，没有其他突出表现。同学迈内扎根形容他为“一个孤僻的孩子，经常独来独往，可是全学校的人都认识他”。这种孤僻的性格，还表现于他在学校生活中不喜合群。他虽喜欢游泳，但很少和同学们一起去，而往往独自一人在学校游泳池内游好半天。他也不喜欢参加由一群人一起玩的的游戏。

父母不常来学校看他，而每当他放假回家时，父母亲也经常不在家，因此他总有遭到忽视的感觉。唯一照料他以及比他小 5 岁的弟弟杰克的，是保姆埃夫列斯特太太。给他往学校里写信，提醒他这事那事、问寒问暖的，也是埃夫列斯特太太。

丘吉尔在年届中年以后回忆起学生时代的生活，认为“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毫无意义和毫无乐趣的时期，……生活中尽是不舒适、限制和漫无目的的单调”。

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是英国培养步兵和骑兵军官的主要学院，学费每年就需 150 英镑。学成之后虽然当上了军官，还得由家中供养几年。因此

那些未来的军官都是上层阶级的子弟。

丘吉尔为了参加这所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不得不作些准备。为了温习法文，母亲安排他到凡尔赛一家法国人家中住了一个月，又给他介绍了好几个法国朋友，经常相处，使他养成了大胆讲法语的习惯，不管讲得是否合乎语言规范。可是，他的数学知识有限，因而在最初两次入学考试中都失败了，于是父亲便把他送到伦敦一位名叫詹姆士的上尉开办的“紧急补习学校”，去作临时抱佛脚式的突击补课。詹姆士上尉对帮助学生复习应考颇有经验，他似乎在猜题押题上有特殊本领。丘吉尔听课时不专心，他是来学习的，可是他讲的话比老师讲的还多，好像是他在当老师，这引起了上尉的不满。不过他运用上尉的那套方法，在最后一次入学考试中幸运地考进了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成绩是刚刚及格，在 389 名考生中，丘吉尔名列第九十五，不够步兵军官的标准。他的考试成绩是：几何绘图 72 分，绘画 68 分，英国历史 64 分，数学 62 分，英文作文 62 分，法文 61 分，化学 41 分，拉丁文 18 分。只有几何绘图成绩稍好，因此他不能像他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去学步兵，只能学骑兵。伦道夫勋爵很不高兴，他在给儿子的复信中大加训斥，说他给家族丢了脸，是个蠢货，将来只能在社会上成为废物。丘吉尔在领受了父亲的责备后恭恭敬敬地回了一信，承认自己过去行为不当，答应将以在桑德赫斯特的表现来改变父亲对自己的看法。当他准备去军事学院之前，他发现自己已被转为改习步兵了。

丘吉尔进入桑德赫斯特之前（实际上是去“紧急补习学校”之前）发生的一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某种性格。那是 1893 年 1 月，他在婶婶柯奈利亚·温博恩夫人家中度假。他和弟弟及一位表弟一起在海边松林中玩耍追逐。他无意中跑到了一座架在一个峡谷上的木桥上，他发现木桥两端都被两个弟弟截住了，而他说什么也不愿意被捉住。他一见峡谷的斜坡上有几棵青松，便决定跳下去攀住松枝顺溜下去。可是青松枝干不坚实，一抓便断裂，结果他从 30 英尺高处摔下，昏迷了两天，一只肾破裂，治疗了三个月才复原。还有一次是在参加了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之后，去瑞士旅行期间。他和一位同伴一起在莱蒙湖中划船，划到远处后，他们便跳入湖中游起泳来。正当他们游得欢畅之时，突然刮起了大风，大风把小船吹远了。他们发觉不妙，赶快游过去想抓住小船，可是一次又一次，风力把小船越推越远，使他们一下子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丘吉尔意识到只有这只小船能挽救他们，便再鼓起余劲奋力游向小船，幸好终于让他一把抓到了船舷，及时得救。他把小船划回来，救起了他的同伴。事后他谈起这段经历时津津有味，觉得冒险使他获得了乐趣和满足。如果说他在学业成绩方面屈居人后，那么他在无畏无惧这一点上无疑是胜人一筹的。这恰好是军人所需要的品质。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开设的课程有战略战术、设防艺术、地图绘制、军事法和军事行政等。还可以从卷帙浩瀚的图书馆中读到有关战争艺术和现代战争史的大量作品。丘吉尔进入桑德赫斯特真是得其所哉。从小就对军事感兴趣的他，现在真的成了军人。学院从早上 6 时 3 刻到下午 4 时是教学时间，这中间有吃早餐和午餐的休息时间，下午 4 时以后就可以自由活动。晚饭是在食堂吃一顿正餐。晚上 11 时熄灯。学习之余，丘吉尔喜欢打猎、打马球，并且开始进行社交活动，经常在周末到他的一些贵族亲戚家中去参加舞会，结识了一些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那时他还不满 20 岁，虽然身材不高，仅 5 英尺 6 英寸（约 1.7 米），但是眉清目秀，容貌悦人，据说长得像他的母亲。他举

止优雅，谈吐风趣，因此也有不少人为他所吸引。丘吉尔就读于军事学院之后，学业成绩有了提高，父亲伦道夫勋爵对他的看法也逐渐转佳，开始允许儿子随同出外作客，甚至开始同他讨论政局。但是父子关系的这种改善，是发生在伦道夫勋爵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之时。

1894年12月，丘吉尔在军事学院参加了最后一次期终考试，在130名学生中名列第二十。他的成绩以骑术为最好，因而又萌发了他想当骑兵的愿望。

正在这时候，伦道夫勋爵于1895年1月24日在伦敦病逝了，他的逝世对丘吉尔是个巨大打击。丘吉尔总算及时赶到父亲的病床边，见了最后一面。那一年使丘吉尔更为悲痛的，是他父亲去世约半年之后他的老保姆埃夫列斯特太太也病逝了。他曾在她病危之时冒着暴风雨来看她。她去世后，他替她办完了一切后事，参加了她的葬礼后，才回去。丘吉尔一生都对埃夫列斯特太太怀着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从小是在她的关心、爱护和照料下长大的。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写到过埃夫列斯特太太，认为她对她的爱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无私的感情。丘吉尔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骑兵军官。他曾在社交活动中结识了一位显赫的骑兵军官约翰·布拉勃森上校。布拉勃森上校立过多次战功，而且是威尔斯王子的好友，这时正统率着第四轻骑兵团。丘吉尔想参加这支轻骑兵团，就请母亲出面写了封信给陆军总司令坎布里奇公爵，结果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刚从军校出来的年轻的丘吉尔，成了第四轻骑兵团的一员，开始了他的军官生涯。

从军官到记者

他以生命作赌注，酷爱冒险。可是，在布尔人的眼中，他竟只值 25 英镑。

丘吉尔于 1895 年 2 月当上了骑兵军官，他的团部驻在奥德肖特基地。骑兵军官的日子过得比较轻松，成天练习骑马，闲暇打打马球。军官薪俸每年仅 120 英镑，可是实际上若要维持所需的各项开支，还得另外补上 500 英镑。他要求母亲予以贴补，可是母亲也由于素来不知量入为出，自丈夫死后已负债累累，难以承担贴补。丘吉尔不得不考虑由自己来解决。

他当上军官后不久，年迈的陆军司令坎布里奇公爵到奥德肖特基地去视察，他被选中担任护卫。他在这次伴同坎布里奇公爵视察的过程中还见到了威尔斯王太子，并和罗伯茨勋爵有机会作了较长的谈话。罗伯茨是在十年前由伦道夫勋爵任命去印度当驻军司令的，现在已是元帅了。过了几个星期，丘吉尔被邀去会见约克公爵和夫人（即后来的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这些活动使丘吉尔对政界和政治萌发了兴趣。他想起了父亲的经历，于是更勤奋地阅读政治、历史方面的书籍。

骑兵军官每年有五个月假期，这是一大好处。一般骑兵军官都用作冬天打猎，丘吉尔则认为可以找到比打猎更有意思，而且更省钱的度假方法。当时古巴岛上正在打仗，西班牙军队正在镇压起义的游击队。丘吉尔想目睹这场军事行动。他请英国驻西班牙大使沃尔夫爵士帮忙，请西班牙陆军部长写了封介绍信给在古巴指挥西班牙军队的马丁内斯·德坎波斯将军，同时还与英国的《每日写真报》谈妥，刊登他从古巴发回的战地通讯。这样，他就于 1895 年 11 月偕同骑兵团中的另一位年轻军官里金诺·巴恩斯，先到纽约小住数天，然后到了古巴。

在纽约逗留的几天中，丘吉尔也得到很大的收获。他外祖父的一位好友，号称“坦慕尼协会之虎”的布尔克·考克伦招待了他们。考克伦是纽约民主党有势力的头面人物之一，他对老友的外孙十分照顾。想看什么，想玩什么，都一一予以办到。除了参观游览、会见宴请之外，丘吉尔还有机会同考克伦多次交谈，借此了解到美国的不少情况。丘吉尔还向考克伦请教了演讲技巧，考克伦的指点使丘吉尔大为信服，终生奉为指针。后来他成为战时首相时，对全国军民所作的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演讲，对挽救陷于孤军抗击纳粹境地的英伦三岛起了重大的作用，也因此被公认为出色的演说家。殊不知给他上第一课演讲课的竟是一个纽约市的民主党头子。

丘吉尔和巴恩斯抵达古巴后，马丁内斯·德坎波斯将军派了一名年轻中尉替他们安排。丘吉尔要求亲临战场，因此便在游击队经常出没的铁路沿线或搭车或坐船，还穿过原始森林，行程八天才到达一个被叫做“圣提·斯皮里托斯小镇”的据点。他们在那里参加了由瓦尔德兹将军率领的西班牙纵队。纵队拥有 3000 名步兵，两个中队骑兵和一个骡炮队。可是在这一带活动的游击队远远超过纵队的兵力。就在丘吉尔 21 岁生日那天早晨，纵队遭到了附近森林中游击队的袭击，丘吉尔第一次经受了炮火的洗礼。几天以后，又碰到一场战斗，霎时间他见到了枪弹横飞的惊人景象，营房被击中了，幸而他安然无恙。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活生生的人在战斗中被射杀的惨象。

他把在古巴的见闻前后写了五篇通讯刊登在《每日写真报》恩斯都得到西班牙政府的嘉奖，被授予红十字勋章，以表扬他们的勇敢。可是丘吉尔自

己承认，为了探险而作了那次几乎送命的冒险，实在是太鲁莽了。

回国后，丘吉尔在他的圈子里赢得了更多的名声。这位 21 岁的年轻军官不仅由于他刚从古巴战场回来，还由于他的战地通讯已得到很多人的赞赏，于是又成了各种宴会和舞会上的嘉宾，结识了不少各界名流。

他在古巴同西班牙纵队相处的短暂期间，队伍每天刚黎明，就蜿蜒行进在湿冷的森林中和起伏的田野上，到了上午 9 时则停止前进。吃早饭，然后睡午觉。全纵队人员（除了值班放哨的）都要睡四小时午觉，把一天中最炎热的时间睡过去。丘吉尔很乐于奉行，以至他后来一直喜欢睡午觉。他喜欢抽古巴雪茄烟也是始于此时。

古巴之行的收获激起了丘吉尔旅游异国并为报纸写通讯的浓烈兴趣。这时他已在考虑将来从政的问题。如果能常到海外去增加军事阅历，赢得几枚勋章，肯定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利。从事新闻写作还能使他名扬四海，因此还得出国。

他曾考虑去克里特岛，因为该岛岛民正在反抗土耳其统治，也想去南非，去埃及，但是都不行。不久，他所属的第四轻骑兵团奉命调驻印度，那里不是前线，没有战斗，自然也不会有军功勋章。但是，其他努力都没有成功，只得随团于 1896 年 9 月开赴印度。

第四轻骑兵团于 10 月间驻扎在印度南部的班加罗。这地方海拔 3000 英尺，早晚凉爽，白天十分炎热。丘吉尔和巴恩斯以及另一名中尉同住一座带游廊的西式平房，房子很宽敞，还有花园。侍候这三个军官的仆人有一大群：1 名男管家、2 名男仆、2 名园丁、3 名挑水人、4 名洗衣人，以及 5—6 名马夫照料他们的大小马匹。丘吉尔住了三间房间，闲来种种玫瑰花，采集蝴蝶标本，打打马球，过着十足的享乐生活。

由于天气炎热，轻骑兵团每天一早 6 时正就进行操练及其他训练活动，直至 11 时。中午可以睡大觉，下午 4 时以后打马球，这是这批英国军官的主要娱乐。通过打马球，他们还可以同印度的王公们交往。但是丘吉尔总觉得不可能同那些印度贵族真正结交，因此他对印度的生活并不喜爱。这期间他广泛阅读以进行自我教育。柏拉图的《共和国》、吉朋的《罗马帝国的衰亡》、麦考莱的《英国史》、叔本华的文集等书，都是他在印度的这一时期阅读的，他从读书心得中引出了一种人生哲学，用他一句简练的说法便是：“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总得钉在行动的或思想的十字架上。”这似乎带着悲观主义的色彩，可是他仍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仍渴望着到南非或埃及去建立军功。创造丰功伟绩仍属无上光荣。

在班加罗呆了九个月之后，他可以有三个月的假期。于是他经由意大利并稍作逗留后，回到了伦敦。

一天，丘吉尔在报上读到了印度西北边境爆发战斗的消息，他大为兴奋，觉得一显身手的机会又来到了。丘吉尔马上给当地的英军司令布勒德将军发去电报，要求将他调去。布勒德将军回电说编制已满额，但欢迎他作为战地记者前去西北边境。于是他先向轻骑兵团请假，接着同报馆联系，取得了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拓荒者报》记者的身份，急急忙忙赶到了印度西北边境。丘吉尔期望的是大战斗，可是实际上那里爆发的只是小战斗，尽管也十分惨烈。

西北边境上的游牧部落帕坦人袭击了英印驻军的一些前哨据点，英军便进行报复。游牧部落也有新式步枪，因此虽然是局部地区的冲突，但有时战

斗也很激烈。当布勒德将军于军营中设晚宴为这位战地记者洗尘时，有一段时间大家只能熄了灯在黑暗中进食，以确保安全。

丘吉尔既然随军，有时也免不了投身战斗。一次，他随一个旅向一座山谷进军。出发时 1200 人的队伍，途中几经分散，待他们到达一个荒凉的小村庄时，只有 4 名英国军官、85 名锡克族士兵和他本人了。村子中人畜全无，四周一片静寂，静寂得出奇。突然，远处山石间传来了喊杀声，成群的游牧部落从山上冲杀下来。紧接着，丘吉尔看到了英国军官和锡克族士兵被砍杀的惨象。他知道自己已不能置身于事外，便手持步枪向帕坦人开起火来。双方激战了不长时间，伤亡不少，帕坦人朝山石后面退去，英印军也赶快撤离。丘吉尔又幸运地未受损伤，但几乎被游牧部落活捉。这次冒险所遭遇的风险实在太太大，而且似乎并无必要。

不过丘吉尔并不这样想。他对这类冒险可能付出的代价是计算过的。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在发生冲突的沿线，人人都趴下掩护起来，唯有我骑着小灰马在沿线奔走。这也许很愚蠢，可我是在下大赌注。只要有观众，任何动作都不会过分鲁莽或过分高尚。如果没有观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见他以生命作赌注，目的是博取声誉，为日后登上政坛铺路。

他把亲身经历的西北边境的战斗，写成通讯寄给报社。通讯写得很生动，但没有完全透露事实真相。他不愿承认英印军队曾一度受挫，落入敌手的伤员遭到屠杀。也不愿揭示英印军队抓到敌人伤员时也同样残酷对待。他没有向英国公众透露英印军队使用了杀伤力很强的达姆弹。不过他曾对亲友谈到过他对这件事感到不悦。

他还把战场经历写成一本书，名叫《马拉康野战部队纪事》，于 1898 年在伦敦出版。该书排印过程中，丘吉尔自己无法前来看校样，便委托母亲的一位妹夫弗雷温先生代为校对，改正排字错误。可是这位先生改正的错误还不如他增添的错误多，使此书大为逊色。不过，这本近 400 页的新书生动地描绘了战场实景，并使读者能对远在印度西北边境的奇闻异事有所了解，因此还是获得很大成功。报刊评论该书时，有的称赞他观察敏锐、论点精辟，有的说从他这本处女作中看到了他父亲伦道夫勋爵的笔触，令人注意到他的文笔酷似父风。有一本供军官阅读的《联军杂志》还称该书为“最卓越的作品”，建议每位英国军官读一下该书。该杂志主编还约请丘吉尔写一篇谈论边境政策的专文，丘吉尔很快写成送去。他在这篇文章中申述了他对所谓的“前进政策”的看法。他认为，在新开辟的殖民地区实施的“前进政策”，也许本来就不该推行，因为这一政策使得旨在征服那些适合开展游击战的山区地带的任务，困难不断，人财两伤。他还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已推行了很久，遽然抛弃必将产生严重后果，因而只有节约开支，谨慎从事，限制边境地带碉堡的总数，并逐渐将英国的控制力量扩大到荒凉的阿富汗边境。

《马拉康野战部队纪事》一书获得的成功，使得不少政府要员也对之瞩目，这正符合丘吉尔的心愿。可是他原来想再次赢得一枚勋章的愿望却没有实现，布勒德将军只是在电文中表扬了他在战斗中的勇敢和坚定。1897 年 10 月间他又回到了班加罗的第四轻骑兵团，像过去那样打打马球、种种玫瑰花，采集蝴蝶标本。这时他还在继续写他前一年就动笔的一部小说《萨符罗拉》，书名就是小说中男主角的名字。丘吉尔把他最钦佩的一些品质——勇敢、智慧、学识渊博、辩才出众等等，都赋予了小说中的男主角。

过了一年，又是休假回家，小说尚未脱稿，却听说要派遣军队赴苏丹讨

伐了。丘吉尔说什么也不肯放过这次机会。他径自请求索耳兹伯里首相协助，让他参加远征军或以战地记者身份前赴苏丹。索耳兹伯里读过丘吉尔写的《马拉康野战部队纪事》一书，便同意了他的请求。可是英埃军总司令克契纳爵士不愿接受丘吉尔。于是丘吉尔通过一位朋友向副长官吴得爵士提出要求。吴得爵士同意接受他，并调派他参加第二十一枪骑兵团。与此同时，《晨邮报》也同意刊用他的战地通讯，每栏付酬 15 英镑，而当年《每日电讯报》每栏只付酬 5 英镑。再要征求远在班加罗的他的上校领导的批准已经来不及了，他匆匆启程，8 月份就来到开罗。

第二十一枪骑兵团当时正开赴喀土穆，正在跨过沙漠南下。在炎热的天气下一天行军 30 英里，很多士兵都中了暑，每天都死掉五六匹马。丘吉尔的身体倒还顶得住，只是有一次在夜间赶路时迷失了方向，结果在沙漠中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度过了一天一夜。

9 月 2 日拂晓 2 万名英埃军队在靠近恩图曼处遭到了人数为其三倍的伊斯兰苦修僧队伍的袭击。英埃军依靠枪炮将对方打散，随即四个中队的枪骑兵发起冲锋，想把苦修僧队伍彻底击溃。但是在冲进了一个峡谷后发现敌方设了埋伏，于是展开了一场近距离的激战。枪炮对长矛总是要占优势的，丘吉尔也是靠了手中的枪才免遭砍杀的。他后来写道：“那天早上，我头一次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怖。我感到自己完全孤立无援，我想这些持枪瞄准的人（苦修僧）会把我击倒，其余人便会冲上来像狼一样把我吞噬掉。我却还在敌人的包围中逗留，多么愚蠢！我趴在马鞍子上，双腿一夹，便驱马奔跑起来，逃出了这场混战。”在这场战斗中，枪骑兵团损失的人马几近全部人马的四分之一，而丘吉尔却又幸运地未遭损伤。

在苏丹的短暂经历竟使丘吉尔向《晨邮报》接连提供了 13 篇通讯，后来又将其汇集成册，于 1899 年秋天出版，书名《江河之战》。书中不仅描绘了他所参与的战争，还叙述了英国干涉苏丹的历史和他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以及这类征服所包含的利弊得失。书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对英埃军总司令克契纳纵容士兵虐待俘虏所提出的批评。有人认为《江河之战》是丘吉尔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丘吉尔在 1899 年春辞去了军职。那年 2 月，他收到罗勃特·阿司克劳夫特一封信，得知兰开夏郡欧德姆选区的保守党议员奥斯瓦尔德健康状况不佳，准备辞去议席。阿司克劳夫特建议丘吉尔趁此机会参加该选区的补缺选举，以免该议席位落入自由党之手。欧德姆是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棉纺业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多。在这个选区以往的大选中，胜利有时归自由党有时归保守党。丘吉尔觉得这个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选区可能对他主张的“保守党民主”有所同情，因此决定在补缺选举中试一试力量。

但是，临近选举之日不远时，身为保守党议员的阿司克劳夫特突然逝世了，丘吉尔只能同另一位新人共同对付自由党。选举结果，保守党失败，两个议席都落入自由党之手。尽管如此，丘吉尔并未沮丧，这是他在进入政界之前的一次试探。欧德姆选区的保守党人从这次选举中刚刚开始认识这位年轻人。

同年秋天，英国政府发动了布尔战争，又往南非派兵遣将。丘吉尔又想旧调重弹，仿照以前远征古巴、印度西北边境和苏丹的例子，再去南非冒一次险。他这次是《晨邮报》的特派记者，每月领取 250 英镑津贴，并由报社支付一切开支。他于 10 月赴南非，可是抵达后不到两星期即被布尔人俘虏。

一个月后他逃到葡属东非，这一意外事件引起了轰动，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他从布尔人手中逃出来的消息。他终于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丘吉尔抵达南非后急于奔赴前线，便赶到埃斯特考特同英军会合。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位过去在印度认识的霍尔丹上尉，上尉让他随同搭乘他们的一列装甲火车同行。火车在途中碰撞到布尔士兵置放在铁轨上的一块石头，前面三节车厢出了轨，其中第三节车厢还有一半留在轨道上，把铁路堵住了。后面的机车以及另外两节车厢也都动弹不得，布尔人乘机开火。车厢里的英军士兵在霍尔丹上尉的指挥下同布尔人交战，丘吉尔便自告奋勇去抢救机车，使之脱离险境。作为战地记者的丘吉尔本来并没有这项任务，只是责任感告诉他应该把出轨的车厢推出铁轨之外，才能挽救机车，驰回埃斯特考特。他指挥着受了伤的机车司机，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终于使脱轨的车厢同机车分离。机车则利用后面的两节车厢，把幸存者和伤员送回埃斯特考特。当机车脱离危险后，丘吉尔只身沿着铁路线走回来时，发现霍尔丹等人已全部被俘。布尔人逼近了他，他也成了俘虏。为首的俘获他的人是个布尔农民，也即后来任南非联邦第一任总理的路易·博塔。

俘虏们被解往比勒陀利亚，关在国立师范学校里，有 40 名警察看守。一天晚上，丘吉尔居然躲过监视，爬过高墙，越狱逃跑了。

越狱也是富有戏剧性的。霍尔丹上尉等人早就策划过越狱，丘吉尔要求参加。霍尔丹担心他不一定能逃得掉。因为布尔当局知道他解救机车送走英军伤员等情况而将之视作要犯，一旦潜逃势必缉拿。何况当时丘吉尔的健康状况不佳，精力恐有所不济。可是越狱时，只有丘吉尔一人首先趁哨兵不备，迅速地爬过了围墙。他在墙外等候了一会，不见其余人出来，只得独自上路。他身上只有 75 英镑现金和几块巧克力，既无地图又无指南针，只能盲目地瞎闯。那时夜色正浓，他身着便服，头上耷拉着一顶便帽，一口气走了两小时，恰好经过一个火车站，便跳上一辆货车，随着它东行。天色发亮之前，他跳下货车，在附近的树林里躲了一整天，到傍晚又想改搭其他夜行列车，但是没有等到。不得已只得步行，碰巧见到一个村庄，便到一所房屋去冒险敲门。开门的竟是个英国人，是这几十英里之内唯一的一个英国人，他在附近的煤矿上工作。于是他把丘吉尔隐藏了一个星期。

布尔当局发出通缉令，悬赏 25 英镑捉拿他，不论死活。丘吉尔最感到不快的是他在布尔人眼中竟只值 25 英镑。

在那位英国人及另外几位英国人的帮助下，丘吉尔搭一辆东行货车到达洛伦索·马奎斯（今莫桑比克首都，当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接着，他找到英国领事馆，然后搭乘轮船南下，于 12 月 23 日抵达英国控制下的德尔班。

抵达德尔班之前，丘吉尔越狱成功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因此他一到德尔班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圣詹姆士报》于 1899 年 12 月 29 日对此作了这样的描绘：

丘吉尔先生……被人们抬在肩膀上下了轮船，并由一群仰慕他的热心人士用人力车把他从码头拉到市区，车后跟随着一大群挥舞着英国国旗、高声欢呼的人。他来到司令办公室时又激起了一阵爱国热情。大家都要求他发表演讲，丘吉尔先生欣然顺从了这一要求……

丘吉尔自己也在抵达德尔班之后马上写了一篇脱险纪实的文章寄给《晨

邮报》。当时英国政府在海外维持殖民统治的困难越来越多。人们逐渐感到要想在所征服的殖民地上长治久安，实非英王政府力所能及。丘吉尔这时也从亲身经历中看出了这一点。他虽然当过布尔人的俘虏，还险些送了命，可是他在文章中仍对布尔人的骁勇表示了尊敬。它使他遭到了伦敦一些人的批评。

丘吉尔在德尔班被委任为英军南非轻骑兵团的一名中尉，参加了卜勒将军指挥的雷地史密斯一役。后来又设法调至劳勃茨勋爵指挥的部队，因为那支部队正在向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进军。

在向约翰内斯堡进军途中，丘吉尔仍是一面参加战斗一面替报纸写通讯。当布尔部队尚未全部从约翰内斯堡撤尽时，丘吉尔已经穿一身便装，骑着一辆自行车，进城巡视了。后来当他随同第一批队伍进入比勒陀利亚时，他率先去那所曾经成为他的监狱的学校，在那里升起了英国国旗。

1900年6月，南非战争基本结束，丘吉尔回到英国，时年25岁。就在丘吉尔回到伦敦后没几天，他的母亲又结婚了。新郎是苏格兰警卫队的一名上尉，名叫乔治·康沃利斯-威斯特，和丘吉尔同年，比新娘年轻20岁。乔治·康沃利斯-威斯特并不富有，只是一座古堡的继承人。这门亲事遭到男方家族的强烈反对，而丘吉尔兄弟两人都认为母亲有权选择新的生活。结果丘吉尔家族成员大批参加了这场婚礼，而男方家族除了新郎本人外无一出席。由于得不到父亲的财政支持，乔治·康沃利斯-威斯特只得辞去警卫队的职务，而由珍妮的已故丈夫伦道夫勋爵的一位老朋友恩斯特·卡瑟尔爵士帮忙，在一家企业中谋到了个职位。丘吉尔不能再指望母亲的资助了，他必须在经济上独立，以便在政治前程方面取得进展。他认为只有写作能赚钱。他把所写的南非战地通讯汇集成两本书，于1900年出版，书名为《从伦敦到雷地史密斯》和《伊恩·海弥尔登的行军记》。前一本记述的是那次装甲火车遭伏击的经过以及他本人被囚又越狱的情况，受到报界好评，在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销出了15000册。《圣詹姆斯报》称赞他是“当今无与伦比的战地记者”。两本书的版税以及前一本《江河之战》的版税，加上他积攒的《晨邮报》付给的薪水，一共4000英镑，他还凭着因那几次冒险业绩所赢得的名声到英国各地去发表演讲，同样受到盛大欢迎，使他又收益了4000英镑。12月间他又去美国发表演讲，可是收益不大。他发现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亲布尔人的情绪”，因此每场演讲所得还不及在英国的一半。次年1月，他又在加拿大演讲。最后回到英国时，他的全部收入合在一起也不过1万英镑。用这笔钱进行投资，他可以维持若干年的开支，从而可以专心从事政治活动了。赴美国之前，他已在1900年的大选中，在欧德姆选区赢得了一个席位，成了下院议员。他野心勃勃，迫不及待。据说他向熟人表示，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担心寿命不长。他父亲活了45岁，他认为他自己恐怕也只能活那么久。事实上后来他活到90岁，是他父亲寿命的双倍。

步入政界

1908年4月，时年仅34岁的他出任贸易大臣。年轻的贸易大臣走进办公室，在宽大的写字台上放上一尊拿破仑的小青铜像。从此，这尊铜像伴随着主人动荡而又不凡的宦海生涯。

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勋爵曾是保守党的重要人物，出任过保守党内阁大臣，并且是建立保守党的附属团体“樱草联盟”的倡议人，同保守党一直有深厚的渊源。丘吉尔成为保守党人，似乎是理所当然。

可是伦道夫勋爵在生命中的最后数年内，对索耳兹伯里勋爵的保守党内阁的政策，并不完全赞同。他较亲密的朋友中既有保守党人，也有自由党人。他最后就是因为同首相意见不一致而离开内阁的。

青年时代的丘吉尔曾对自己应在政治上站在哪一边犹疑不定。他的家庭背景是保守党，可是他对曾任自由党内阁首相的罗斯伯里勋爵的政见极为赞同。他曾在从印度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表示，“我除了在名义上不是自由党人外，在各方面都是自由党人”。

他表示要寻求一种“保守党民主”，那就是主张推行普选权，实施累进所得税制，限制军队员额之类。他和他父亲一样，认为作为一个海军强国，不必要维持庞大的陆军。但是他又主张保持和巩固现存的帝国。他认为保持帝国和推行社会改革可以作为共同的政策目标，因为“要保持我们的帝国，我们必须让人民拥有自由，必须让人民丰衣足食和接受教育，所以我们赞成社会改革，切望实施养老金制度等等”。他认为自己是处于保守党内最先进的一翼，他把保守党内的一些顽固分子称作“化石”。

1900年的大选虽然距1899年的补缺选举才一年，可是丘吉尔在选民中的形象已与前大为不同了。这次大选将产生20世纪的第一届英国议会。当时布尔战争尚未结束，全国朝野对此忧虑重重。保守党的选举策略是向全国呼吁，请求授权来胜利结束战争，他们把任何政敌都说成是“亲布尔人派”。保守党的重要人物约瑟夫·张伯伦（内维尔·张伯伦之父）在竞选演说中甚至说：“政府丢失的每一个议席，都将是布尔人赢得的席位。”刚从战斗的前线回到英国的丘吉尔成了保守党的英雄。有11个选区愿意请丘吉尔到他们那里去竞选议席，可是丘吉尔仍回到欧德姆选区，以让这里的选民“纠正”他们上次未把他选上的“错误”。这一次，他在南非的传奇性的冒险经历得到了大肆宣扬，甚至该选区的一些自由党人也向他写信表达钦佩之情，并声称将在选举中“排除政见”而投他的票。他的堂兄马尔勃罗公爵答应在财政上予以支持。约瑟夫·张伯伦还亲自跑到欧德姆选区发表演说支持丘吉尔。尽管竞选相当激烈，丘吉尔终于以130票的多数获胜，以年仅26岁的青年议员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1901年2月，从美国远游归来的丘吉尔第一次出席下议院。当时下院辩论的议题是布尔战争。他坐在保守党席位的前排——他已故的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上，聆听着其他议员一个又一个地发言。很多意见和观点他是不同意的，因此他很想以一个不久前才从南非归来、亲身经历过布尔战争的人的身份，在下院发言。按照英国议会的习惯，新议员至少要几星期之后才可在下院作首次发言。可是他迫不及待，在进入下院四天之后就发表了他在议会的首次演说。

他事前对演说作了充分的准备，不仅要内容充实，思想深刻，而且要逻辑性强，有说服力；虽然准备了讲稿，却又不能照本宣科，朗读讲稿，一些要点和警句必须铭记于心。此外还得对其他议员的即席提问和插话，作出恰当而灵活的反应。如果在议会辩论中被提问者难倒，那就前景不妙了。

丘吉尔被安排在一位年轻的自由党议员、37岁的劳合·乔治之后发表他的首次演说。他在聆听劳合·乔治发言之时还在继续修改讲稿。他心情十分紧张，可是一被宣召登上讲坛，就无所顾忌地谈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既维护英国在南非战争中的立场，又对布尔人的勇敢和作战能力表示赞扬。他甚至主张要让布尔人得到公正而光荣的和平。演说获得了好评。保守党的约瑟夫·张伯伦，自由党的罗勃特·雷德爵士和后来当首相的赫伯特·阿斯奎斯，都在后来的发言中赞扬了丘吉尔，并认为丘吉尔重现了他父亲伦道夫勋爵昔日的光彩。

可是，对丘吉尔的首次演说所表示的欢迎和赞扬，并不能掩盖丘吉尔的主张违背保守党的路线这一事实。保守党的领袖们主张严厉对待布尔人，把布尔战争打到底，而丘吉尔却主张温和地对待布尔人，对布尔人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在对待布尔战争的基本态度上的分歧，日后还有更强烈的暴露。保守党的政府大臣们曾以为攻陷了雷地斯密斯和比勒陀利亚之后，布尔人的溃败已指日可待。他们低估了布尔人的坚韧性格，未料到南非战争还真的打个没完。保守党政府继续对布尔人施加压力，发出通令要求布尔人的领袖们在一个月内投降，否则将遭受终生放逐。此举遭到丘吉尔的公开反对，他宣称这种做法实际上不可能在南非赢得胜利。

丘吉尔在进入议会的最初几年中，多次在辩论中反对保守党的政策，实际上成了自由党的代言人，因而保守党领袖们对他越来越不满。

陆军大臣布罗德里克鉴于南非战争所暴露出的英军力量之不足，代表政府向议会提出了一项改组军队的方案，准备按欧洲大陆建制的模式建立6个军，而其中3个军12万人将随时可派往海外服役。丘吉尔是第一个对这个方案提出异议的人。他反对增加军事开支，请求下院从更全面的角度来审议陆军大臣的扩军提案，从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来考虑军队开支，并且结合英国海军力量来权衡陆军在帝国防御体系中占有的地位。丘吉尔在下院辩论中明确指出，对付海外殖民地，根本用不着3个军，有2个军已足够，实际上只需要1个军。可是若要在欧洲打仗，3个军也还不够。他认为英国防务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支精良超群的海军。

有的传记作家认为，丘吉尔在那场议会辩论中确实是作了精心周到的准备，他的发言不仅显示了他丰富的军事知识，还表明了他对局势有独到的见解。也有人认为丘吉尔为反对改组军队而在议会中大声疾呼，是在步他父亲的后尘，而他父亲当年正是因此而下台的。丘吉尔此举是对保守党的一种独特的报复。

改组军队的方案在议会内外讨论了两年，最后未被议会批准。丘吉尔获得了胜利，这就使他获得了人们更多的注意。一家自由党的报纸甚至预测这位大胆带头批评政府提案的年轻议员，有朝一日可能成为自由党的英国首相。

在这场关于改组军队的辩论中，丘吉尔的政治独立性已表现得相当充分了。他成了议会中的狙击手，在很多问题上都和他所在的党不一致。可以看出，分道扬镳在所难免。

1903 年来到时，政府局势还比较平稳。布尔战争已经结束，爱尔兰人也相安无事。可是到了 5 月间，保守党的权威人物约瑟夫·张伯伦在伯明翰向他的选民发表一次演说，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在演说中提出了建立关税壁垒政策的主张，放弃行之有效的自由贸易原则。这次演说不啻在英国政界投下了一颗政治炸弹。

自由贸易是英国经济制度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保守党和自由党都同意的一项原则。约瑟夫·张伯伦提出建立关税壁垒，是为了保护不列颠帝国的经济利益。但是英国工商业各界并不都能从这一新的经济政策中得到好处，因此，实施关税壁垒政策的利弊得失究竟如何，就成了英国政界和舆论界热烈辩论的重大问题。

自由党人原来在布尔战争问题上有过分裂，现在在关税壁垒和自由贸易二者的对立选择面前却团结起来了。相反地，分裂却在保守党人和保守党的政府大臣们中间产生了。约瑟夫·张伯伦是关税壁垒的倡议者，而首相阿瑟·巴尔弗则坚持实行自由贸易原则。巴尔弗不愿由于党内的这一分裂危及他的政府的命运，因此总是想方设法弥补裂痕。于是，在很多情况下，巴尔弗首相是左右为难。

对于丘吉尔来说，这又是一次机会。他竭力维护自由贸易政策、反对老张伯伦的关税壁垒政策。他在议会辩论中滔滔不绝，同老张伯伦针锋相对。自由党领袖们也对关税壁垒政策展开了攻击，以保护他们一致维护的自由贸易原则，可是他们的言辞攻势远不如丘吉尔犀利。这次斗争又使丘吉尔名扬全国，同时，他与保守党的关系也确实难以补救了。丘吉尔在议会辩论中公然帮自由党说话，而对保守党领袖们加以嘲弄，以至有一次他发言时，全体保守党议员陆续退席，以示抵制。不多久，丘吉尔离开了他原来的议席，转坐到了反对党的议席上。

事实上，保守党内阁内部也争议激烈。有些大臣是拥护自由贸易政策的，他们为了反对关税壁垒政策，于 1903 年 9 月辞去了大臣职务。当时巴尔弗首相若打算把丘吉尔留在党内，满可以在改组政府时让他入阁，以使他停止对政府的猛烈抨击。可是巴尔弗没有这样做。老张伯伦看到了巴尔弗的这一失策，事后他曾向旁人说：“丘吉尔是所有年轻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巴尔弗任凭他离开党是犯了一个错误。”人们还记得近 20 年前，身为内阁财政大臣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因同索耳兹伯里首相意见分歧，违背保守党的路线而脱离内阁，索耳兹伯里首相并未挽留他。如今他的儿子温斯顿·丘吉尔又同巴尔弗首相意见分歧，重蹈他父亲的覆辙。凑巧的是巴尔弗正是索耳兹伯里的外甥。上一代的怨恨竟然遗留到下一代来重演。所不同的是当年伦道夫勋爵离开保守党内阁后一蹶不振，最后郁郁而终。而他的儿子脱离保守党转入自由党，却标志着宦途的开始。

丘吉尔同自由党内多数人意见一致之处，除了表露于主张维护自由贸易、不赞成建立关税壁垒，反对扩大陆军和改组军队外，还在于反对在对外事务和帝国事务上耗费过多，要求紧缩外交和殖民政策。此外，在工会权利上，丘吉尔也接受了自由党的立场，并发表演说支持工会，要求立法保障工会权益。

有些传记作家指出，丘吉尔尽管有很多观点和自由党相符合，但是真正的转党原因是他想攫取官位与权力，想在政坛往上爬。约瑟夫·张伯伦说巴尔弗首相未留住丘吉尔是个错误，也即是说没有让丘吉尔入阁当大臣，而让

他外流到自由党去，对保守党不利。老张伯伦显然看到，如果将丘吉尔延揽入阁，他就不会去投奔自由党了。当时也没有人会预见到丘吉尔在 20 年后又故伎重演，脱离自由党，重返保守党，而且在宦途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丘吉尔脱离保守党之时，正是保守党内和内阁中因外贸政策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之际，巴尔弗想维护团结而不可得，保守党政府几近瘫痪。约瑟夫·张伯伦要求巴尔弗解散议会，举行新的选举，企图通过选举来争取选民，支持他倡议的保护关税政策。巴尔弗采取了辞职的对策，他以为在他辞职后让自由党马上来组织政府，这个新政府必然会由于在议会中不占多数而迅即垮台。到时候他再卷土重来，必然能增强他的地位。所以他在 1905 年 12 月 4 日宣布辞职。第二天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便组织了政府，并立即解散议会，宣布在 1906 年 1 月举行大选，以掌握主动。巴尔弗失算了。

坎贝尔-班纳曼组阁时曾考虑让丘吉尔担任财政部财务次官，这一职务是政府各部的次官中最令人羡慕的一个，不仅薪俸较其他次官为高，而且对日后升迁入阁极为有利。可是丘吉尔却要求到殖民地事务部去当次官。他明白自己对财政事务一窍不通，可是对殖民地，他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更何况他的顶头上司，殖民地事务大臣埃尔金伯爵是上院议员，因此在下院，他就是殖民地事务部的代表了。丘吉尔于是成了英王陛下政府的一位初级大臣，时年 31 岁。在自由党政府中出任财政大臣的是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的继承人。出任外交大臣的是爱德华·格雷爵士。丘吉尔的好朋友劳合·乔治担任贸易大臣。自由党的哲学家约翰·摩莱出掌印度事务部。陆军大臣则由才智出众的理查·霍尔丹担任。

丘吉尔从殖民地事务部的文官中挑选了一位与他同年的埃迪·马许担任他的私人秘书。埃迪·马许博学多才，文学修养较深，自此跟随丘吉尔 20 多年，从一个部转到另一个部，一直当他的秘书。

在 1906 年 1 月的大选开始之前，丘吉尔满可以到一个较为稳妥的选区去参加竞选。可是他好斗的性格却使他决意到曼彻斯特西北选区去参加竞选。那里向来是保守党的据点，但也是个视出口市场为命脉的工商业大城，拥护自由贸易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曼彻斯特的大选要略早于其他地方，其较量的结果会对全国产生影响。

丘吉尔携马许来到曼彻斯特后，马上投入紧张的竞选活动。此时全国的潮流涌向支持自由党，这对丘吉尔极为有利。因此他每次竞选演说时都把重点放在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上。他的观点和主张获得了多数人赞许，每次演说总挤满了听众。投票的前一天，《曼彻斯特卫报》报道说：

如果丘吉尔先生对每位听众收一先令门票，他在过去两星期的演讲会上便可发一笔小财。昨天在开讲前半小时，大厅便挤满了听众，大厅外的楼梯上又站满了另一批听众，第三批听众则在室外的人行道上争相谋得一片立足之地。……听众对他的热情程度是曼彻斯特以往的政治角逐中从未有过的。

保守党的《每日邮报》也说，曼彻斯特公众把兴趣都集中在丘吉尔身上了。

在竞选中，丘吉尔的对手列举了他过去大肆攻击自由党的言论来质问他，还印发了刊印着这些言论的小册子，要求他当场向选民作出解释。丘吉尔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当他为保守党工作时，的确说过不少蠢话，而正由于

他不愿继续说蠢话，才脱离了保守党。这句话引起了听众的大笑和欢呼。这时丘吉尔随手把那本小册子一把撕碎，朝外一扔，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色，小册子的效用也就到此为止了。接着他的对手就以他的倒戈行为来指责他，可是他的自由党支持者们同样以约瑟夫·张伯伦过去的倒戈行为进行反诘，丘吉尔的对手就无以答对了。老张伯伦眼下是保守党的核心人物之一，可是他最初进入政界时却是个激进派。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巴尔弗一伙人的预料。自由党在这次大选中赢得了400个议席，保守党所得还不及其半数，仅157席，遭到惨败。从此，自由党人连续当了17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这次大选中成了曼彻斯特西北选区的胜利者，重新当选为议员，不过这次是自由党的议员了。

1906年的大选有一个特点——英国的劳工代表在议会中获得了30个席位，这些代表主要是由1900年成立的工人代表委员会推举出来参加竞选的。他们得到了自由党人的支持。工人代表委员会后来改组为工党，它在议会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后来数度担任英国首相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劳工代表在英国政坛的力量得到增强，是和当时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分不开的。这些运动当然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面目都有。丘吉尔在谈到社会改革的时候似乎也受到过当时的一些社会思想家的影响，尤其是像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锡尼·韦勃和彼厄垂丝·韦勃夫妇等人的影响，可是他对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始终是反对的。

丘吉尔在殖民地事务部需要对付的第一个重大问题便是南非的未来问题。布尔战争已在保守党执政时结束，德兰士瓦尔和奥伦治被并入英殖民帝国的版图，但谁都知道这并非是最解决办法。执政的自由党该采取何种政策，这正是殖民地事务部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保守党人认为让南非实行自治的时机尚未成熟，而自由党人的新政府则主张让南非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自治。丘吉尔受命为此在下院提出一项法案，并在议会辩论中进行答辩。后来，根据英国政府同布尔人谈判的结果，英国议会于1909年通过法令，决定成立由四个省组成的南非联邦。法令于次年生效，从此南非成为英帝国体系内的一个自治领，与加拿大（1867）、澳大利亚（1901）、新西兰（1907）处于同等地位。自由党政府此举使一些保守党人深为不满，但是却使布尔人的领袖史末资将军体会到这是对布尔人的和解姿态。当1914年和1939年发生世界大战时，南非联邦都站在英国一边，在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可是另一方面，同布尔人达成的协议并未顾及土著黑人的利益。土著居民受着白人殖民者的压迫和欺凌，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根本没有政治权利。

作为殖民地事务部的次官，丘吉尔同他的上司，殖民地事务大臣埃尔金伯爵之间的合作并不是很和谐的。埃尔金当过印度总督，考虑殖民地问题时往往从当地殖民官员的立场出发。而在下院辩论时，在回答议员们就殖民地事务进行质询所提出的各种难题时，首当其冲的是丘吉尔。可是丘吉尔所提出的各种意见又往往不为埃尔金所同意，因而冲突不可避免。丘吉尔在不少人眼中确是富有首创精神，年轻有为，有时咄咄逼人，但也从未故意违抗过上司。埃尔金富有耐心，也希望和他的次官保持良好关系，可就是不肯受人牵制，不愿接受凭自己的经验和个性判定为错误的决定。虽然两人在工作中不断发生各种意见冲突，但是平时相处仍始终信守礼仪。在共事一年之后，丘吉尔给埃尔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真挚地写道：“没有人会有一个比我

在一参加政府就极其幸运地遇到的那个更可信赖和更宽容的上司了。我从您的指示和榜样中学习到许多执行公务的学识。如果我是在他处工作，那些学识我将毕生一无所知。”

事实上，在工作中同丘吉尔发生矛盾的并非他上司埃尔金一人，那些受他领导的常任文官也对他不悦。文官们认真地为他起草的议会答辩材料，他总是要重新遣词造句，大加修改。下属们觉得他年纪轻轻却专横跋扈，丘吉尔则觉得像他这般记者出身的官员若听任文官们来决定他公开发言的文体风格，则无异于表示自己不仅懒惰，而且政治上也很迟钝。

1907年下半年，丘吉尔进行了一次为期达三个月的东非旅行，视察英国的各东非殖民地，顺便打打猎。本来可以享受公务旅行，可是为了避免反对派的批评，上司埃尔金要丘吉尔自筹旅费。于是他同《湖滨》杂志联系好，为其撰写一系列文章，以稿费来支付他们一行四人的旅费。他除了由秘书埃迪·马许伴同外，还带了一名男仆和他的一位姻亲戈登·威尔逊中校。他们一行搭乘一艘海军部提供的、由巡洋舰改装的客轮，先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经由苏伊士运河到蒙巴萨（肯尼亚），然后改乘火车到内罗毕，再到乌干达、喀土穆。每到一地，丘吉尔就陷入了公务。不多久，一份接一份的长篇汇报送到了白厅，谈的都是他认为应该采取的增进殖民地福利的措施。埃尔金对接连涌来的汇报和备忘录感到十分为难，因为其中绝大部分在他看来是不切合实际的。

丘吉尔对东非之行十分满意。虽然旅途艰辛，但是他在这些殖民地上看到了无穷的潜力——自然资源。他主张开发森林和水力资源，建铁路和工厂、发电站，主张把文明传播到东非的荒漠和丛林，这一切考虑，都是为了英帝国的利益。

他为《湖滨》杂志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后来汇集成册，还补充了一些材料，以《我的非洲之行》为名出版。他在书中谈到了他的开发非洲的主张。

1908年1月，丘吉尔回到伦敦。首相坎贝尔-班纳曼病重，虽然他正式辞职是在4月，但他的继承人阿斯奎斯在3月份已在筹组下届内阁了。阿斯奎斯让丘吉尔在海军大臣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两职之中任选其一。海军大臣一职在内阁中地位较高，但是丘吉尔一来对海军并无了解，二来不好意思去取代现任海军大臣特维德墨斯——他姑母芬妮的丈夫。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之职在内阁中地位较低，而且现任大臣约翰·本斯还不愿舍弃此职。最后阿斯奎斯让丘吉尔担任了贸易大臣，而原任贸易大臣的劳合·乔治则接替阿斯奎斯当了财政大臣。1908年4月，34岁的丘吉尔成了内阁大臣。

根据当时的规定，新任贸易大臣应该重新接受选民的裁决，也就是先辞去议席，再参加补缺选举，以求重新获选。这次丘吉尔在曼彻斯特西北选区遇到的竞选对手不仅有上次选举中被他击败的威廉·焦因森-希克斯，还有一位属于一个名叫社会民主联盟的小团体的候选人，不过此人影响不大。整个气氛同两年前的大选时不一样，自由贸易已不是竞选的焦点。为了争取该选区的900多名爱尔兰选民，丘吉尔（经阿斯奎斯同意）提出了自由党将于下次大选时将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提交选民讨论。劳合·乔治还跑到曼彻斯特去为丘吉尔助阵。可是这次保守党的焦因森-希克斯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对自由党上台两年来的败绩——历数。那批妇女参政运动的拥护者又非要丘吉尔保证自由党将会给予妇女选举权不可。两年前支持自由党的爱尔兰人，这次接受了天主教会的意见，大多数投了保守党的票。竞争结果，丘吉尔以400

多票之差，败给了焦因森-希克斯。

丘吉尔失去了这个选区的议席，可是他的个人影响还在起作用。苏格兰登迪市的自由党组织立即给他发来电报，邀请他参加该市即将举行的竞选。登迪市有两个议席，在 1906 年大选中为自由党和工党所赢得。现在原先的自由党的议员成了贵族，所以也得补缺。登迪市的选民多数属于工人阶级，从事造船业和麻织业等工业。这里向来是自由党的阵地。丘吉尔接受了邀请，参加了数天后登迪市的选举。此时，他已是很有经验的演说家了，他的措辞生动，警句连篇，几次演说都使得登迪市的选民欢呼不已。结果，他得票 7000 多张，当选为议员。他在议会里代表这个选区长达 15 年之久。

重新成为下院议员的丘吉尔，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到伦敦担任他的新职贸易大臣了。

内阁大臣

西谚：一根棒子有两头。身为内政大臣的他，既致力于社会改革，又无情地镇压劳工运动。

他是大英帝国利益的可靠卫士，一个在复杂情况下善于采取积极行动的人。

1908年8月15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则丘吉尔订婚的消息。婚礼于9月12日在西敏寺的圣玛格烈教堂举行。新娘克莱门塔茵·何西尔的父亲亨利·何西尔爵士曾当过军人和战地记者，刚于1907年逝世。新娘的母亲布朗希·何西尔夫人是艾利伯爵的女儿，也算是贵族家庭出身。何西尔夫妇分居多年，夫人带着三个孩子靠微薄的收入默默地生活。克莱门塔茵是长女，长得非常漂亮，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当法语教员，挣些钱以补贴家用。

早在1904年，丘吉尔就在社交场合见过克莱门塔茵，但是并无来往。1908年他们再相遇时，她已23岁。丘吉尔邀她到布伦海姆宫，晤谈了没有多少次，就向她求婚，她答应了。

内阁大臣的婚礼通常是不多见的。可是说来也凑巧，在一年中有三位大臣相继举行婚礼。除丘吉尔之外，另两位是海军大臣雷金诺·麦肯那和大法官劳尔本。

丘吉尔邀请来宾1400人，教堂外面看热闹的群众无数。婚礼结束后在克莱门塔茵的姨婆圣埃利埃夫人的府邸举行招待会。那里陈列着各方赠送的礼品，其中有国王爱德华七世赠给丘吉尔的一根嵌有马尔勃罗家族徽饰的镶金马六甲手杖。随后，新郎新娘乘火车赴布伦海姆，开始度蜜月。在故乡的街道上，乡亲们向他们欢呼，教堂还响起了祝福的钟声。第二天下午他们拜谒了伦道夫勋爵的墓地，然后赴欧洲旅行。

根据专家们的研究，英国政界人物的婚姻很少从外表到内里都是美满幸福的。丘吉尔是个倔强、固执、睿智而野心勃勃的人，并不很罗曼谛克，不喜爱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甚至连舞都不跳。他最关心的是政治活动、政治角逐，以及自己的政治成就。此外他的主要时间都用于读书和写作。克莱门塔茵是个意志坚强、脾气急躁，但又富有才智，关心政治的妇女。她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丈夫极其忠诚，把任何一个攻击她丈夫的政治家都视作敌人。她对丘吉尔不仅是安慰也是支持。官场中往往风云莫测，可是丘吉尔至少相信他的“后方”是可靠的。因此传记作家们认为丘吉尔的婚姻是美满的，尽管丘吉尔本人还不愿意这样说。

他们婚后共生育五个孩子，四女一男。其中第四个孩子，也即是第三个女儿，不幸夭折。儿子排行第二，生于1911年，也取名伦道夫，以纪念丘吉尔的父亲。丘吉尔最喜欢生于1922年的小女儿玛丽，因为他认为玛丽长得最像他年轻的时候。

当时英国政府的贸易部还要管劳工就业问题、罢工问题、资方封闭工厂问题等。身为贸易大臣的丘吉尔本来就对社会改革饶有兴趣，这一下就使他对这一问题有了更详尽的了解。他就职不久就发现英国经济正面临周期性的萧条：失业大量增加，很多行业的雇主都想减少工资，劳资矛盾突出，于是就出现了罢工事件和封闭工厂等情况。政府并无适当的办法来对付这类事情，贸易部的权限也仅止于从中调解。贸易大臣对此类事件并无采取断然措施的权力。而丘吉尔，要他充当调解人，实在是难以胜任。

丘吉尔向议会提出的第一项重要的法案，是关于“血汗劳工”的，那是指某些工厂或行业以极低的工资和极差的条件雇佣的工人。这些“血汗劳工”得不到工会的帮助，因此很多人都认为国家应该干预，以使这部分工人获得较合理的生活。法案于1909年3月提出，并未遭到反对，后来就成为《贸易委员会法》。贸易委员会改名为工资委员会后成了英国工商界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机构。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致力于建立职业介绍所。他设想通过这类介绍所，对失业问题获得详尽的了解，从而使他能起草和提出一项强迫参加失业保险的制度。想出制订这种制度的人是劳合·乔治。他赴德国考察了实施这类制度的情况后，回国同丘吉尔进行了详谈，讨论了强迫保险制度的各项原则。丘吉尔充分利用了他朋友的知识经验，据此提出了方案。丘吉尔设想：职业介绍所既应当帮助失业者寻找工作，也应当帮助企业雇到劳动力；既可以加强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动性，又可以为企业家节省雇佣劳动力所需支付的费用。然而，当丘吉尔于1909年向议会提出这一法案建议时，它还是一项面面俱到的法案，只涉及周期性失业较为严重的企业，如建筑业、造船业、铸铁厂、锯木厂等。法案于1909年9月通过，第一家职业介绍所于1910年2月开张。

这项立法虽然重要，但在当时还不是政府最关切的问题。当时政治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一是政府内部在海军建设计划上的分歧，二是劳合·乔治提出的预算及其增税建议。丘吉尔对军事预算的态度早在上届议会时已为众所周知。现在他虽进入内阁不久，却又旧调重弹，对军费增加多方责难。他认为英国的陆军打大仗不足，打小仗有余，不如裁军节支，每年省下100万英镑军费。他又认为英国海军不必增建过多的新式主力舰，即“大无畏舰”，因为英德两国目前尚不至于开战，何况原有的战舰也并未全部过时。丘吉尔对海军大臣麦肯那提出的英德两国海军力量发展趋势的统计数字备加挑剔。他甚至提出了一套改组陆军部的方案，要求内阁接受，气得陆军大臣霍尔丹说不出话来。

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曾劝告丘吉尔不要像他父亲那样，在访问欧洲大陆期间谈论英国的外交政策。于是丘吉尔便在国内演讲时发表对英德关系的意见，它完全与格雷的政策相悖，使格雷大伤脑筋。

当时丘吉尔的年龄比内阁成员的平均年龄还要小20岁。以他这样年轻而资历浅的内阁大臣，在政治活动中如此“肆无忌惮”地固执己见，亦属少见。他的好友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在好些问题上是他一致的，首相阿斯奎斯却并非如此。丘吉尔才能突出，特别是演讲和辩论的口才十分出色，对自由党来说，他是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劳合·乔治提出的预算计划在议会中引起了很大的争执，主要是由于预算计划要求增税，尤其是对财产和地产征收捐税。保守党人对计划大肆抨击。丘吉尔尽力为之辩护。保守党人只得利用他们在上院占多数的事实，让上院否决了政府的预算计划。这一行动立即被自由党人指责为违反宪法，因为议会两院长期以来遵行不悖的一项谅解便是：上院不能否决财政法案。保守党人此举极为愚蠢，因为这已成为一项宪法方面的争执，自由党人便借此举行大选，并提出“贵族们在压制平民”的口号，来争取支持。大选在1910年1月举行。在此之前，丘吉尔受命到利物浦、曼彻斯特以及西北部其他城镇去作一系列演说。他在为期10天的巡回演说中很少重复所说的内容。保守党对

他的竞选演说所产生的影响十分忧虑。首相阿斯奎斯在接到有关丘吉尔演说情况的报告后，获得很深的印象，以至在他本人的选区，他也请丘吉尔去发表演说。

大选的结果，自由党虽然失去了不少议席，却仍保住了微弱多数（275席对273席）。阿斯奎斯首相在调整内阁时鉴于丘吉尔在大选中的贡献，准备改任他为爱尔兰事务首席大臣，但是丘吉尔不想担任该职。他提出或任海军大臣，或任内政大臣。后一职由于原任大臣已改任南非总督而有空缺，阿斯奎斯便任命丘吉尔为内政大臣，而让另一位比丘吉尔大20岁的锡尼·勃克斯登接任贸易大臣。

内政大臣是内阁中地位较高的大臣，主管的事务庞杂纷繁，但又责任重大。按丘吉尔的前任赫伯特·葛莱斯东的说法，内政大臣的主要职责是对700万工厂劳工和100万矿工的劳动条件、健康条件和安全负责，对所有人在警察管辖下拥有的个人权利负责，对维护公共道德负责，并对警局的牢房和监狱中的阴暗角落负责。内政大臣是同千百万群众的生命关系最密切的行政官员。

丘吉尔在35岁就当上了内政大臣，在他个人事业上可谓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所需要关注的事务以及在下院辩论中需要答复的质询也大大地增多了。不过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各种改革上，譬如对警察当局的监督，对监狱制度的审查，以及对工厂法的贯彻等等。他的前任葛莱斯东也曾会同该部的政务次官赫伯特·萨缪尔，在改革方面作出过不少成绩。萨缪尔曾设法尽量区别不同性质、不同情况的违章犯法者，使之得到恰如其分的处理和惩罚，而不单是关进监狱了事。他也已开始探索如何限制单独囚禁罪犯的方法。虽然丘吉尔并不认为这是件迫切需要解决的事，但他一接任就很关注。布尔战争中当俘虏的经历使他对失去自由的滋味有一定的体会，因此对监狱的改革花了不少心思。他主张对不同罪行性质的罪犯分别囚禁在不同的监狱，对惯犯、凶犯要严厉，债户不必囚禁。他原则上并不反对死刑，但主张要极端慎重，力求公正处理。然而这方面的改革也必须经过立法手续，所以他在任内并未能将他上述想法和主张全部实现。

丘吉尔在内政大臣任内，英国发生了两起重大的矿井事故。一起在肯伯兰的怀特黑文，死了130多名矿工；另一起在兰开夏的波尔顿，死了300多名矿工，是英国采矿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故。作为内政大臣，丘吉尔不得不在促使议会通过有关采矿安全条例的立法上负起责任。最后提交议会的矿井法案详细规定了采矿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各项安全措施，并载明内政大臣为改善安全条例有权发布指令。

国际上，德国的动向颇引人注意。1911年夏，德国派遣一艘炮舰到阿加迪尔附近，企图在摩洛哥分占一片势力。摩洛哥那时刚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德国此举无疑是想破坏欧洲列强之间的均势，这不仅是给法国在非洲的扩张一次警告，也是给欧洲各国一个表明德国意向的信号。

阿加迪尔不过是摩洛哥一个小小的渔港，有的只是茅屋和山羊。这件事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但其实际含义确实不应该忽视。派遣炮舰的命令是德皇发出的，他曾自称是“大西洋的海军统帅”，并自夸德国军队所向无敌，只要他一声令下便可出击。他把法国和俄国都视同草芥，只是对英国还略有尊重，那是因为他自己有一半英国血统。德皇的母亲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维多利亚公主。

阿加迪尔危机出现时，伦敦正沉浸在欢乐饮宴、歌舞升平的气氛中，但是丘吉尔在获知这一消息时却大为吃惊。他预感到英国将不免同德国一战。作为内政大臣，他对国家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因此他同军方负责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仔细阅读帝国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向将军们询问军事形势。他的注意力完全超出了内政部的职责范围。根据他的了解，他认为海军部并无应付战争的计划，同时也无应付危机的准备。他告诉阿斯奎斯说，海军部“眼下好像人人都在休假”。海军大臣麦肯那虽然在争取多建几艘无畏舰方面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是他并未像霍尔丹在陆军部所做的那样，在海军中建起一套应付战争的班子。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也表明，海军部并无保护英国远征军安全渡过海峡到法国作战的计划。这些情况使阿斯奎斯首相也忧心忡忡。身为内政大臣的丘吉尔，根据他对形势的分析和预测，于1911年8月13日写成了一篇详尽的备忘录，题为《大陆问题的军事方面》。他在备忘录中假设欧洲爆发了战争，以英、法、俄为一方，遭到了德、奥一方的进攻。然后他分析了德军和法军在军力和素质方面的差距，推测战局的发展和变化，估计英军参战的意义以及如何击败德国等等。丘吉尔所作的一些预测，在三年以后爆发的欧战中都应验了。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多少政府要员对之感兴趣。那年9月间，阿斯奎斯首相到苏格兰度假，邀丘吉尔同往，陪他打高尔夫球。恰好陆军大臣霍尔丹也在那里度假，住得不远，便常到阿斯奎斯住所来晤谈。他们三人，阿斯奎斯时年59岁，霍尔丹55岁，丘吉尔36岁，都觉得英国的军队必须进行重大改革，否则不足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霍尔丹想接管海军部，因而建议丘吉尔先担任一两年陆军大臣，然后再同他交换，当海军大臣。丘吉尔则不愿绕这个弯子，要求直接当海军大臣。霍尔丹担心丘吉尔眼下尚不能胜任，因为军队将按战争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改组，如果让丘吉尔这位并无突出政绩的年轻人来统辖皇家海军，万一数星期内即爆发战争，丘吉尔连熟悉基本业务都来不及，岂不会造成一场灾难！霍尔丹认为三四年以后再让丘吉尔出任海军部也为时不迟。可是丘吉尔不愿等待，他对内政部已经感到棘手万分，镇压劳工运动已使他声名狼藉，失尽人心。因此他坚持要管海军部。当时他住在阿斯奎斯的住所，比霍尔丹有更多的机会来说服阿斯奎斯。最后，阿斯奎斯首相同意让他当海军大臣，接替麦肯那，实际上是交换职务，因为麦肯那被任命为内政大臣。10月25日，两人正式交换了职位。

丘吉尔任海军大臣，职位上并无迁升，英国政府的官阶排列次序上，内政大臣的地位反而更高。但是，对丘吉尔来说，出任海军大臣更合他的心意，因为海军部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针对新形势进行改革，这正是丘吉尔极愿为之出力的，更何况他从小就对军事怀有浓厚的兴趣以及多年来对改革始终十分热心。因此到任后，工作非常卖力。除了在办公室工作外，还时常登上他的大臣专用快艇“女巫号”巡视各海军基地。据随他到海军部任他私人秘书的埃迪·马许说，丘吉尔“每天都要到8时或更晚才下班……我甚至连星期日也指望不上了。在过去的四个星期中，我有三个是在‘女巫号’快艇上度过的”。

为了创设海军军事参谋部，丘吉尔把原来的一批年老资深的将军都换掉。海军部第一部务委员阿瑟·威尔逊海军上将声望卓著，年龄长丘吉尔一倍，但是丘吉尔认为他与新观念格格不入，对成立军事参谋部的意义缺乏认识，因而改任弗兰西斯·布列吉曼海军上将为第一部务委员。丘吉尔还根据

另一资深海军上将、前第一部务委员约翰·费歇的建议，任命了巴登堡亲王鲁易海军上将为第二部务委员。由第一部务委员负责领导的海军军事参谋部于次年1月正式成立，下设作战、情报、动员三个部，还在海军军事学院设置了培训参谋人员的课程。

丘吉尔的改革劲头虽然很足，可是他同其他高级海军军官的关系却搞不好。原来海军部的部务委员们，尤其是第一部务委员，行政权力都较大。海军部不同于贸易部，并非一切都由大臣一人作主，而是由大臣协同几位部务委员共同决策的。但是丘吉尔上任后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方法，他向部务委员们发号施令，使他们的权力遭到削弱。因此不多久，他就同布列吉曼海军上将发生了矛盾。一年之后他让布列吉曼以健康理由退休，而让鲁易海军上将继任第一部务委员。为此他在议会中遭到保守党的猛烈抨击。

海军高级军官中有不少人感到丘吉尔态度傲慢、脾气急躁、秉性顽固、情绪激动。他们对丘吉尔的不符合传统规范的表现感到愤慨，但是对丘吉尔在海军中所作的改革，总的说来仍是支持的。

在下级海军军官中，多数人对丘吉尔有好感，因为他上任后曾设法改善了下级军官的待遇。海军原有的纪律规定，犯轻微过失者也要受体罚，例如，下班后像小学生似的罚站墙角之类，这些都被丘吉尔取消了。他还设法使优秀的水兵有机会升任军官，大大鼓励了士气。于是在他任职一年后，海军的《舰队》月刊主编就说，英国“海军历史上没有一位大臣比丘吉尔更确实地对海军士兵的处境表示过同情”。

当时德国正在大力扩建海军。丘吉尔估计到了英国面临的危险，即在海军力量上有被德国超过的可能性。因此他一反以往在内阁中竭力主张节减军费的态度，转而大声呼吁为海军建设增拨经费。他于1912年2月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说中公开表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对英国来说是生命攸关的。他认为，制止德国扩建海军的唯一办法是用事实向德国人显示，德国海军力量想超过英国是办不到的。他的主张得到了舆论界的普遍赞同。

丘吉尔在加强海军建设的努力中作出的重要决策之一，是改用石油为军舰的燃料。尽管这一改变在开始推行时需要花费不少投资，而且石油的供应还有赖于海外，可是从长远看，以石油代替煤有很多优越性。海军元老约翰·费歇看出了丘吉尔这一决定的意义而大力支持。为了实现改革，政府还被说服以200万英镑之巨资购得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控制权。后来的事实表明，政府这项投资是非常合算的。

丘吉尔还对舰艇的武器装备进行了改进，譬如，在新建的主力舰上以15英寸口径的炮口取代原先13.5英寸的炮口。他还积极扩建海军航空队。为了试验各种飞机的性能，他甚至学会了驾驶飞机。

军事装备的更新，需要大量的经费。丘吉尔提出1913年的预算时曾表示军备竞赛是愚蠢的浪费，因而呼吁德国共同暂停扩军。

可是德国毫无反应。于是丘吉尔在制订1914年预算时又作了增加，这给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出了难题。为了增加海军预算，两位大臣之间出现了矛盾。按往例，似乎两人之中必有一人辞职才能解决问题。可是劳合·乔治不想把他多年的老朋友挤出内阁。他公开表示，必须让丘吉尔留在内阁之中，即使为此花百万英镑也是值得的。1914年1月，劳合·乔治、丘吉尔以及阿斯奎斯首相三人进行了磋商，相互作出妥协。丘吉尔在1914年预算中提出的要求几乎全部得到了满足，但答应在下一年度的预算中缩减开支。所要求

建造的几艘主力舰全部批准，但建造巡洋舰和鱼雷艇的计划须缩减，等等。

矛盾解决后，丘吉尔在3月间向议会提出海军预算报告时，赢得了极大的反响。《每日电讯报》将丘吉尔的发言描绘为下院在当代所听到过的、出自一位海军大臣之口的最有分量、最有说服力的演讲。

1915年，当丘吉尔卸任海军大臣之职时，陆军大臣克契纳元帅对他说，当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你已使英国舰队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仅此一举足以终生引以为荣了。事实也确是如此。在1914年夏天皇家海军进行动员演习后，丘吉尔就命令海军保持动员状态，以便随时进行战斗。不久，即8月4日，英国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立即显示了海军优势。它在将英军运送到法国战场上去时，未损一兵一卒。当时的德国还无力开展全面的海战攻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月，英、法、俄等协约国一方连连失利。俄国军队在东线屡遭战败，德国军队迫使英法联军一再退却，矛头直指巴黎。但是到了9月间，马恩河一役使德军遭受重创，并使其速胜计划破产。此后德军便转而指向比利时，10月间比利时的沿海城市安特卫普已面临德军的逼进，比军向海边撤退，眼看着行将被歼或被俘。

这时英国内阁紧急商议对策，决心要挽救安特卫普的命运。会后陆军大臣克契纳元帅把丘吉尔拉到一边，问他愿不愿意于次日早晨亲自赴安特卫普，以估量当地的军事形势。丘吉尔非常乐意地答应了这次任务。他到了安特卫普后，同比利时国王阿尔贝及其总参谋部进行了商谈。为了全力投入当地的军事行动，他甚至提出辞去海军大臣之职、改任安特卫普的协约国联军司令。阿斯奎斯首相当即拒绝。

克契纳元帅倒认真考虑过丘吉尔的提议，并且主张授予其中将军阶，可是阿斯奎斯认为丘吉尔过去最高的军阶不过是中尉，现在若让他来统率两位功勋卓著的少将以及一批准将、上校，岂非可笑。最后，英国政府任命亨利·罗林生中将为安特卫普的英军司令。丘吉尔在安特卫普只指挥了几天战事便离开了。

不久，西线战局呈胶着状态。丘吉尔于11月中在战事委员会（即战争时期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上提出进攻土耳其葛列坡利半岛的主张。当时土耳其已参战，站在德奥一方。进攻葛列坡利半岛，进而占领伊斯坦布尔，就可以开辟向俄国提供援助的供应线，缓解俄国军队在高加索所受到的土耳其军队的压力。同时，英国海军驶进达达尼尔海峡必然能对希腊、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一向同土耳其不和的巴尔干国家产生巨大影响，有助于吸引它们，甚至还可能吸引举棋不定的意大利，倒向协约国一边。

1915年1月2日，俄国陆军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向英国发出了吁请救援的信息，请求英国在靠近俄国的地区发动攻势以牵制德军。英国的战事委员会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开辟另一条战线，对嚣张的德军以沉重打击。于是陆军大臣克契纳，在新年刚过就电嘱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转告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英国将对土耳其采取行动。作为海军部第一部务委员的费歇海军上将也力主对土耳其发动进攻，他在给丘吉尔的信中敦促他必须立即行动。1915年1月13日，英国战事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进攻葛列坡利半岛的计划。

根据在东地中海指挥英国舰队的汉密尔顿·卡滕海军中将对的汇报，英国舰艇若想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舰艇连续轰击海峡上的防御

工事，摧毁其碉堡和炮位。对此，丘吉尔相应作出了安排。可是费歇海军上将突然对整个进攻计划产生了疑虑，认为单靠海军打这一仗是不行的，要求克契纳派遣陆军随同舰队远征。经过几次争吵后，克契纳答应了。费歇又认为英国海军的首要目标应是北海，在那里迟早要同德国海军进行决定性的较量，若派大批舰艇去达达尼尔海峡则势必分散兵力。他要求首相阿斯奎斯接受他的意见，但首相决心维持原议。

2月19日，葛列坡利半岛之战正式开始。英法军舰组成的舰队向达达尼尔海峡周围的工事展开了猛烈炮击，但气候条件连日不佳，攻势未能持续。到3月初，进展尚算顺利，海峡入口处的一些炮位都已摧毁。然而，卡腾海军中将对指挥不够果断，进攻有所拖延。3月15日，卡滕因病辞去司令之职，由第二号指挥官德罗贝克海军中将接任，于是原计划于3月18日进行的协同作战便由德罗贝克来指挥。当作战行动开始后，舰队进入了布雷水域。首先是一艘法国军舰，继之是两艘英国军舰，触雷毁损。先前派出的扫雷艇居然未把水雷扫净。刚接过指挥重任的德罗贝克大为惊恐。他认为必须扫清水雷，补充更多的军舰，再从别处调来陆军，才能继续作战。他发回电报，决定把再次进攻的日期推迟到4月中旬。丘吉尔坚决要求立即继续军事行动，不能停顿，但是费歇及其他海军将领拒绝干预前线指挥官的决定，因而军事行动终于暂时停止了。

待一个多月之后，英军汇集了更多的兵力，再向达达尼尔海峡展开进攻时，土耳其方面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土耳其军队已由德国将军指挥。登陆英军遇到了土军猛烈的炮击。数以万计的英国士兵倒毙于滩头阵地，岛上的制高点仍在土军手中，英军遭到了空前的失败。与此同时，丘吉尔所倚重的费歇海军上将向他提出了辞呈。费歇长期以来对丘吉尔的一些别出心裁的观点是竭力支持的，但是他也越来越觉得丘吉尔过分自信，习惯于独断独行，越来越难以合作。两人在战争问题上的主张相距甚远，费歇只有辞职一途。葛列坡利战役的失败和费歇海军上将的辞职，对丘吉尔来说都是重大打击，数万名英军丧生异域一事不会不在国内激起严重的反响。丘吉尔作为对这场战役负有主要责任的海军大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全国公众愤怒的指摘。议会内部也弥漫着同样的气氛。阿斯奎斯不得不改组内阁，建立联合政府。丘吉尔也不得不辞去海军大臣一职，但仍留在内阁之中，挂了个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的名义，也仍在战事委员会中保留其席位。直到半年之后，1915年11月，战事委员会改组，丘吉尔被排除在外，他才正式离开内阁。

重返政府

温斯顿·丘吉尔仇视俄国，不仅因为它是苏维埃国家，而且还因为它是个强国。

当了十年大臣的丘吉尔，41岁时离开了政府，失去了他执掌多年的政治权力。虽然政敌对他的指摘和攻击并未因此平息，但是报界舆论也有为之鸣不平的。影响较大的《曼彻斯特卫报》对他辞职表示惋惜，认为这是国家的“巨大不幸”。丘吉尔则决定重新参军，到法国去，重上前线。在那初冬时分的一片萧瑟中，丘吉尔搭乘一艘挤满了回国度假后返任的英国官兵的船舰，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此行同他前几次来法国大不相同。以前他身为海军大臣，先是专列火车将他送到英国海岸，然后登上专用的驱逐舰快速驶向法国海岸，那边等候着他的是海军部的专用轿车。这一次他是一名普通军官，他并不期望有谁来迎接他。可是当他在布伦登岸时却发现英国驻军总司令弗兰奇的私人汽车早已静静等候在那里了。弗兰奇对他仍盛情接待，饮宴之后，继以长谈。丘吉尔当时的军阶是少校。伦敦方面发来指示，只准让丘吉尔指挥一个营。丘吉尔自己则表示想先下战壕，体验一下实际战斗。弗兰奇按照他的要求把他编入近卫步兵团，到战壕中去见习一个月。丘吉尔来到营部后，营长贾富雷中校对他并不热情，但丘吉尔仍努力完成他的见习任务。他甚至同连队一起住在战壕里经受风霜雨露。一次他所住的战壕被敌人炮火击中，幸而他正在外面值勤，得以幸免。他的表现使营长逐渐改变态度，因而当他结束见习时，贾富雷营长在向司令部的报告中对丘吉尔大加赞扬。

弗兰奇决定任命丘吉尔为第十九师的一名旅长。可是阿斯奎斯不同意，怕在政治上引起不良反应。这时候正好弗兰奇的总司令一职为海格将军接替，海格也不同意交给丘吉尔一个旅。最后，丘吉尔被任命为克契纳的“新军”第九师第六营（即“皇家苏格兰火枪营”）的营长。军阶升为中校。

丘吉尔担任营长后首先在全营官兵中开展了一场灭虱战，花了三四天时间使全营整洁一新。他经常到前线检查岗哨和工事，同士兵们有说有笑。他还在士兵中开展歌咏活动，以解闷消愁（当时前线比较静寂）。至1916年3月丘吉尔回伦敦休假时，全营官兵对这位大名鼎鼎的营长已十分爱戴了。

他当时仍是下院议员，在休假的同时还参加了下院关于海军建设的辩论。可是他在议会中所得到的待遇十分恶劣。他针对海军部的无所作为提出了警告，要求进一步增建军舰以保持对德国海军的领先地位。但是，他没有号准议会的脉搏，而且对自己在下院内的处境未作确切估计。他的发言不论是对是错，受到的对待都是充满敌意的。报纸还攻击他，骂他是“政治冒险家”，“毫不顾公众利益”，“极端自私”等等。政敌们更是嘲讽有加。实际上这时正是议会内部政见分歧、矛盾重重的时候，内阁官员们也因主张不一而争论不休。阿斯奎斯首相领导无方已导致普遍的不满。劳合·乔治几乎准备辞职，参加反对党，在这种局势下，丘吉尔只得回法国。

4月间，由于兵员缺额，皇家苏格兰火枪营第六营将同第七营合并。第七营的营长资历较丘吉尔深，任合并营的营长。于是丘吉尔可以说是重新获得了自由。他于5月回到伦敦，准备重新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当时他面临着两大问题，即：赚钱养家和在政治圈子内恢复声誉。

解决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他曾是名记者，又是前大臣，因此笔下的文

章是值钱的。报刊老板虽然反对他重进内阁，却并不反对刊登他的文章，以吸引读者。1916年7月，他给《星期图画报》写了四篇文章，得到的稿酬为1000英镑。这样，他可以轻松地每年收入5000英镑，这数目等于他当海军大臣的薪俸，超过了他当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的薪俸。《星期图画报》刊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后，销路猛增到创纪录的250万份。1916年10月—1917年3月，他每月在《伦敦》杂志上发表一篇评述战局的文章，每篇稿酬为500英镑。此外他有时还给美国报刊写些文章。因此，虽然他已不任高官，经济处境却并未转劣。

解决第二个问题比较困难。葛列坡利半岛一役惨败以后，公众舆论已把英舰在达达尼尔海峡遭到的厄运归咎于丘吉尔。因此若要澄清他的责任所在，必须尽快让政府公布有关葛列坡利半岛和达达尼尔海峡之战的文件。恰好还有不少其他议员也要求政府公布这些文件，尽管动机各不相同。身为首相的阿斯奎斯在议会中受到了不小的压力，最后，大家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听取证词并提出报告。这个委员会被称为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

这一时期战争形势并未好转，政局也随之出现动荡。后排议员们吵吵嚷嚷，对政府的政策颇多指摘。联合政府内部分歧加深，对阿斯奎斯的不满也日益强烈。在政府成员中，劳合·乔治的政策主张和丘吉尔很相似。他也主张加强作战力量，全力以赴击败敌人。后来他还得到了殖民大臣波那·劳的支持。波那·劳是保守党领袖，保守党参加联合政府的代表人物。当他们联合起来要求改组政府时，阿斯奎斯便不得不辞职了。1916年12月6日，英王邀请劳合·乔治组阁，仍是个联合内阁。

保守党的头面人物对丘吉尔仍是满怀敌意。本来劳合·乔治有意让丘吉尔重新参加政府，但是保守党的领袖们竭力反对。寇松、罗伯特·西席尔勋爵、奥斯丁·张伯伦、华特·朗等四人甚至提出，如果让丘吉尔参加政府，他们就同政府发生关系，劳合·乔治只得作罢。丘吉尔对此十分恼怒，但他这时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发表他对各项政策的见解和评论，除了在议会中侃侃而谈外，还可以在《星期图画报》上发表评论。此外，他就只能绘画消遣了。

经过几个月的听取证词后，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于1917年1月提出了第一份报告。报告叙述了整个军事行动的来由，在结论中对丘吉尔的批评仅仅是他没有促使海军顾问们的意见清楚地在战事委员会被讨论。报告的主要批评对象是阿斯奎斯。他作为首相竟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3月19日—5月14日）未召集战事委员会会议。报告也批评了克契纳在派遣军队过程中的拖沓，这正是丘吉尔曾经提出过抗议的。不幸的是对克契纳，委员会已无法查问，因为他已于1916年6月在赴俄国途中去世了。

虽然丘吉尔仍认为这份报告不太准确，但他感到还算公正。原来落在丘吉尔一人身上的责任已改由更多的人分担，而且主要责任已明确地归咎于阿斯奎斯首相的领导无方。

这样一来，丘吉尔的第二个问题——在政界恢复声誉一事，出现了良好的转机。可是要达到彻底解决，全面恢复，仍非易事。

面对着联合内阁所处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劳合·乔治对重新任用丘吉尔也是斟酌再三。他知道丘吉尔才能出众，弃之可惜，用之则可以增强联合内阁中自由党的实力，更何况丘吉尔的观点和主张有很多是和劳合·乔治的想法一致的。但是反对丘吉尔东山再起的也大有人在，主要是某些保守党

的领袖人物。对此，劳合·乔治只能一步步试探，并相机做工作。1917年4月，美国宣布

参战，为抗击德国增添了重要力量。这对英国是一大鼓舞。接下来对英国来说便是如何协调力量、加强配合，使战争早日获胜。劳合·乔治在作出其他人事调动安排的同时，7月间未与波那·劳商量便宣布任命丘吉尔来填补军需大臣的空缺，原大臣艾迪生已被调派去负责研究战后复兴问题了。于是，丘吉尔在“流浪”了20个月之后，又重新进入政府。不过，军需大臣一职是1915年开始设立的，属于非阁员大臣，其地位较丘吉尔以前担任过的大臣职位要低。尽管如此，这一职务对当时正在同强敌交战的英国政府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关于丘吉尔的新任命一经公布，政界和报界立刻掀起了一阵喧嚣。《晨邮报》的评论尖酸地嘲讽道，这一任命表明“我国虽然尚未发明一艘不沉的舰艇，却已发现了一位不沉的政客。……我们可以有充分把握期待他继续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保守党的后排议员匆匆聚会，强烈反对任命丘吉尔。身为陆军大臣的保守党人达贝勋爵马上以辞职相威胁，而殖民大臣华特·朗则上书首相，声称很难继续予以支持。约40名保守党后排议员组成代表团，会见参加联合内阁的保守党领袖波那·劳，倾诉他们对丘吉尔重返政府的不满。据劳合·乔治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当时几乎使政府陷于危机。

波那·劳虽然对劳合·乔治在任命丘吉尔之前并未同他商量感到不快，却认识到不应由这一件事而导致联合政府寿终正寝。因此他反而为劳合·乔治辩解，明确表示首相有权作这项任命，如果他认为此举有助于赢得战争胜利的话。既然保守党领袖持这一态度，其他人也就不便再嚷嚷了，抗议之声逐渐消逝。这一波折也使丘吉尔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同时也使他明白了劳合·乔治刚上台之时为什么不能任用他。

丘吉尔到军需部上任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个拥有12000名公职人员的庞大机构，工作体制紊乱，规章不全，效率低落。因此他的首要任务便是改组机构体制，健全财务监督制度，促进有效的运行管理。同时，还不能停止为进行战争所不可缺少的军需生产。当时军需部只负责供应陆军的军需品，海军由海军部自行负责。因此，在原料和劳力的需要上，两个部难免产生矛盾。可是丘吉尔仍是大刀阔斧地推动着他认为应该完成的工作，以至在军需供应方面屡屡获得战场上各路指挥官的好评。不过他也有热心过头的时候。譬如他认为英国舰队已经取得对德国舰队的优势，因而不必再扩建，何况又有了美国海军的支援。于是，他建议建造小型驱逐舰来对付德国潜水艇，并把过期的战舰上的重炮拆下来移到陆地上用。丘吉尔的建议被海军大臣埃里克·盖迪斯爵士认为是插手干涉海军部的政策，气得要辞职，首相劳合·乔治出来加以抚慰才平息。接着，陆军大臣达贝又指责丘吉尔曾敦促联军总司令海格把辖下的一部分榴弹炮转送到俄国前线使用。达贝还批评丘吉尔在一次被邀参加战时内阁会议陈述一桩案情时，竟也参加了表决。这些都是越权行为。不过丘吉尔在军需部的辛勤工作以及出色的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他经常下兵工厂了解情况，一再飞赴法国到前线去。他同法国和美国的军需生产负责人保持密切的联系。目标很明确：战胜德国。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协约国取得了胜利。庆功之余，回顾丘吉尔在欧洲这场空前的战争中的贡献，可以说仅有两项：
(1) 战争初期使皇家海军具有充分准备，从英吉利海峡移驻北海，并把英军

平安地运送到法国；（2）战争后期保证了充分的军需供应，尤其是促成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战争从头至尾四年零三个月，可是其中有一年零八个月丘吉尔毫无作为，对此他自己是颇感遗憾的。

劳合·乔治原打算在战争结束前举行大选。因为自从美国参战以来，各方面进展的情况都预示着胜利确已在握。劳合·乔治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使他和他的政府通过大选赢得稳定的基础，以便更理想地完成向战后和平时期的过渡。但是战争结束得比预期的要早，因此他只能在战争结束后马上举行大选。

1918年的大选颇为独特。劳合·乔治派的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之间的联合依然有效，因而在凡是劳合·乔治派自由党人要保卫其议席的选区，保守党的候选人都撤出竞选。而不属于劳合·乔治派的自由党人则照常须同保守党人展开争夺。这些自由党人奉阿斯奎斯为首领，实际上提不出什么同联合内阁相对的方针政策，因此也难以对选民有号召力。丘吉尔的选区登迪市的报纸《登迪广告客户报》认为：“阿斯奎斯派和劳合·乔治派的分歧仅在于对阿斯奎斯先生的个人尊严的看法，绝无其他。”实际上明确地持不同政见的，只是少数自由党议员和少数工党议员，他们直言不讳反对战争。就总体而言，工党是反战的，但不公开反。在当时“爱国心”仍极强的选民中，直言不讳地反对战争是很难赢得人心的。

丘吉尔在登迪选区的地位很巩固。他曾在1910年的大选中非正式地同工党候选人亚历山大·威尔基结成联盟，赢得了他原有的议席。威尔基在战时忠诚地支持联合政府，因此自由党和保守党都认为这两位再度出马，必可再度获胜。

在工党地方组织的推荐下，另一名工党成员詹姆士·布朗也加入了竞选行列。还有一名禁酒主义者，声言支持工党的史格立姆交也再度参加竞选。这两人都程度不同地反对战争，并且支持工党比较激进的主张。因而在登迪选区的大选中，事实上等于丘吉尔和威尔基为一方，同布朗和史格立姆交为另一方的竞争。威尔基劝告他的支持者把选票平分给他和丘吉尔，丘吉尔也向他的选民号召再把威尔基选上去。

丘吉尔的竞选演说谴责了“绥靖派、胆小鬼、失败主义者”，但不主张对战败之敌索取过量的赔偿，也不主张进行报复。他主张别让英国出现军国主义，要求建立国际联盟以防止再次发生战争。

大选结果在圣诞节过后才揭晓，丘吉尔和威尔基一起获胜。就全国而言，阿斯奎斯派自由党人损失最大，250多名候选人只有29人当选。劳合·乔治派自由党人依靠了同保守党人的联盟，159名候选人中有136名当选。保守党在下院中占了多数；工党获得的席数虽然较前有所增加，但其几位著名领袖人物如汉德逊、麦克唐纳、斯诺顿等都落选了。劳合·乔治虽然获得了胜利，联合内阁依然由他来领导，但是政局并不比过去更稳定，因为在下院占多数议席的保守党已拥有独立否决政府政策的力量。

劳合·乔治重建政府时，于1919年1月让丘吉尔改任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任命一出，报界又议论纷纷，特别对丘吉尔“同时驾驭两匹马”的能力极表怀疑。

大战刚结束，英国国内普遍贫困，罢工迭起，社会动荡不安。陆军部和空军部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将参战的军人复员。数百万在欧洲大陆征战多年的英国军人渴望返回故园与家人团聚，重新过平民生活。在战争结束之前的

1917年，陆军部同政府其他非军事部门商讨后曾订出了一项复员方案，规定为了建设工商业的需要，优先复员工商业需要的人才，这就造成了大量早参军者晚复员、晚参军者早复员的现象，大大地挫伤了军队的士气，有些地方甚至因此出现了示威和反叛。这是丘吉尔必须对付的一个棘手问题。

丘吉尔就任后立即召集军方和非军方的有关人士，包括英军总司令海格在内，讨论这一迫切问题。丘吉尔的建议是取消现行的复员方案而代之以一项以年龄大小、服役长短、伤残轻重为依据的复员计划。他建议让四分之三兵员退伍复员，留下四分之一兵员完成所需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在和约谈判期间和在海外各地执行警卫、占领任务，留下的兵员享受双倍薪饷。同时还招募和训练志愿兵员作为将来的接替，成为和平时期的常备军。这一计划得到了海格将军的支持，后来也得到在巴黎参加和会的劳合·乔治的支持。新计划公布实施后，逐渐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接受，军队的士气逐步恢复。这项在紧急关头采取的断然措施，算是他就任陆军大臣后的第一项政绩。

可是在同一时期，掌管着英帝国军事大权的丘吉尔，又干了一件蠢事，使他的“英名”大为逊色。那就是干涉俄国革命，妄图扼杀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

十月革命发生时，欧战尚未结束，丘吉尔也尚未就任陆军大臣。但当时英国内阁的决策是明确的，就是支持反革命的白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入俄国的协约国军队有英、法、日、美等军队，任务是阻止德军攫取海港设施和军需仓库，并重建东方战线以拖住德军免其西移。这些军队部署较分散，战斗力不强。英军还有两个营曾从海参崴渗入中亚，并同白俄军队的柯尔察克海军上将建立了联系。丘吉尔就任陆军大臣以前就向内阁建议，针对俄国的局势，英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立即全部撤出俄国，或者以大量军队进行更有效的干涉。他表示赞成进行干涉，可是各自治领的总理们不同意，劳合·乔治也认为英国军队不愿意再打一场战争，而且外国干涉反倒可能使布尔什维克政权赢得人民出于爱国心的支持。但是若要同布尔什维克和平相处，就必须抛弃反布尔什维克的一方，这是受保守党控制的下院不能接受的。这样一来，丘吉尔同保守党又站在一起了。

1919年2月，丘吉尔敦促各协约国成立委员会来制订干涉俄国的计划。正忙于和约工作的劳合·乔治首相，觉得让丘吉尔到巴黎去把他的主张向最高战事委员会提出来并无害处，因为他知道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干涉不积极。可是威尔逊在亲自聆听了丘吉尔的建议后，却表示尽管他个人反对干涉，但如果其他大国决定制订联合行动计划，他将接受。丘吉尔由此更积极策划他的反布尔什维克计划了。劳合·乔治对这一事态发展十分吃惊。他电告丘吉尔，内阁尚未授权他进行此事，同时他还把电报的副本转送一份给美国总统。美国也表示反对制订干涉计划，丘吉尔的打算只能放弃。

但是丘吉尔并未放弃反对俄国革命政权的顽固立场。搞不成联合行动，就设法单独支持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军。他向占据着俄国南部的邓尼金的军队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多到足够装备25万人。正是依靠着这些军火，邓尼金的军队才在1919年下半年一度有些进展，但不久就在红军抗击下接连退却，迅速溃败。

在干涉俄国内战问题上，丘吉尔同劳合·乔治发生了矛盾。后者不仅反对英国介入，也不同意向白军提供军需装备。1920年2月，当丘吉尔指责政府对俄国事务缺乏一项政策时，劳合·乔治把丘吉尔训斥了一顿，对他说政

府的方针政策就是“要避免丘吉尔劝说英国内阁采取的那种坏政策招致的后果”。

正是在干涉俄国革命这一问题上，丘吉尔逐渐获得了保守党的赞同而失去了工党和工会对他的尊敬。工党领袖麦克唐纳明确表示，对丘吉尔的这种随意耗损英国的人力和财力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麦克唐纳写道：“丘吉尔先生纵然是个毫无约束的君主，也不可能在花费国家的金钱和人命方面干得更慷慨大方了……对此如果工党不加反对，那它就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反对了。”

劳合·乔治也好，麦克唐纳也好，他们反对干涉俄国革命当然并非出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权的同情。可是丘吉尔顽固地坚持进行干涉，却表明了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仇恨。这同他一向具有的社会改革家的名声全然相悖。究其原因，当然与他的贵族血统有关。可是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对维护英帝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在他眼中，布尔什维克是“有史以来危害最大的暴政”，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尽其所能，力加干涉，妄图扭转乾坤。最后，事实证明了他的失算，非但徒劳无功，而且人财两伤。这是他个人经历上的一次重大失败。

自由党人抑或保守党人

数月前他还什么都不是，现在突然要登上政府内阁第二号高座。这不由使他感慨万分地想起狄斯累利的名言：政治风云真是变幻无穷啊！

丘吉尔由于过分热心于干涉俄国革命，遂对他所领导的陆军部和空军部在战后如何进行改革和紧缩的问题有所忽略。不过在 1919 年的下半年，虽然对德和约已经签订，但对土耳其却尚未作定论，而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即后来的伊拉克）的未来也有待决定，这些地方拖住了不少英军。此外，印度、埃及、爱尔兰等地发生的骚乱也需要临时动用英军。因而陆军的紧缩问题在丘吉尔看来似乎比战前更困难。这时，空军部次官西利又向首相表示，由于丘吉尔身兼两部大臣，难以充分照顾皇家空军，造成空军内部人心不定。首相劳合·乔治就此事同丘吉尔进行了商讨。丘吉尔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任命一位国防大臣，统管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和供应部（即原来的军需部）。他还给劳合·乔治拟了一份可以领导各部工作的大臣名单，其中担任国防大臣的是他自己。

劳合·乔治对丘吉尔的建议颇感兴趣，可是不久便发觉，新成立一个国防部，几乎无法克服政治上的重重障碍。保守党对如此重大的改组是不会马上同意的，而对国防大臣一职的候选人丘吉尔更是难以同意。于是，这个建议只能暂时搁一搁。空军部次官西利在 1919 年 11 月辞职，他在向下院陈述意见时说，虽然他同丘吉尔是最好的朋友，但是与他共事，实在无法相处，因为丘吉尔对空军部的事不大理会，每星期只去上班一小时。丘吉尔辩解说他去上班的时间要比一小时多得多。

到 1920 年，托管领土的边界才划定，叙利亚划给法国，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归英国。英国政府管理这些地区时发现困难重重，因为管理权分散在政府各部门：伊拉克属印度事务部管辖，巴勒斯坦属外交部管辖，亚丁等阿拉伯地区又归殖民地事务部管辖，派驻军队又是陆军部的事。在制订和执行政策方面，问题很多。丘吉尔主张把这些新划归的领土全部交由殖民地事务部管理。但是外交大臣寇松和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都不肯放手。过了大半年，这件事还无法作出决议。由于这些地区的军事开支负担极重，最后，劳合·乔治设法说服了内阁，按丘吉尔的主张办。劳合·乔治还要求丘吉尔再次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统管中东的各托管地，并设法彻底解决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项问题。

1921 年 2 月间，丘吉尔就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暂时仍兼空军大臣。他除了把他多年的秘书埃迪·马许带往殖民地事务部外，还带去了辛克莱少校。他上任后第一件事是同部内高级官员们讨论形势和政策方针，3 月 1 日正式在殖民地事务部内新设中东司。接着筹备到开罗召开一次会议，解决伊拉克的前途问题，同时还要把他的中东政策交待给派驻在当地的总督、高级专员等官员。丘吉尔还把一位传奇性人物，曾在大战期间煽动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土耳其、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前考古学家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招进了新成立的中东司，替他出谋划策。丘吉尔认为，只需派英国皇家空军驻防伊拉克，至于那里的日常治理任务可由阿拉伯人自己负责。在赴开罗开会之前，劳伦斯推荐麦加行政长官的儿子费萨尔酋长充任伊拉克国王，丘吉尔同意了。

赴开罗时，丘吉尔的随行人员有空军参谋长春切德将军、劳伦斯和阿奇波德·辛克莱。埃及的前途问题未列入这次会议的议程，因为它属外交部管，可是丘吉尔在公开发言中把埃及称为大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惹起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愤慨。丘吉尔一行不时遭到扔石块的对待。为了安全，丘吉尔所乘的火车在离开罗好几里路以外就停了车，他改坐小汽车直驶会场所在的旅馆。

会议是成功的，驻伊拉克的高级专员帕西·考克斯爵士接受了丘吉尔的计划，负责安排费萨尔应伊拉克人的邀请来领导伊拉克，显得是一项民主的选择。新政权控制防务和预算。除了英国皇家空军还在伊拉克保留一个基地外，其他英军全部撤走。

丘吉尔一行又坐火车赴耶路撒冷，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那里的犹太人决心定居下来，可是阿拉伯人不愿意，双方冲突不断。丘吉尔到达后公开重申了英国政府的政策：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他还到新建的希伯来大学附近的一个山区亲手植了一棵树，以表示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同时他在会见穆斯林和基督教的阿拉伯代表团时又向他们保证英国政府决不会使他们吃亏。经过他的折冲樽俎，外约旦从巴勒斯坦分离出来，建立了一个酋长国。他让费萨尔的长兄阿卜杜拉酋长治理外约旦。

丘吉尔对这些英国托管领地的安排，对英国政府来说，既保持了英国在当地的最高权力，又大大地节约了英国在当地的开支。

4月，丘吉尔兼任的空军大臣一职改由弗雷迪·盖斯特接任，丘吉尔便专心对付海外领地的问题了。由于十余年前他曾到过非洲，现在作为殖民地事务大臣，更关心当年曾考虑过的开发东非经济的问题。中东之行使他看到了阿拉伯地区的荒芜贫瘠，同时也使他想起了东非的茂盛肥沃。一次，他在曼彻斯特的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会议上说：“在非洲，人民驯顺、土地肥沃；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东，则土地贫瘠、人民凶猛。在非洲小钱能办大事，而在阿拉伯，大钱也只能办小事。”丘吉尔很想让财政部多拨些钱来支持他开发殖民地的计划。这样做还可以兼收解决英国失业问题之益。可是财政大臣——先是奥斯丁·张伯伦，继则是罗勃特·霍恩爵士——都对此不感兴趣，因此丘吉尔无法推行他野心勃勃的计划。

政府内部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常常导致缺乏明确的政策。以东非为例，肯尼亚一直种族纠纷不断。丘吉尔的前任密尔纳勋爵曾向移居当地的白人保证将维护他们的特殊地位，因此就不准移居当地的印度人在肯尼亚高原购地置产。丘吉尔承袭其衣钵，公然声称英国政府虽然承认所有文明民族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这一原则，却认为对印度移民仍应有更严格的规定，他甚至在演讲中宣称“欧洲的民主原则对亚非人民的发展并不适用”。

这种歧视有色人种的观点不仅在殖民官员和欧洲移民中极为普遍，它还迎合了英国很多保守党人士的主张。在这一问题上，丘吉尔基本上是接近保守党的。

作为联合内阁的殖民地事务大臣，丘吉尔对劳合·乔治首相是尊重的，可是他也从不隐讳自己对劳合·乔治的某些政策的异议。他们之间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看法相异。早在1920年3月，丘吉尔在写给劳合·乔治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就主张“对德和，对俄战”，并责怪劳合·乔治采取相反的方针。在土耳其问题上，情况正好相反，劳合·乔治倾向希腊，鼓励其扩张，而丘吉尔则同情土耳其革命领袖凯末尔。两人在这类外交政策上的冲突，使他们的

合作越来越别扭。可是在内政问题上，丘吉利的观点在内阁中是比较接近首相的观点的。他俩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联合内阁于1922年10月结束时为止。

联合内阁存在了近四年。内阁中的保守党成员多数仍支持劳合·乔治，只有寇松勋爵成了反对派。可是在下院，保守党的后排议员一直对这种“联合”方式的内阁表示不满。他们拥戴波那·劳为领袖，终于在1922年10月间的一次会议上经过投票击败了联合内阁。劳合·乔治只得辞职，联合内阁寿终正寝。丘吉尔当然也失去了大臣的职位。波那·劳作为保守党的新任领袖被邀组阁。

波那·劳一上台就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那时丘吉尔因急性阑尾炎刚动过手术，卧床疗养，不能亲自进行活动，于是他派人去他原来的选区登迪市为他作竞选布置。登迪市一直依赖对外贸易，其选民主要是工人，他们曾在1920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萧条中受到很大损失。丘吉尔1921年访问此地时就曾为民生凋敝感到吃惊，但无法作出有效补救。这对他的竞选是个不利因素。还有一个不利因素是当地两家报纸已归一位强烈反对联合内阁的企业主所有，他对丘吉尔毫无好感。面对这些不利因素，加上他病体尚未康复，只是在选举后期才来到登迪市，发表演说时也只能坐着讲，这就为他的竞选前景蒙上了阴影。投票结果，丘吉尔落选，另一位自由党候选人也落选。自由党在登迪市惨败。

丘吉尔对失败倒也看得很开。他后来写道，他这下子成了个“既无官职、又无议席，又无党派、又无阑尾”的人了。

自此之后约有半年光景，丘吉尔不曾在公众场合露面。他于12月初到法国南部，在地中海岸的名城嘎纳租了一所别墅，在那里度过了冬天和春天，其间只在次年2月初回伦敦作短暂的逗留。从2月开始，伦敦《泰晤士报》连载他所写的《世界危机》第一卷。这本书他从1918年就开始写了，内容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经过以及他本人1911—1914年底任海军大臣时期的工作。其中透露了大量从政府文件中摘引下来的机密情况，加上他的文笔生动，使很多人争相阅读。这就引起了下院议员们的纷纷议论，议员们认为丘吉尔泄露了国家机密。首相波那·劳也有此看法。丘吉尔完全不接受这类指责，他在致首相的信中指出：不少前此出版的各种传记和回忆录中早就摘引过政府文件和其他机密材料。由于他言之有据，波那·劳只得让一个内阁委员会对此事再进行研究。丘吉尔仍按原来的设想，在4月出版了全书，同时仍继续写第二卷，包括在1915年发生的事情。第二卷于1923年10月起又在《泰晤士报》摘要连载，全书也在10月正式出版。

在此期间，英国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波那·劳首相因患喉癌而不得不于1923年5月辞职。保守党内实在没有一位极具威望的领袖。寇松虽然资历和声望都不低，但他已受封成了上院议员，按规定不能再被选入下院。最后，经过保守党领导人再三磋商，推出了斯坦莱·鲍尔温来组阁。鲍尔温曾在上届联合内阁中任贸易大臣，只有两年“阁龄”，此番擢升为保守党领袖后，首要考虑便是设法使全党重新团结。为此他又重新提出了改革关税方案，想在当时失业问题严重、人民困苦的局面下，赢得选民的心。他的考虑也获得党内其他领导人如奥斯丁·张伯伦等的支持。11月中，鲍尔温宣布解散议会，全国举行大选。

局势的变化又使丘吉尔回到了政治角逐场。他本没有料到又要举行大

选。而作为一名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他不能不反对鲍尔温的改革关税方案。他想重新成为自由党的一名候选人回到政界。于是他又像在 20 年前在兰开夏郡为维护自由贸易而奋斗那样，公开发表反对改革关税的言论。他的积极性获得了自由贸易工会的欢迎，被邀请到曼彻斯特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会场上座无虚席，听众源源不绝而来，不得已又另辟一个分会场转播他的演讲，两个会场的听众达 6000 人。兰开夏郡当时仍是出口贸易数量最大的郡，如果征收关税，必然会使其利益蒙受巨大损害。因此丘吉尔呼吁人们起来反对关税的号召博得了广泛的响应。

终于，丘吉尔被邀参加竞选兰开夏郡和雷士德郡的议席，他选择了雷士德郡，并积极地投入了新的竞选运动。可是他作为自由党的候选人，在当地的基础不如工党，也没有自由党的报纸可替他宣传。这次大选的主题是关于改革关税，选举结果是又一次拒绝了这一改革，自由党和工党都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议席，这是就全国而言。而在雷士德郡，赢得议席的是一位工党候选人，而不是自由党。这位获胜的工党候选人佩锡克-劳伦斯比丘吉尔大 3 岁，是第一次进入下院，也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新议会中，保守党仍是下院的最大党，拥有 258 个议席，自由党 159 席，比以前有相当大的增长，可是工党比自由党还多，191 席。工党力量的壮大使丘吉尔大为不安。他劝说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同保守党合作，组成反社会主义联盟，以遏制工党。他还向报界发表声明，说“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上台执政，将是全国性的灾难”。可是阿斯奎斯却认为可以试验一下支持工党来组阁，因为工党必须依靠自由党的支持才能执政，它不可能自作主张。阿斯奎斯的决定使丘吉尔大为不满。丘吉尔感到不能再跟随阿斯奎斯了，他决定脱离自由党，独树一帜。

1924 年 1 月，工党第一次组阁，由其党魁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首相。

2 月，鲍尔温宣布，根据选民的意愿，保守党决定放弃改革关税政策。丘吉尔觉得很受鼓舞，便同保守党人取得联系，想在反社会主义这一前提下，得到保守党的某些支持，在不久即将到来的补缺选举中再出头角逐一次。

机遇很快降临了。威斯敏斯特寺院选区的一名议员去世了，丘吉尔便想参加那里的补缺选举。他先是同保守党有关人士商量，答复是不反对他参加竞选。但当地的保守党自己另有候选人，是已故议员的侄子尼可森，因此丘吉尔只能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在 1924 年 3 月举行的这场补缺选举中，丘吉尔得到了保守党领袖鲍尔温在某些方面的支持，报界舆论对他也有利，可是他没有党派机构作后援，也来不及充分发表他所擅长的那种煽动性很强的演说。补缺选举的结果是尼可森获胜，丘吉尔落选。两人所获票数都在 8100 票以上，尼可森只比丘吉尔多 43 票。工党候选人获 6100 多票，自由党候选人的票数不到 300 票。这样的结果对于单枪匹马地进行战斗的丘吉尔来说，已经不容易了。可是这一结果也表明他已经连续三次在竞选中失败了。

丘吉尔自卸任以来已有一年半时间。经历了三次选举，虽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政治倾向已从自由党人转到了独立人士，实际上是又回到保守党方面来了。但他还不能立即重新加入保守党，他得等待时机，体面地回归。暂时他只能保持独立身份。不久，约在 1924 年春夏之交，丘吉尔想出了一个在工党获选票较多的选区建立“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会”的主意，以形成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联合阵线。他想到了过去的一位保守党朋友，如今是利物浦的

保守党领导人的阿契包尔德·萨尔维奇爵士。他函请萨尔维奇爵士来安排并主持一次两党联合讨论会，萨尔维奇表示愿意协助，但主张只召开光由保守党人参加的会议，由丘吉尔来发表演讲。

5月间，集会在利物浦举行，丘吉尔发表了公开演说。在演说中，他表明他并不反对麦肯那税——在战争时期实施的，主要是对外国奢侈品如汽车、钟表等所课的税。在主张百分之百自由贸易的人们眼中，这个麦肯那税无异于木楔子的薄的一头，而木楔子就是改革关税方案。丘吉尔如此表态，说明他对改革关税一事所持的立场已有变化，这对于保守党人来讲，当然是听得入耳的。接着他又应邀赴爱丁堡向苏格兰的保守党人作演说。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离伦敦不远的埃平选区有个保守党人协会，其负责人居然来问丘吉尔是否愿意当他们选区的候选人。原因是埃平选区原来的一位保守党下院议员即将退休，他们怕这一议席落入自由党手中。如果丘吉尔参加竞选，他不仅能获得保守党的支持，也能吸引若干自由党人的选票。不过不能让丘吉尔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竞选，因为说不定一些保守党的顽固派对这样的身份会弃之不顾。可是丘吉尔也不愿在这时就以“保守党人”的身份出现。最后，埃平保守党人协会的负责人建议丘吉尔用“宪政主义者”的身份参加竞选，这是互相让步的结果。于是，丘吉尔又等待着下次大选的到来，以便他重新进入议会。

不久，发生了一件导致工党政府倒台的事。一家共产党报纸的代理主编坎贝尔由于刊登了一篇敦促士兵们不要向“工人兄弟们”开枪的文章，竟以“煽动叛乱罪”遭到起诉。到了8月，起诉被撤销，这就引起了保守党和自由党对政府的攻击。到9月底议会开会时，自由党坚持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此事进行查询。工党内阁知道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工党不利，因而反对成立。这个问题最后于10月上旬在下院进行辩论和表决，结果是政府以198票对364票被击败。于是第二天就解散议会，决定在月底前举行大选。这已是两年内的第三次大选了。

丘吉尔等待了好久的机会终于迅速来到了。竞选一开始，他就四出发表演讲，有时一天讲四场，每次还都得讲出一点新东西来。他演讲的内容主要是对工党政府的批评，同时也对支持工党政府的自由党提出指责。譬如他批评工党政府“处理失业问题彻底失败”，“放弃在新加坡建立基地的提案而使英国海军无力保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在坎贝尔一案中“玩弄手脚，损害了司法的纯洁和无私”等等，这些话都还言之成理。可是有的话，如指责工党的思想本质并不民主等，显然是过分夸大，可是他的恳切的言词和动人的语调，博得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丘吉尔的演讲才能又一次大加发挥，甚至连保守党领袖鲍尔温都受到感动。鲍尔温因此致函丘吉尔，备加慰勉，并表示期待着他的议会才能再度得到发挥。埃平选区的两位保守党前议员也支持他。投票那天，丘吉尔又到选区各处奔走，从而使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打破了该选区有史以来的纪录。投票结果，丘吉尔击败了自由党和工党的候选人，他所获票数几乎超出自由党候选人1万票，超出工党候选人1.6万多票。

丘吉尔又回到了议会，他靠拢保守党使他在下院中属于多数派一方。自由党经过这次选举，议席已减到40席，在议会政治中不起主要作用。重新担任下院议员的丘吉尔下一步关注的是鲍尔温让他在政府中担当什么角色。这次大选中有一个特点，即不少自由党选民第一次投了保守党的票，同时有十几位原先的自由党候选人仿效丘吉尔以“宪政主义者”的身份参加竞选，七

名当选。这股力量虽然尚未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派，却反映着选民中的某种感情因素。如果妥为对待，就有可能鼓励更多的自由党选民投入保守党的营垒。而这股力量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是丘吉尔。对此，鲍尔温看得很清楚。同时，他觉得把丘吉尔揽入内阁要比把他留在内阁外面更好控制。

开始组阁时，鲍尔温请奥斯丁·张伯伦任外交大臣，并请其异母兄弟内维尔·张伯伦任财政大臣。至于丘吉尔，鲍尔温先想请他出任印度事务大臣，后来又考虑让他担任海军大臣或卫生大臣。可是出乎鲍尔温意料的是内维尔·张伯伦竟不愿担任在内阁中地位极高的财政大臣一职，而宁愿任卫生大臣。原因是内维尔·张伯伦过去担任财政大臣时，他的关税改革计划碰了壁，使他心灰意冷。他向鲍尔温建议让丘吉尔任财政大臣，鲍尔温担心那会引起保守党内的吵吵嚷嚷，张伯伦认为即使让丘吉尔重任海军大臣也同样会引起吵吵嚷嚷的。于是鲍尔温拿定了主意，接受张伯伦的建议。

鲍尔温出面邀请丘吉尔出任财政大臣时，丘吉尔先是因意想不到而极感惊讶，继之抑不住强烈的激情而热泪盈眶。财政大臣一职正是他父亲在事业顶峰时担任的职位，也是他自己从小立志的目标。原来似乎远不可及，如今居然近在眼前，数月前他还什么都不是，现在突然要登上政府内阁第二号高座。这不由使他想起了狄斯累利的名言：政治风云真是变幻无穷啊！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年届半百之时成了英国的财政大臣，那是 1924 年 11 月。

不懂财政的财政大臣

专家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位不称职的财政大臣。这是国家的不幸，也是他本人的不幸。

财政大臣一职在内阁中地位仅次于内阁首相。20世纪早期历任英国首相大多数是从财政大臣一职升上来的，如阿斯奎斯、劳合·乔治、波那·劳、鲍尔温等。对于丘吉尔来说，获得此职是他数十年宦途的最大成就。不过，这也是他有生以来最感困难的一项任务，因为他对经济问题所知甚少，财政金融非其所长。虽然他可以依靠财政部内为数众多的专家来经办一切事务，可是决策仍须由他作出，下院的答辩仍须他来应付，向全国解释政府的财政政策当然也仍然是他。

丘吉尔就任财政大臣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是英国是否应恢复金本位制。当时力主恢复金本位制的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自战争结束以来，他一直向历届财政大臣大声呼吁。在工党执政的1924年，曾任命一个以卸任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为主席的委员会考虑恢复金本位制的问题。要恢复金本位制，就得紧缩通货，这固然能使物价降低，但同时也能使失业增加。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反对这样做。委员会最后在报告中虽然主张恢复金本位制，但考虑到将会使失业问题更趋严重，亦同时建议暂缓一年实行，期待英镑对美元的比价再增高一些后，实行起来更为有利。1924年大选后，蒙塔古·诺曼又敦促新任财政大臣恢复金本位制。他为了应付改制之初可能产生的困难，于12月初去美国洽商了一笔5亿美元的备用贷款。1925年1月末，比弗布鲁克的《每日快报》对恢复金本位制的主张大加抨击。到底改不改制，这确是丘吉尔上任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考验。

丘吉尔比较谨慎，因为他也拿不定主意。到3月，此事看来非作决定不可了，丘吉尔便举行一次晚宴，邀请财政部主张改制的高级官员以及反对改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前工党财政大臣麦肯那一起参加。反对者历数改制必然产生的不利，而支持者则认为不利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对发展经济是有利的，尤其是对银行业、保险业、海运业等。最后丘吉尔接受了支持者的意见，决定在4月间作预算报告时提出恢复金本位制的主张。

这是丘吉尔第一次作预算报告。但是在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下，要想使他的预算报告博得大量喝彩声实在不易。钱从哪里来，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曾向鲍尔温首相提出限制军费的建议，可是海军和空军都已制订了若干年内的扩军计划。他只有在税收上动脑筋。他的办法是一方面决定将所得税减收6便士，成为一镑只抽4先令，这是减税；另一方面增加了一些间接税，如对丝织品征税，并且恢复了战争时期麦肯那制定的对进口高级消费品的征税。他在预算报告中还建议给孤儿寡妇发补助金，并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限制从70岁降到65岁，以此争取人心。丘吉尔在预算报告中的某些主张正是他过去竭力反对的，这也是他向他的保守党新同僚们所显示的一种姿态。预算报告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多年来一直把丘吉尔视作他们最杰出的旗手的那些坚持自由贸易的人，则认为丘吉尔已背叛了他们的事业。

发表演说获得成功并不能保证施政也能获得成功。几星期后，劳合·乔治开始抱怨恢复金本位制之举加速了出口工业的困难，尤其是传统的出口商品煤。固然，石油的竞争、德国鲁尔的煤恢复出口、海外市场缩小等都是影

响因素，但是英镑比值调高，使出口煤涨价，也是销路下跌的重要原因。

当时的世界贸易模式正经历着一场新的变化，英国工业在适应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此时进行改制，实行金本位制，实在是平添困难。虽然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主张改制最坚决，但丘吉尔是财政大臣，最终责任还得由他承担。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凯恩斯是对的，恢复金本位制是失策的。因此，在屡遭困难后，到了1931年，英镑又不得不贬值，金本位制也不得不取消。

丘吉尔第一次作预算报告时，对海军的扩建计划非常不满。海军的扩建主要是一些陈旧的舰艇需要更新，不然便难以维持英国在海外的力量。英国一向以海军强国自诩，在战后的新形势下当然也不能较其他海军强国逊色。而丘吉尔为了要减少开支，坚决不同意扩建计划。他的理由是，在20年内英国不会同第一流的外国海军进行对抗。他认为，德国海军已经垮掉，美国海军并非敌对力量，剩下的只有日本海军。而英国是不可能同日本作战的。他甚至认为留驻一支舰队在新加坡也是多余。而这后一点在过去工党政府提出建议时，正是他大加反对的。

海军大臣布列吉曼对丘吉尔的态度极为恼火。布列吉曼认为，如果英帝国的舰队不能保持历来具有的威力，帝国就不成其为帝国了。因此扩建海军、更新舰艇是他海军大臣的职责所在，无可让步，除非他辞职。这场争论从下院闹到内阁，看来难以平息，唯有海军大臣辞职似乎才是解决办法。这时，保守党议员和党内一些重要人物都提醒鲍尔温首相：如果海军大臣被迫辞职，事情就严重了，只有首相亲自来调解才能解决。鲍尔温在同双方磋商后作出了两头兼顾的决定：海军增建计划大部分都可接受，但是须想方设法节约开支，譬如新建舰艇的大小可以考虑减缩，有些开支可以在下半年财政年度拨付等等，总算使这场事端暂时平息下来。

就在保守党内阁和党内为海军预算争论达到高潮之时，又发生了另一件对财政大臣的预算计划构成威胁的事，那就是煤矿亏损严重，难以维持。由于成本增加、出口下降，各大煤矿都发生了财政困难。6月底，矿主们提出终止和矿工们签订的合同，除非矿工们恢复一天八小时劳动而不是七小时，否则只能削减工资。可是削减工资必然会使得失业增多。煤矿工会已经准备举行全国性大罢工，而铁路工人和其他运输业工人也可能采取联合行动。于是，摆在政府面前的抉择是：要么面对一场大罢工，要么在寻求解决办法期间向各煤矿提供临时津贴，使之度过几个月的难关。到7月30日，即合同期满的前一天，内阁决定拨付约九个月的津贴，同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煤矿业的困难，提出解决办法。这一决定是鲍尔温和丘吉尔都同意的，但并不是全体内阁成员都同意。充其量只是个临时性的措施，距问题的解决还很遥远。可是为了拨付这笔津贴，财政大臣丘吉尔又得到处寻找经费来源，他建议削减卫生保健费和失业保险金。当他于1926年初将这一建议列入一项经济法案送交议会时，遭到工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他们在下院辩论时把财政大臣称为掠夺人民的“强盗”，丘吉尔答辩时说，对于一个过去常被反对党称作“凶手”的人来说，被称作“强盗”已是蒙受“某种提拔”了。

向煤矿发放津贴九个月的期限很快又将届满。老问题仍然存在，有待迅速解决。节流固然有用，但总不如开源更为理想。丘吉尔又在增加税收上动了不少脑筋，包括提高若干税率以及其他一些权宜措施。而其中最出人意料的是，他提出了征收赌马税的新建议。赛马场上赌注向来不小，政府要抽些

税似乎也说得过去。只是一批靠赌马吃饭的人对此很有牢骚，而一些正统人士则认为太不像话。丘吉尔其实也仅仅将此举视作应急措施，因为政府征收了赌马税，无形中就会鼓励赛马赌博中的一些非法活动的增多。所以尽管丘吉尔决定征收这笔税，却在以后每年的预算报告中都对实施办法作些修正，直至 1929 年宣布全部取消。

煤矿的问题仍未解决。矿主们要求“减少工资，增加工时”，矿工们则坚持“工资一便士不减，工时一分钟不加”。1926 年 4 月，谈判破裂，总罢工有一触即发之势。5 月 2 日晚，《每日邮报》的工人拒绝为一篇指责罢工威胁的社论排版，其他报纸的工人也都一致罢工。丘吉尔觉得必须有一份临时性的，能代表政府发言的报纸出版。《晨邮报》的主编葛温首先表示愿意让政府来利用该报的设备，于是丘吉尔在 5 月 3 日傍晚偕同空军大臣萨缪·霍尔和一位初级大臣戴维森去该报馆，安排出版一份新的官方报纸。丘吉尔认为，“大量工人并未积极投入这场冲突，他们像足球观众一样等着看政府和工会哪方面力量更强些”。因此他非常重视这张报纸的出版。5 月 5 日，这张名为《不列颠报》的报纸问世了。几天内发行量从 23.2 万份迅速跃至 250 万份，成为当时全球第一大报。到 5 月 13 日工会宣布取消罢工后，这份报纸才停刊。

《不列颠报》的出版虽然与丘吉尔的努力不可分，但是实际上掌权的是戴维森，他曾当过鲍尔温首相的议会私人秘书，能直接领受首相的指示。戴维森有权对稿件进行检查或删节、扣发，即使是丘吉尔写的稿件也不例外，他也曾扣发过几篇丘吉尔写的稿件。丘吉尔对报纸很关心，什么事都要插上一手。葛温致函鲍尔温，要求制止丘吉尔到报馆去指手划脚。他写道：“他常在别人最忙的时候闯进来，坚持要改动这个那个标点符号，弄得大家一肚子火。”戴维森也曾气忿地写道：“丘吉尔简直自以为是拿破仑。”丘吉尔在他写的未发表的社论中主张对罢工者显示力量。而鲍尔温等则认为此说无异公开挑衅。可是事实上内阁早已作了显示力量的准备，组织了一批义务兵作为警察的后盾，只不过他们将以持短棍、戴臂箍的便衣形式出现罢了。

工业方面的这些严重损失还影响到下一年度甚至再下一年度的经济情况。丘吉尔于 1927 年 4 月作预算报告时不得不指出，上一年的罢工造成的财政亏损达 3200 万英镑，而在下一年，税收方面估计还要损失 1800 万英镑。因而丘吉尔在往后两年中的主要使命，便是想方设法增加国库收入，弥补亏空。他自己认为，作为财政大臣，他必须设法帮助工业复苏并有所发展，因此，解决大量失业的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6 月，他向鲍尔温首相提出一项建议，主张取消工业和农业的地方税，减轻业主的捐税负担，以促进生产、增加就业。因此举而减少的约 3000 万英镑税收，他认为可以从征收石油税和紧缩海军开支来加以弥补。这一建议在内阁中引起反对。卫生大臣奥斯丁·张伯伦便是一个反对者。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最后的妥协方案是工业地方税不全部取消而是取消四分之三。

丘吉尔在向下院发表 1928 年预算报告时提出了这项方案。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半小时，指出英国的主要工业部门的不景气已成为慢性顽症，失业人数多达百万，而恰恰是这些工业部门承担的地方税最重。他宣称自 1929 年 10 月起，工业的地方税将豁免四分之三，农业地方税全部豁免，同时对汽油每加仑将征税 4 便士，总的政策是帮助生产者，以解决经济问题。

整个方案是 1929 年开始实施的。那一年又是大选年，各政党的领袖人物

早就开始为大选而忙碌了。丘吉尔起初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抱乐观态度：他在1928年曾认为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是得人心的，他的减税措施赢得了业主们的拥护，至于失业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则是谁主政都同样会碰到的难题。后来，他的乐观情绪逐渐消失了。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他察觉到选民的意向并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样对他有利。大选前几个月，丘吉尔找劳合·乔治商谈，探询如果大选结果同上次相似，即没有哪个党占压倒优势，自由党是否愿意同保守党合作。探询结果并不如意。这次大选自由党提出了大量候选人，数目之多为1906年以来历次大选中最多的一次。当时不少政府大臣对即将到来的大选都抱乐观态度，唯有丘吉尔例外。

在丘吉尔自己的选区，1924年的老对手自由党的格兰维尔·夏普依然是他的头号劲敌。这次的工党候选人纽博德是原来默德威尔选区的共产党下议员。丘吉尔除了像以往那样每天发表多次竞选演说外，妻子克莱门塔茵及儿子伦道夫、女儿戴安娜也一起上阵，为他出力。选举结果他仍以最高票获胜，共获23900多张票。可是他的自由党劲敌也获得19000多张票。工党的纽博德获6400多张票。丘吉尔并未取得绝对多数。

1929年5月底，全国选举结果揭晓。工党获288席，保守党260席，自由党59席。保守党失败，鲍尔温下台。工党党魁麦克唐纳再度受命组阁。

回顾保守党的五年政绩，可以说乏善足陈。保守党内阁一直致力于社会改革，可是从广大选民的角度来看，失业问题未解决好就是最大的失败。恢复金本位制后来被证明亦是错误的，丘吉尔在1927年就私下承认了这一点。尽管那是他属下的专家们和银行行长的主张，但他作为财政大臣接受了这一主张，仍要负全部责任。这也是他不懂经济和金融的一个必然结果。

类似的情况在丘吉尔对待外国的态度中也有发生。英国的一些前盟国欠英国的债，其总数超过了英国欠美国的，因此当美国希望英国还债时，英国自然也希望那些国家归还欠债。曾经陪同丘吉尔参加过数次债务谈判的雷斯-罗恩认为，丘吉尔在谈判时“对技术性问题一窍不通”，而且丘吉尔很容易为这些前盟友的恳求所动，结果往往是英国国库吃亏。雷斯-罗恩写道：“同法国和同意大利所作的谈判，从头至尾都是温斯顿主持的。事后我们发现，在这两宗谈判中，对方政府曾容许其代表作出的让步，要比温斯顿后来得到的让步大得多。”

丘吉尔在财政事务上唯一还算精明之处，是在监督陆海空三军的预算和开支方面。由于他担任过各军部的大臣，所以要减或要卡都讲得出道理。军队对丘吉尔的评价是：铁石心肠。

在这届保守党内阁执政的近五年中，国防预算实际上并不曾减少。1923年国防预算为1.05亿英镑，到1929年是1.13亿英镑，而且这期间的物价还在下降。但是丘吉尔受到的批评是“他使英国的国防削弱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以致到了30年代，即使想加强国防也一时难以奏效”。这话也许有些夸张，可是丘吉尔在国防战略上过分乐观，作出错误的估计，却是不容置辩的事实。譬如他在致鲍尔温的私人信件中曾认为，“在我们这辈子”或“在今后20年内”都不必去考虑同日本作战的可能性，而历史后来的进程否定了这一估计。

丘吉尔这次离开内阁时将近55岁。自他初次参加政府担任初级大臣以来，20多年中上台下台已经很多次了，但这一次是下台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再重返内阁将是10年以后的事了。

十年赋闲

闲来致力于写作和绘画，并自豪地告诉别人，要是一天不完成两幅画，他就会感到这一天白白过去了。

卸下了财政大臣重任的丘吉尔一身轻松，然而赋闲久了，也会百无聊赖。赋闲期间，他的主要活动一是写作，二是旅行及其他消遣。

写作可说是丘吉尔的老本行，每当他不担任公职时，往往致力于写作。他写作的方式不是动笔而是口述，习惯于在构思时喃喃自语，一旦决定了如何遣文造句，便大声朗诵出来，让秘书用速记写下。他写书、著文，起草演讲稿都是循此方式进行的。

早在他任陆军大臣时，就已开始写《世界危机》。到1921年初他所签订的合同已达数千英镑。《世界危机》共完成4卷，获得舆论的好评。到1931年他又出版了经过修订的《世界危机》的节略本，其中增添了一章关于马恩河战役的描述。他在这次离任后的一年内为报刊写了40篇文章，其中一半以上刊载于《每日电讯报》。1930年9—10月，《新闻纪事报》连载了他的回忆作品《早年生涯》，此书在10月出版时颇获舆论赞扬。丘吉尔在晚年时也承认该书是他的最佳作品。

1931年开始，他逐渐将酝酿了很久的一项计划付诸实施，那就是他一直打算写的一部关于他的伟大祖先第一代马尔勃罗公爵的传记。为此他开始了对古战场的巡礼，还邀请了有关的历史学家及马尔勃罗家族的后代参加。他写这部书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澄清别人著作中述及他这位祖先生平时的一些虚妄不实之处。

《马尔勃罗：他的生平和他的时代》第一卷于1933年10月出版，内容从公爵出世一直写到1702年，书中包括大量的插图、书信文件的复印本、作战地图等等，全书厚达600多页。丘吉尔原来打算只写2卷，约20万字，结果由于搜集到的资料异常丰富，使他不得不改变计划，最后成书4卷，总共约100万字。第二卷出版于1934年10月，最后两卷1936、1938年问世。这部传记的成功使丘吉尔获得了传记作家的尊称。

丘吉尔对历史的兴趣不仅表现在对他光荣的祖先的追溯和推崇，还在于对不列颠、对英帝国，以及对所有英语民族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他很早就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并想撰写一部英语民族史，以确认各英语民族的共同传统。这一想法终于在1933年成为事实。那一年他同伦敦的卡赛尔出版公司签订合同，写一部40万字的《英语民族史》，并预支了2万英镑的版税。这项计划是他继马尔勃罗传记之后的一项巨大工程。30年代后期的欧洲形势变幻莫测，要在那种气氛下安下心来写历史颇不容易，不过丘吉尔似乎还有这样的本领。当1939年3月希特勒并吞波希米亚(捷克斯洛伐克西部)之时，丘吉尔正在撰写17世纪后期的历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完成了50万字的草稿，而且大部分已排出校样。可是后来只能暂时搁置起来，一直等到战争结束后，到50年代后期才全部完成。

在撰写上述巨著的同时，丘吉尔还经常抽暇为报刊写稿。他几乎可以定期收到报刊付给的稿费。他的文章不仅刊登在英国报刊上，还刊登在美国报刊上。他在1936年初替《世界新闻》写的一系列总题目为“我们时代的伟人”的文章，于次年汇总成册，以《伟大

的同时代人》为书名出版了。他为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的《旗帜晚报》写的一系列国际问题的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发表于欧洲其他二十多家报纸，后来也汇集成册，以《逐步》为书名于1939年出版。丘吉尔在卸任后这段时期的年收入约为2万英镑，比他当大臣时的俸禄多得多。

除了写作以外，丘吉尔以其广泛的兴趣作了很多消遣活动。譬如原来他就爱好驾驶飞机，这在他任空军大臣时很容易找到机会。有时因公出差飞渡英吉利海峡时，他便和驾驶员轮流驾驶。在一次驾驶飞机时发生事故，几乎摔死，他才放弃了这一爱好。后来他又改为打马球，但是有一次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跌得一身青肿，被迫卧床一个星期。

比较安全的消遣，对他来说要数砌砖和绘画了。他很善于砌砖，时常在家院里需要砌砖的地方（如围墙、游泳池等）消磨一段时间。至于绘画，则是早年培养起来的一项爱好。他认为绘画是真正的休息，可以顿时忘掉一切杂务，神经充分松弛。一般评论认为丘吉尔虽然对色彩有敏锐的感觉，对情景也掌握得较恰当，可是技巧不行，因而画得很差。丘吉尔自己则对人说，要是一天不画成两幅画，他就会感到这一天白白过去了。而那人回答说，专业画家要是能在两个月内完成两幅画，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丘吉尔在这段时间内的最大消遣，还是去国外旅行。他在这几年中不止一次去过美国、欧洲大陆，还去过中东和北非。就在卸任的当年，他就和弟弟杰克以及各自的儿子伦道夫（18岁）和焦尼（20岁）一起到加拿大和美国旅行。四人先乘轮船到魁北克，然后换乘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副董事长提供的一节专用车厢，畅游北美大陆。车厢中设备齐全，还配备了专门的厨师和侍从。这对一位卸任的大臣来说，是极为优厚的礼遇了。他们于9月进入美国，受到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金融家巴鲁克的接待。在加利福尼亚州时又受到报业巨子赫斯特的招待，在他家住了四天。在好莱坞时，丘吉尔和卓别林交上了朋友。他建议卓别林演一部关于拿破仑的影片，由他来写电影脚本。在巴鲁克的安排下，丘吉尔一行从洛杉矶又坐专用车厢，一路游览驶向东海岸。10月中旬，丘吉尔在首都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胡佛和一些国会议员。

1929年夏，美国的经济状况正处于景气的高峰，所以丘吉尔最初看到的是一片表面上的升平景象。可是到达纽约后，正赶上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崩溃，美国开始了大萧条。丘吉尔后来在写给伦敦《每日电讯报》的通讯中就有这样的目击记录：“就在我的窗户下面，一位男子从15层楼纵身下跳，一下子就跌得粉身碎骨，引起了街上一大阵骚动。”

但是美国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影响丘吉尔的乐观态度。他打算过一年再去美国作演讲旅行。他知道在美国作40次演讲就可以除开支外净赚1万英镑。1931年12月，丘吉尔又来到美国。时间比原定计划有所推迟，那是因为英国国内政治局势使他无法如期于秋天成行。可是到了纽约后，竟不幸遇到车祸，演讲旅行计划不得不再度延期。

发生车祸那天，他在所居住的华道夫—亚斯多丽亚饭店用罢晚餐后，应老朋友巴鲁克之邀去他家晤谈。当他跨过街道时，忘了美国的交通规则是车辆靠右行驶而不是像英国靠左行驶，因此过街时没有先往左面看一眼。恰好有辆汽车驶来，把他撞到了。幸而骨骼未折，不过全身严重擦伤，脸部也有伤痕，而且受到严重震荡。所幸丘吉尔头脑仍很清醒。他向来到现场的警察说明事故全赖他自己，不应责怪司机。他被送进医院治疗，住了八天，到圣

诞节前才出院。过了新年他又在妻女陪同下乘船赴巴哈马群岛的拿骚疗养，到次年1月底才回到纽约，开始实现他的旅行演讲计划。

在往后数年中，丘吉尔几次去法国度假，1934年下半年他还访问了巴勒斯坦。1935年末至1936年初他是在西班牙和摩洛哥度过的。1936年夏天、1938年初、1939年初，他都到法国南部度假胜地小憩。他在卸任后的10年内，国外旅行活动相当频繁。

在丘吉尔的半生宦途告一段落之际，回顾一下他前半生的成败，可以认为他作为政府官员是相当成功的。自他于1905年初进入政府至1929年卸任财政大臣的24年中，他只有两年在野，其余22年中他历任10项政府大臣高职，达到了仅次于首相的地位。这在同辈人中找不出第二个。加上他在写作方面的成就，使他拥有相当大的名声。但是他的颇为古怪的性格和带有机会主义特点的行为，也使他树敌不少。在政府内部，下属们对他经常喜欢干涉他们份内之事很为恼火；同僚们也不喜欢他在内阁会议上经常同别人意见相左；他的上司，内阁首相，则往往是既欣赏丘吉尔的才能，又难以容忍他的固执。海军司令布列吉曼曾把丘吉尔描绘为“我所有的同事中最难以形容，最令人惊讶的人物，……但是冲着那些与众不同之处和令人困惑的方法，人们也不免会对他有好感，更何况他能力高强、精力充沛”。

丘吉尔两度转党，使他在一般人眼中显得缺乏坚强的党性。他自称主张自由贸易，但是这一立场也并不坚定。政敌们在这方面对他攻击最厉害。当他担任了保守党内阁的财政大臣后，来自他的前盟友自由党方面的嘲讽也很尖锐。《曼彻斯特卫报》评论道：“丘吉尔先生已第二度跳离沉船了，而且是第二度因这一美妙的本能而获得了不仅是安全登陆而且是官职高升的酬报。”

但是也有人认为丘吉尔并非是依靠玩弄政治权术来达到左右逢源之目的，而是半靠运气，半靠他那雄辩的口才和演讲才能。这一看法并非毫无根据。丘吉尔在下院中的发言确曾使很多议员获得深刻印象。他以大臣身份所作的报告，经常是观点明确，分析透辟，条理分明。他的演讲往往能使大多数听众对他的推论深信不疑。在进行政策辩论时，他经常能以渊博的知识和出众的记忆，迅速找出对方发言中的弱点而予以猛击，从而争得自己论点的优势。他在这方面的才能是不论敌友都公认的。作为他的后辈的年轻议员哈罗德·麦克米伦便曾写道：“对于丘吉尔显露出来的机灵、幽默，足智多谋和雄辩技能，谁都不禁会露出钦佩的心情。”重视丘吉尔的这一才能的人还包括劳合·乔治和鲍尔温。在他们受命组阁的前后十多年期间，不论是联合内阁还是保守党内阁，他们都有过一种考虑，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丘吉尔站在反对派一方随意鼓舌。鲍尔温虽然曾担心让丘吉尔入阁可能会更加疏远工党，可是丘吉尔的智谋和辩才仍使他觉得对他极为有用，因而终于委以重任，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另一方面，保守党内也有对丘吉尔十分厌恶的人，如主张关税改革最坚决的艾默里。他曾写道，鲍尔温“对于丘吉尔和我能够相互抵消，颇为满意”。因为艾默里主张亲近工党，而丘吉尔主张同自由党联合，艾默里坚持关税改革而丘吉尔坚持维护自由贸易。丘吉尔是到1925年后期才正式再次成为保守党人的，可是他在1924年，就当上了保守党的财政大臣。保守党内的关税改革派对此都心有不甘。艾默里直到1928年11月时还在日记中指责丘吉尔的财政政策，他甚至希望保守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被击败，以便摆脱丘吉尔造成的负担。

1929 年上台的工党内阁到 1931 年 8 月便同保守党一起组成了国民内阁，仍由麦克唐纳任首相。丘吉尔对此十分不满，他在讲话和文章中都毫不隐晦地宣泄了忿怒，矛头直指工党。他特别憎恶麦克唐纳，提到他时往往出言不逊。这种缺乏政治家风度的恶劣表现使他在自己党内也失去不少同情者。

1935 年 6 月，麦克唐纳退休，鲍尔温继任国民内阁首相，萨缪·霍尔接替约翰·西门任外交大臣，财政大臣由内维尔·张伯伦担任。鲍尔温曾经同《泰晤士报》总编辑道森谈论过是否再让丘吉尔入阁一事，道森持否定态度，理由不仅在于党内对丘吉尔仍无好感，而且“由于外交和国防事务将占主要地位，而丘吉尔在这些方面特别能起捣乱作用”。丘吉尔在新政府中得到的任务是担任防空研究委员会的一名委员。鲍尔温说道：“我的这一邀请并不是企图封住他的嘴，而是要表示对一位老同事的友情。”鲍尔温向丘吉尔保证决不限制他对整个国防政策进行批评。丘吉尔担任新政府的防空研究委员会委员期间，增长了不少有关知识。这对他后来在“不列颠之战”和“闪电战”中了解其战略战术有莫大的帮助。这时丘吉尔已年届花甲，谁也不会料到他能东山再起，在英国政治舞台上以至世界政治舞台上完成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演出。

1935 年 12 月，外交大臣霍尔得知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有限制裁并不能阻止它征服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便同意法国外长赖伐尔的意见，想对意大利表示妥协，把阿比西尼亚的一部分领土割让给意大利。这一计划违反了国际联盟的原则，在英国国内引起了朝野一致的忿怒。首相鲍尔温无法应对，便决定让霍尔辞职，尽管霍尔的计划曾得到内阁同意。接任外交大臣的是坚决支持国际联盟原则的年轻保守党议员，39 岁的安东尼·艾登。

霍尔辞职的这一不愉快插曲使鲍尔温丧失不少威信。不久，内阁决定任命一位大臣来协调三军的国防计划。奥斯丁·张伯伦认为这一新职的最佳人选只能是丘吉尔，因为他对陆、海、空三军都有领导经验。可是鲍尔温不愿意让一位个性坚强的人来担负这一要职。最后任命的是原检察长英司吉普爵士，此人对高层的军事领导毫无经验。可是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和保守党首席督导大卫·马格松都认为此人是“最令人放心的人”。

1936 年 3 月 7 日，希特勒突然重占莱茵非军事区，制造了新的国际危机。法国似乎无意采取对策。政府内部对此意见分歧，毫无作为。这样就使希特勒毫不费力地赢得了一次胜利。丘吉尔感觉到希特勒有扩张野心，坚决主张英国应该在军事上有所准备。他同几位资深的保守党后排议员，包括奥斯丁·张伯伦和罗勃特·霍恩，一起相约作周末聚谈，讨论英国该如何重整军备。最后他们要求同首相谈一次，以便将他们对扩军的意见同鲍尔温进行商讨。丘吉尔是主要发言人，他向首相提供了来自法国的最新情报，据估计，德国第一线空军实力已达到 1236 架飞机。丘吉尔着重指出，英国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险。鲍尔温虽然也承认英国在军备方面已经落后，可是他毫不迟疑地拒绝了丘吉尔提出的采取全面紧急行动的主张。

到 1936 年底，鲍尔温的声望跌到了最低点，内维尔·张伯伦似乎是最有希望的继承人。早在 8 月间鲍尔温遵医嘱休养三个月时，张伯伦已开始接手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了，不过张伯伦对外交问题并不在行。当时各党都有赞成丘吉尔扩军主张的动向。丘吉尔在其下院同事们眼中的形象也有所好转，因而他的发言也比过去得到更多的注意和赞赏。很多自由党人现在也承认扩

军的必要性了。工会领袖们以及知识界的社会主义者也都先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赞成“国际联盟”原则的保守党人也越来越把丘吉尔看作他们事业的斗士。

正在 1936 年即将逝去的日子，英国突然发生了一场宪政危机，那就是轰动全球的英王爱德华八世与美国公民辛普森夫人之间的恋情。此事发展到了需要紧急处理的阶段。英王不顾一切障碍执意要同离过两次婚的辛普森夫人结婚，这在英国政坛和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首相鲍尔温对英王说，如果他不立即改变主意，就只有逊位一途了，以免英国的政治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反对党领袖和各自治领总理也支持鲍尔温敦请爱德华八世逊位的主张。下院的动向也是倾向于支持鲍尔温。丘吉尔自 1910 年任内政大臣时起，就同当时的王储、如今的国王，极为友好。他对爱德华八世的情况较为同情，但此时也不可能有所作为。12 月 4 日晚英王决定逊位，他的统治在 12 月 11 日正式结束。一场宪政危机安然度过，这就使鲍尔温的声望一下子又提高许多，原来动摇的首相地位又稳固了。从此一直到新国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之后，鲍尔温所处的政治局面始终是比较稳定的。鲍尔温最后是在 1937 年 5 月他快到 70 岁生日时退休的。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继任首相，并担任保守党党魁。

张伯伦上台初期，陆军大臣雷斯利·豪-贝利夏曾敦促他邀丘吉尔入阁。但是张伯伦担心丘吉尔进了内阁会喧宾夺主，未予同意。他对豪-贝利夏说：“如果我让他入阁，他就会主宰整个内阁。他甚至会连讲话的机会都不给别人。”

张伯伦当首相后和鲍尔温大不相同的一点是他事事都要管，从而使各部大臣都像只是助手。这种独揽大权的风格很快导致了他同外交大臣艾登的摩擦。1938 年 2 月，艾登愤然辞职。丘吉尔为此忧心忡忡，担心今后英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因为丘吉尔和艾登已看到，张伯伦正在采取一味向独裁者让步的政策，以避免国际冲突。这种姑息政策正是他们所坚决反对的。

希特勒上台五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已充分暴露了他的扩张野心，这是张伯伦也看到了的。但是如何才能遏制希特勒，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张伯伦认为，美国倾向于孤立主义，保持中立，英国不能以指望从美国得到帮助作为考虑外交政策的基础。英国只能以法国为主要盟国，此外就得尽最大努力减少潜在的敌人。艾登则认为英国很难主动减少潜在的敌人，因为德意日都明显地野心勃勃。要实现其野心，必然会侵犯英国的利益。若想进制其野心，英国必须同明显的友邦加强联系，包括美国。这也是丘吉尔的主张。在具体问题上，意大利侵略了阿比西尼亚后，张伯伦准备对意大利的占领给予法律上的承认，而艾登则反对让步。当首相和外相的政策分歧在内阁中进行讨论时，艾登得不到多少支持，所以他只能辞职，次官克兰邦也跟着辞职。哈利法克斯接任外交大臣。两个月后英意协定签字，英国对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给予了法律上的承认，而意大利只对英意友好作了含糊的保证。

丘吉尔在下院中又一次站到了反对政府的一方。他曾为艾登和克兰邦在下院发表的辞职演说大声喝彩。他在此后下院的辩论发生重大分歧时，不再投政府的票，而是弃权。随同他一起弃权的通常总有 20 多名政府一方的议员。不过那时还没有形成明显的接受他领导的集团。

3 月，希特勒背弃诺言，悍然占领了奥地利，从而从三面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丘吉尔主张英国同法国、苏联一起宣布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法

捷两国已经结盟而苏联也已答应予以支持。为此他在5月和6月到好几个大城市去发表演讲，呼吁各大国联合维护和平。8月底，丘吉尔写信给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请他促成英法苏三国向德国发出集体警告，申明三国对和平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愿望，并且告诫德国，任何侵犯将惹起严重后果。但是这类主张都被张伯伦否决了。张伯伦不愿英国同法苏合作采取行动。为了避免卷入战争，张伯伦不仅决定不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反抗德国，而且还想设法使法国摆脱向捷克斯洛伐克应允的义务，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以姑息希特勒。

9月中旬，危机更趋尖锐，张伯伦决定实现一项早就打算采取的行动——亲赴德国会见希特勒。英国首相要来访问，希特勒不便拒绝，于是在9月15日，两人在贝希特斯加登见面了。会见时，希特勒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不仅要求民族自治，而且要求把他们居住的地区都划归德国。此举将使捷克斯洛伐克除了丧失领土之外，还将失去唯一可守卫的国防前线 and 切断好多条天然的交通干线。捷克斯洛伐克当然不会答应。可是张伯伦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并马上回国先说服了英国内阁，再设法说服法国，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就范。法国的达拉第内阁于是威胁捷克，表示如不接受这一决定，法国将撤回根据法捷条约所作的保证。在大国的粗暴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接受肢解其领土的决定。

张伯伦的姑息政策发展到如此地步，使丘吉尔深感震惊。9月20日他到巴黎访问，拜会了他在法国政府中的好友保尔·雷诺（时为财政部长，后来担任总理）和乔治·芒代尔（国民议会议员），他俩也是忧心如焚，打算辞职。丘吉尔劝他们不要辞职，留在政府中发挥作用。丘吉尔回到伦敦后发表声明，宣称英法两国政府目前的做法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在纳粹武力威胁面前的彻底投降”。

当张伯伦再去德国给希特勒回话时，后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让德国军队立刻进占捷克斯洛伐克的那部分日耳曼人居住的领土。新要求使张伯伦目瞪口呆。他原以为希特勒的要求已得到满足，没有料到纳粹德国会得寸进尺。张伯伦只能再回去征求内阁的意见。他仍想说服内阁接受希特勒的要求。9月25日，英国内阁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使张伯伦感到意外的是一直持绥靖立场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主张拒绝希特勒的无理要求。哈利法克斯经过审慎思考改变了看法，开始同意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在第二天拜访了张伯伦，向他重申了由英法苏发表联合声明的建议。哈利法克斯也在场，基本上同意丘吉尔的意见。最后由外交部单方面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法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和苏联将支持法国的做法。与此同时还宣布了紧急状态，召集空军辅助队，动员海军舰队。

9月28日，张伯伦向下院报告这一事件前后的情况时，会场中坐满了人，气氛十分紧张。当张伯伦把事情经过叙述了约一小时后，接到一张便条，内容是希特勒已同意推迟24小时动员，以便同张伯伦、达拉第、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举行会谈。张伯伦立刻喜逐颜开，整个下院顿时一片欢呼声，全体起立向张伯伦鼓掌致意，他们以为事情真的有了转机。只有少数议员没有参与欢呼。艾登索性走出会场。丘吉尔最后还是提起精神，同张伯伦握了握手，祝贺他“好运气”。

第二天，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慕尼黑会面，那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其结果是签订了一纸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以换

取暂时的和平。对于目光短浅、不明真象的人来说，张伯伦似乎做了一件大好事，消除了一场危机，因而也赢得了舆论的某些赞扬。但是当下院于 10 月 5 日就慕尼黑协定进行辩论时，反对张伯伦姑息政策的议员便开始大叫大嚷了。海军大臣德夫·古柏忿然辞职，退出内阁，他对张伯伦向希特勒的一再妥协进行猛烈抨击。丘吉尔当然是最引人注目的批评者，他总括了张伯伦三次德国之行达成的后果：

把枪口对准你，要你给他 1 英镑。给了他 1 英镑后仍把枪口对准你，要你给他 2 英镑。最后，这位独裁者在许下未来亲善的诺言声中，和你达成协议拿走 1 英镑 17 先令 6 便士及余下的钱。

他最后严肃地警告说：

别以为这事就这样结束了。这笔帐刚开始计算。这只是一杯苦水刚尝了第一口。如果我们不能尽力恢复道义上的健全和武力上的强盛，从而再度奋起，像往昔那样坚守我们维护自由的立场，那么这种苦水将年复一年地端到我们面前。

除了丘吉尔之外，在反对张伯伦的姑息政策的二十多位下院议员中，有三位是前内阁大臣——艾登、艾默里、德夫·古柏。正如议员赫罗·尼科森在日记中写的那样：“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人数而在于我们这些人的声誉，……下院知道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远比他们更加了解事情真相。”

张伯伦的姑息政策并未有效地让希特勒安定下来，反而使他变得更疯狂。1939 年 3 月 13 日，希特勒下令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余地区，并宣布波希米亚为其保护领地。这样一来，倒使丘吉尔当初指出慕尼黑协定一文不值的论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消息传来，英国朝野震惊，要求全面扩军的人更多了，连张伯伦本人及其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大臣们也萌发了扩军的念头，内阁也同意成立供应部。这是丘吉尔三年前就提出过的主张，可是鲍尔温和张伯伦当时都认为无此必要。

到 1939 年夏天时，即使一直对张伯伦忠心耿耿的保守党人也产生了丘吉尔应该入阁的看法。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国家就需要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兼斗士。正统保守党人的喉舌《每日电讯报》在 7 月 3 日的社论中称丘吉尔为“不仅是一个多年深谙国家大事因而拥有强烈责任心的政治家，而且对战争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高级战略问题，拥有无与伦比的实际知识”。有人甚至打出“丘吉尔必须回到内阁中来”的标语牌。一些知名的自由党人联名写信，要求恢复丘吉尔的大臣职务。但是张伯伦仍觉得在和平尚未绝望之时，若让丘吉尔入阁，无异是向希特勒示威，这样做可能丧失微弱的和平希望。

丘吉尔本人虽然没有官职，却仍不遗余力地设法巩固英法关系。7 月 14 日他在巴黎参加了法国国庆盛典。8 月他又去法国视察了马奇诺防线。8 月 23 日，希特勒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很多人感到意外。丘吉尔对此并未特别惊奇，只是对于英国未能使苏联同西方站在一起对付希特勒，感到惋惜。

暂时稳住了苏联以后，希特勒便对波兰施加压力，要求波兰立即派全权代表到柏林讨论解决两国争端的办法。波兰政府不为所动，也不派代表。于是 1939 年 9 月 1 日清晨，德军跨过边界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

陆上的第一场战斗爆发了。

回顾丘吉尔在这十年中的政治生活，他对英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以及对英国政府延宕重整军备的指责，是始终如一的。他从希特勒上台之初就预见到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性，因此他一直竭力主张尽可能增加国防开支。但是他不是反德，他对独裁制度的利弊还持相当开明的态度。他曾觉得墨索里尼为意大利做了些好事，因而希特勒也许也能为德国做些好事。他在 1937 年曾写道：“历史将会作出宣判，希特勒要么是魔鬼，要么是英雄。”但是随后两年的形势发展使他认识到希特勒比魔鬼还危险。

东山再起

艾默里默默地写道：“温斯顿·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

波兰遭到德国军队大举进攻之后，英法政府并未立即作出反应，而是犹疑不定。当天下午张伯伦请丘吉尔到首相官邸，邀请他参加一个由六名大臣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张伯伦表明他的意图是想成立一个由各主要党派都参加的联合内阁，可是自由党对是否入阁尚未作出决定，工党的态度也不明朗。当时，法国政府仍不想立即对德国宣战，因此张伯伦还想作一次最后努力来挽救和平。

第二天，丘吉尔给张伯伦写了一封信，指出张伯伦所提及的六名战时内阁成员，其平均年龄已是64岁——“只差一年就该领取养老金了”。丘吉尔在信中说，他本人刚过65岁，“如果你能把辛克莱（49岁）和艾登（42岁）也延揽入阁，那么平均年龄就能降到57岁半”。丘吉尔提出这一意见，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对抗张伯伦一派的力量。

挽救和平没有成功。1939年9月3日上午，英法向德国宣战。下午张伯伦会见丘吉尔时宣称，已决定邀三军各大臣都参加战时内阁，请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丘吉尔马上表示同意，于是丘吉尔又回到了他离开了24年的海军部，当年的一批海军军官候补生现在都已成了高级军官。

就英德两国的海军力量而言，英国还是占优势，但是德国的潜艇十分活跃。丘吉尔一上任就赴各海军基地进行视察，向各基地的军官们反复强调防止德国潜艇和飞机袭击的重要性。9月18日晚，当他视察了北部的本土舰队、乘火车回到伦敦时，到车站去迎接他的海军部第一部务委员德雷·庞德海军上将向他报告说，英国航空母舰“无畏”号已在布里斯托尔海峡被鱼雷击沉，全舰官兵约有半数死亡，达500名之众。德国海军抢在英国海军前面行动了。

丘吉尔决定让报界马上报道“无畏”号被击沉一事，还决定尽早向下院作出报告。9月26日，他向下院说明了英舰被击沉的情况，还介绍了建立商船护航体系的进展和武装商船的情况。他言词清楚生动，表达有力，又充满信心，使下院相当满意。反对党领袖也对报告表示欢迎。

10月中旬，一艘德国潜艇潜入苏格兰北部斯卡帕弗洛海军基地的防御网，击沉了停泊在港口的英国主力舰“皇家橡树”号，786名官兵丧生，舰队司令也在此列。这又是一大惨剧，对海军部也是个重大打击。丘吉尔由于上任不久，未被追究责任。海军元帅罗杰·凯耶斯在议会中发言时说：“我认为，而且我确信全体海军官兵也认为，如果海军大臣阁下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获任就职，那么我国任何港口就都不会存在任何准备不足状况了。”海军将官们很清楚，防御力量薄弱正是张伯伦姑息政策造成的后果，而丘吉尔则是姑息政策最坚定的反对者。

但是作为战时内阁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必须尽快找到对策，应付挑战。丘吉尔召集了一批专家，逐一解决战争中遇到的问题。首先需要对付的是德国的磁性水雷。德军正是用布磁性水雷的方法击沉了英国船舰，要解除这一威胁必须了解德国磁性水雷的构造及运作方式。11月底，泰晤士河的港湾口的泥滩里发现了一枚这样的水雷。他派了几位既懂行又勇敢的专家把它拆卸开来，解开了其中的奥秘，从此就有了保护英国商船的办法。可是这一切都

得保密。

光是防御还不够。海军部知道德国海军有两艘袖珍战舰在大西洋非常活跃，便组织了一支由航空母舰和主力舰组成的搜索队在大西洋上追踪德舰。后来其中一艘德国袖珍战舰“斯比伯爵”号被三艘英国巡洋舰所发现，交了一阵火后受了重伤，躲进了中立的港口蒙特维多（乌拉圭首都），但只被准许逗留72小时。当它于12月17日驶离蒙特维多时，英舰已封锁了港口。鉴于遭到英舰夹击已不可避免，“斯比伯爵”号舰长便下令自沉战舰。舰长事后以自杀了事。

英国海军的胜利消息传到国内，获得了朝野一致的热烈赞扬，人心大振。当其中的两艘巡洋舰于1940年2月中回到英国港口时，丘吉尔为官兵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他们还被带到伦敦受到英国国王的检阅和伦敦市长的宴请。

就在“斯比伯爵”号自沉后不久，原来充任其补给舰的“阿尔特马克”号在挪威的一个峡湾中被英舰寻获。丘吉尔命令英舰“哥萨克”号派人登上敌舰搜查。而挪威当局却声称已搜查过该舰，没有发现俘虏或武器。英海军官员奉命坚持搜查，结果找到了被关在底层货舱中的近300名商船海员及大量枪支弹药。显而易见，挪威已为希特勒所利用，名义上的中立实际上已难以保持。

丘吉尔从战争一开始，便估计到欧洲的战场不会仅限于西线，因此他除了敦促战时内阁将英军扩建到55个师的兵力，以在西线支援法军之外，还主张开辟一条“北线”，那就是打开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如果英国能派遣二三艘主力舰以及其他支援舰艇通过丹麦和瑞典之间的狭隘通路，就可以有一支英国舰队常在波罗的海上巡弋了。但是这些方案一直未被采纳。到1940年初，丘吉尔又计划在莱茵河上投下漂浮水雷，并在挪威的海岸线上布下水雷，以阻止德国潜艇将瑞典南部的铁矿砂经由挪威的纳维克港运到德国。但是英国外交部反对这一计划，怕侵犯挪威的中立地位。丘吉尔提出好几种方案都未被战时内阁批准，使他感到备受牵制。

2月初，他首次应邀陪同张伯伦首相去巴黎参加最高战事委员会会议。通过会议，他体会到了某些困难的原因所在。原来法国领导人并不准备在西线作战。

3月，法国的达拉第政府倒台，由保尔·雷诺组阁。英国向法国新政府提出了两项对付德国的行动，那就是：（1）在莱茵河投下漂浮水雷；（2）在挪威海岸线上布下水雷，这原是丘吉尔提出的计划。达拉第虽已不当总理，但仍有影响，他怕德国报复乃促使法国政府拒绝了第一项计划，而只同意第二项。可是，决定作出得太晚了。4月8日夜，德军从陆海空三路进攻挪威和丹麦，在挪威所有的主要港口登陆，包括最北面的纳维克港。希特勒以“闪电战”，在一天之内就占领了丹麦。丹麦军队不堪一击，哥本哈根机场很快就被德军作为向挪威的德军增援之用。在挪威海岸沿线，英德海军发生了剧烈的战斗。4月9日夜，5艘英国驱逐舰驶入纳维克峡湾，同德国海军展开了猛烈的对攻。英军击沉了2艘德舰，但在驶出峡湾时英舰也损失了2艘。情势对英国不利。

当丘吉尔于4月11日在下院报告战局时，显得疲惫不堪，力不从心。赫罗·尼科森在日记中记述了丘吉尔那次作报告的情况：

当他站起来发言时，显然他已经非常疲乏了。一开始他还摆出一副像往常那样的作报告的样子，可是尽讲些辞不达意的话，插进几句无力的嘲讽。我很少见他陷于如此不利的处境中……他迟疑不决，手中的笔记弄错了顺序，戴错了眼镜，又在口袋中探索那副对的眼镜，想说“丹麦”可嘴里却老是说“瑞典”，以及这样或那样地表现得令人痛惜。

以后英国海军虽然又击毁了几艘德国驱逐舰，使德国的海上力量大为削弱，但是在挪威陆地上，从中部到南部都陆续被德军占领。挪威之战对英国不利之处甚多，如英军无滑雪部队，无冬季作战装备，对挪威的地形不熟，等等。挪威沦陷后，成千上万的英军死在雪地里，到4月底，英军只得撤离挪威。

英军在挪威的军事失利，在英国议会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议会对张伯伦领导作战的能力深表怀疑，反对张伯伦的力量日益增强。

张伯伦政府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很脆弱，保守党内虽然还有不少他的信徒，但是自从开战以来，姑息政策已经破产，战争的进程又证明了英国军事力量之不足。这一切若追究起责任来，当然都要算在张伯伦的帐上。

张伯伦非但偏执、顽固，而且心胸狭窄。他对于曾反对过他的前保守党政府大臣们始终耿耿于怀。早在1939年12月间，当张伯伦决定撤换陆军大臣豪-贝利夏时，曾征求海军大臣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建议可由艾登接任，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也主张由艾登接任，可是张伯伦径自任命了一个比较听他话的奥利弗·史坦雷任陆军大臣。

更早一些时候，10月间，艾登在和一位同僚共进午餐时就指出过：“张伯伦嘴上说丘吉尔在内阁中如何鼓舞人心和令人高兴，可是他仍要亲自过问丘吉尔的每一项工作。他对出自个人原因不喜欢的任何人，都不会任用。艾默里就是一个例子。”

张伯伦越来越不得人心还表现在党内外反对派力量的聚集。一段时期以来，以利奥坡·艾默里为首的一群反对慕尼黑协定的保守党议员，每星期都聚会议论国家大事。还有一个影响较大的“注视委员会”，是索耳兹伯里侯爵于4月初成立的，成员来自议会两院的保守党议员。另外还有一个“全党行动集团”，主席是自由党议员克莱门特·戴维斯。“注视委员会”和“全党行动集团”经常关起门来讨论政府的政策。

与此同时，丘吉尔的个人威望在大众中稳步增高，人们对他作为海军大臣所显示的活力和智慧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4月初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有一道题是“如果张伯伦先生退休，你认为谁继任首相最合适？”回答中推选艾登的占28%，推选丘吉尔的占25%，推选哈利法克斯的占7%，推选艾德礼的占6%，推选劳合·乔治的占5%。虽然丘吉尔当时尚未成为众望所归的未来首相，可是他多年来反对姑息希特勒、反对姑息纳粹德国所显示出的坚定意志、充沛精力和出众的能力，已在党内外给人以深刻印象，甚至连反对党工党也宁愿以丘吉尔来更换张伯伦。这并不是因为工党喜欢丘吉尔——他们并没有忘记他曾在30年前下令军队向矿工开枪——而是因为他们看出政府各大臣之中只有丘吉尔是个从不屈服的斗士，要指挥并赢得这场反希特勒的战争非他莫属。

5月7日，下院开始举行关于挪威之战的辩论。这是一场关键性的辩论，因为它使局面产生了转机。辩论开始时，议员们对英军在挪威海岸的多次失

利极表忿怒，攻击的矛头纷纷指向首相张伯伦。张伯伦辩解乏术，表明想改组政府，成立联合内阁，但是工党表示不愿接受他的领导，提出了不信任的动议。这时自由党的克莱门特·戴维斯在同保守党的艾默里商量后，敦促工党的艾德礼提议进行表决。艾德礼在另一工党议员赫勃特·摩里逊的帮助下，迅速说服了其他工党前排议员。摩里逊向自由党元老、77岁的劳合·乔治指出此一时机的重要意义，请他务必出席，劳合·乔治同意了。在下院进行了两天的指责和辩解，对张伯伦的错误政策提出了种种批评之后，保守党后排议员艾默里发言了，他对张伯伦进行了直截了当的谴责，并毫不隐讳地要求张伯伦下台。

在接下来进行的表决中，政府从原来占有的200席以上的多数，一下子跌到只占81席多数。失去的100多席中，有一半是倒向，其余的不是缺席，就是弃权。在平时情况下，政府拥有81席多数并无垮台之危险，但是在战时便不同了。保守党首席督导马格松对这一情势的评论是：票数多少已关系不大，因为“自从可怜的内维尔（张伯伦）想组成一个由他领导的联合内阁已无可能后，政府便注定要垮台了”。

5月9日，丘吉尔同艾登和金斯莱·伍德一起进午餐。原来忠于张伯伦的金斯莱·伍德，这时觉得张伯伦作为战时领袖已不够格，就劝告丘吉尔在被张伯伦请去就哈利法克斯是否适合当首相发表意见时，应保持沉默，不要对张伯伦的这一考虑给予任何鼓励。金斯莱·伍德此时已认为，只有丘吉尔具有担负战时首相重任所必需的意志和活力。

当天下午，张伯伦果真把丘吉尔、哈利法克斯以及马格松请去商谈。张伯伦表示他打算辞职，为此询问身为保守党首席督导的马格松，谁继任首相最合适。马格松拒绝在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两人之间作选择。丘吉尔记住了金斯莱·伍德的劝告，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据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中的描述是：“通常我定会大发议论，可是这一次我一言未发。”大家僵持了一阵子。然后哈利法克斯表示，他身为贵族，担任首相有所不便。这显然是个借口，实际上哈利法克斯并不想当首相，至少是不想在战争时期当首相。因为他知道，在当时不论他们两人之中谁当首相，指挥战争的人终将是丘吉尔。即使他当了首相，也很快会成为一位名誉首相的。

丘吉尔知道重任将落到他的身上。他表示在接到国王的委任前将不同任何反对党联系。他以这种奇特的从反面说话的方式，表明了他准备接受英国的这一最高行政官职。

5月10日晨，德军在西线的进攻开始了。德军先是攻打荷兰和法国，几分钟后又进攻比利时。张伯伦见状还想就局势紧急而推迟辞职，可是金斯莱·伍德竭力规劝他立即移交权力。张伯伦便决定等到正在博恩穆思参加工党会议的工党领袖们送来关于是否参加政府、愿意接受谁的领导的正式答复后，便辞职。这时他还最后一次要求哈利法克斯出任首相。他命令他的议会私人秘书邓格拉斯（即后来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1963年出任首相）打电话给外交部，请外交部次官巴特勒劝说哈利法克斯改变主意。巴特勒答复说他来不及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哈利法克斯已溜出办公室看牙病去了。

下午5时，艾德礼从博恩穆思工党的会议场地打来电话，表示工党准备在一个新的政府、新的首相领导下，作为全力协作的伙伴，尽其应尽的责任。到这时张伯伦才死了心，知道他非辞职不可了。下午6时，他赴白金汉宫辞

去首相职务，并向国王提出召见丘吉尔接任。半小时以后，丘吉尔奉召进宫。丘吉尔自己对觐见国王的情景所作的记述是这样的：

国王“以探询的眼光对我打量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料想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召见你吧？’我以他同样的神态回答说，‘陛下，我真想象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回答说当然愿意这样做。”

另外，从英王对这次会见的记述来看，他把丘吉尔当时的反应当作是喜出望外的表现，以为丘吉尔真不知道为何被召进宫来。实际上，丘吉尔不论在朝在野，对政治和军事的形势始终是十分清楚的。他对执掌大权早有充分准备，受命组阁的这一刻实际上他已期待了30年。现在，这一时刻终于在他65岁时来到了。

从白金汉宫回到海军部后，丘吉尔就以内阁首相的身份来组织他的联合政府——战时内阁了。晚上9时半他会见了回到伦敦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和他的副手格林伍德，请他们参加内阁。两位工党领袖用电话同还在博恩穆思开会的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商量后，同意入阁，但不同意让张伯伦任财政大臣。最后，张伯伦任枢密院长，哈利法克斯仍任外交大臣，丘吉尔兼任国防大臣。他们三人加上两位工党领袖，暂时组成了只有五名成员的联合内阁。丘吉尔后来写道：“当我在午夜3时上床睡觉时，我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终于取得了对全局发号施令的权威。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顺应天数，我以往的全部生涯好像都只是为这一时刻、为这次考验所作的准备。”

一些传记作家认为，丘吉尔跃登首相宝座表明了人心所向，是一场压倒传统派的胜利。事实并非如此，当时那些“顶层头儿们”倾心于让哈利法克斯接任首相。张伯伦派人士觉得，同丘吉尔相比，哈利法克斯同他们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何况慕尼黑协定也有他的份。工党领袖们觉得哈利法克斯较为审慎，有首相风度。奇怪的是，在丘吉尔最密切的政治同僚中，也有人怀疑他能否承担首相一职，其中有些人甚至觉得接替张伯伦的最佳人选是劳合·乔治。前面也提到过，4月初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丘吉尔的声望还不如艾登。所以丘吉尔在当时尚未成为众望所归的首相人选。可是哈利法克斯坚决不愿接任首相一职，所以丘吉尔才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接过了这个最高职位。

在联合政府中，三军各部的大臣由各党分别担任。海军大臣亚历山大（工党）、陆军大臣艾登（保守党）、空军大臣辛克莱（自由党），都不算内阁阁员。但辛克莱作为自由党领袖可在内阁讨论重要问题时参加。对其他各部的任命是：摩里逊（工党）任供应大臣，西门爵士（保守党）任大法官，劳埃德勋爵（保守党）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厄内斯特·贝文（工党）任劳工大臣，金斯莱·伍德爵士任财政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无党派）任贸易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任新设的飞机生产大臣，休·道尔顿（工党）任经济大臣。

5月13日，下院对新任首相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丘吉尔坐在政府成员前排座位上，坐在他两侧的是张伯伦和艾德礼。丘吉尔作了简短的政策演说，吁请下院予以支持。他在演说中发表了他那段著名的话：

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你们问，我们的方针是什么？我就

说：是以上帝赐予我们的全部精力，竭尽全力在陆海空作战，进行一场反对凶残的暴政的战争。这一暴政在人类罪行的黑暗、悲惨的记录中尚无一匹。这就是我们的方针。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是不惜任何代价赢取的胜利，是不顾一切恐怖都要夺取的胜利，是不论路程多么遥远、路途多么艰苦都必须取得的胜利。因为得不到胜利就得不到生存。

在这次下院的辩论中没有很多演说。在野的工党议员的发言人李司-史密斯报告了博恩穆思工党会议的投票情况：赞成和反对工党参加联合政府的票数对比为 240 万票对 17 万票。劳合·乔治向他的老同事——新首相表示了祝贺和祝愿，并且赞扬了丘吉尔的“闪烁的智慧，无畏的勇气，对战争的深刻研究，和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持反对立场的只有一名属于独立工党的姑息主义者杰姆士·迈克思顿。最后，全场投票结果是支持新内阁的票数是 381 票对零票。丘吉尔赢得了全国一致的支持。

顺便提一下，丘吉尔在政治见解上和张伯伦有过不少冲突，直到最后，张伯伦仍不愿让他来继任首相，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是丘吉尔当了首相后非但没有报复张伯伦，而且坚持将张伯伦留在内阁中。他在公开发言中并未批评或指责张伯伦的错误，相反地倒是时常提到张伯伦所怀有的崇高目标。丘吉尔的这种宽容、豁达的态度和实际行动不应仅看作是他的性格和气量方面的优点，也应看作是他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素质的一种表现。在大敌当前的紧迫关头，丘吉尔若想取得有效的权威以达到克敌制胜的最后目标，必须团结尽可能多的盟友，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如果他不是那样对待刚下台的、在下院还拥有不少支持者的前首相，他在下院的投票中能否赢得全票支持则很难说。只见有人已在院子里焚烧档案文件，准备撤离。丘吉尔一行同雷诺、达拉第及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进行了会谈。当时的战场形势是，奉命在阿登地区战线上进行掩护的法国第九军接近崩溃，德国坦克一下子进展了 60 英里，而荷兰军队已经向德军投降。当甘末林将军向丘吉尔描绘了战局状况后，丘吉尔问道：“你们的战略后备队哪里去了？”甘末林耸耸肩回答说：“我们没有。”法国重新提出要求英国再派 10 个中队的战斗机，丘吉尔答应了。这样一来，自己只剩 25 个中队的战斗机。保卫英国的领空，使之不受希特勒空军的主宰，只能靠这 25 个中队了。这是英国所作的一次相当大的牺牲，也是丘吉尔所进行的一场风险极大的赌博。令人难解的是，因希特勒的疯狂侵略而使整个国家危在旦夕的是法国，可是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并未显得忧心忡忡，而只是轻松地耸耸肩，向英国首相抱怨：“军力不足，装备不良，运转不灵。”似乎法国的领导人，包括甘末林自己在内，并不存在问题似的。丘吉尔后来写道：“马奇诺防线是干什么用的？它本该能节约部队力量的……我承认这是我一生中见到过的最大的怪事之一。”

德军进攻的矛头不是直指巴黎，而是阿贝维尔和英吉利海峡沿岸。德军打算把英国远征军、法军和比军分割开来。而法军司令部却犹疑不决，毫无对策。与此同时，雷诺决定改组政府，由他自己兼任国防部长，达拉第任外交部长。他劝说贝当元帅出任政府副总理，那时贝当已 84 岁。他还让 73 岁的魏刚将军接替甘末林任法军总司令。

为了与魏刚会晤讨论军事形势，丘吉尔 5 月 22 日又赴巴黎。魏刚提出的计划是：法国第一军和英国远征军一起南下，同其他自南部北进的法军会师。

他显得很自信，似乎很有把握。可是事态的发展未能如愿，因为北进的法军未能如期来到。比利时军队的溃败使英国远征军的北翼遭到了威胁。远征军司令高特将军这时知道唯有向敦刻尔克海岸撤退，才有可能撤离欧洲大陆，以保全英军。24日，进逼被围的英法军队的德军坦克部队突然接到希特勒停止进攻的命令，英法军队趁机仓皇撤离法国。但是，数十万英军和法军要在短期内从一个被围困的地带全部撤出，任何人都无法对之抱乐观态度。丘吉尔也向下院吹风，要议员们作好收到坏消息的准备。他的意思就是说，说不定尚在法国的英军会全部被歼。负责接运远征军撤回工作的是英国海军上将贝特兰·雷姆赛。选择这位退休将军来担此重任是因为他了解杜佛海峡的情况，而且他是一个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信赖的人。雷姆赛将军估计每天只能从敦刻尔克撤走英法盟军1万人。结果他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舰艇船只，不论大小，不论是机动还是手摇，都利用上。最后从5月26日至6月4日一共救回了英军和法军338226人，重型武器当然都丢下了，可是大多数撤回到英国的官兵都还带着一支步枪。

在这期间，比利时于5月28日投降。31日丘吉尔又飞往巴黎参加最高战事委员会的会议，陪同他去的是艾德礼和伊斯梅将军，还有一位史比尔斯少将。这位少将是保守党议员，法语非常流利，后来成了丘吉尔派驻在雷诺政府中的私人代表。在会谈中，丘吉尔发现法国方面对于坚持斗争所抱的热忱和决心各人都不一样，雷诺比较积极，可是新任副总理贝当元帅却深怀对抗情绪。

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成功使很多人大大感欣慰，有些人将之当作一场胜利那样庆祝。丘吉尔提醒他的人民，这绝不是一场胜利，而是由于在战场上打败了。接下来希特勒必定企图进犯英伦三岛，而英国当时几乎毫无防御，可法国却在琢磨用什么样的方式投降。

丘吉尔于6月4日向下院报告敦刻尔克撤退成功的情况和英国今后的方针。他在报告结束前发表了那段显示他的决心的名言，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同希特勒战斗到底的斗志。他说：

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这个岛屿或它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这是我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的——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仍要在英国舰队的武装保护之下，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用它的全部力量和能耐，前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6月10日，意大利向英法宣战。德军再度发动攻势，法军溃败，总司令魏刚丧失斗志，法国政府也于10日迁离巴黎。原定11日召开的最高战事委员会会议只能改在奥尔良西南方的布里阿尔附近的一座古堡中举行。丘吉尔这次由艾登、总参谋长狄尔和伊斯梅将军陪同参加。雷诺向丘吉尔承认他让贝当元帅参加政府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贝当的立场完全是失败主义的。当时已能看出，法国的抵抗维持不了多久了。

由于意大利已经参战，停在马赛附近一个飞机场上的几架英国轰炸机打算去轰炸都灵和米兰。使丘吉尔大为惊讶的是：飞机场奉法国当局的命令，在跑道上堵塞了很多汽车和农村的大车，不让轰炸机起飞。法国想避免同墨索里尼交战。

6月13日，丘吉尔刚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天，又去法国了，这次是去都尔——法国政府迁址之处，陪同他去的是哈利法克斯、伊斯梅和比弗布鲁克。当他们抵达法国时已无人迎接，他们想找饭馆吃午饭都很困难。见到雷诺时，发现他已经不知所措。政府的权力已落入贝当手中，法国正在谋求“和平”。

6月14日，德军占领了巴黎。16日，英国战时内阁同意法国谋求停战，但是要求法国舰队驶入英国港口，以免落入德军之手。当时法国政府中地位不高的戴高乐将军主张继续抗战，他曾同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范西塔特等人商议，拟写了一份英法联合成一体宣言。这份宣言经过内阁批准后电告法国政府，可是贝当元帅拒绝同英国捆绑在一起。17日史比尔斯少将从法国飞返英国，将戴高乐将军同机带至伦敦。戴高乐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向法国发表了演说，鼓励法国军民继续战斗。

丘吉尔于6月8日向议院说道：

魏刚将军所说的“法兰西之战”，现在已经结束。我料想，“不列颠之战”即将开始了……因此，让我们紧守住我们的职责，并作出相应的表现，以至如果英帝国和英联邦能存在一千年的话，人们仍会说“这曾是他们最最光荣的时刻”。

这已是关系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法国于6月22日同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法国军舰并没有驶入英国港口；原定法国应将英国皇家空军和法国空军击落并俘获的约400名德国飞行员送到英国，可是也没有做到。丘吉尔在7月初亲自检查了关于截住法舰的行动计划。驻在北非港口奥兰的法国舰队拒绝接受英国海军的命令，便遭击沉。

7月4日，丘吉尔向议院报告了这些情况，同时敦促政府官员增强信心和保持警惕。丘吉尔说他的政府确信德国如果进犯英国本土将必然失败。他说：

皇家空军情况极佳，其实力从未达到如此强大过，德国空军是空前衰弱，而英国本土上的陆军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大。首相期望英王陛下在身居高职的公仆能树立一个坚毅不拔的榜样。

丘吉尔讲完时整个议院掌声雷动。当他坐下时，大厅内各处的人都站起来向他欢呼。他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记录的：

直到目前，保守党对我仍有某种保留。每当我走进议院或者在严肃的时刻站起来时，最热烈的欢迎我是从工党的座位中间得到的。可是这一次却全体都一致发出庄严的、声音宏亮的欢呼。

德国武装部队正在重新拟订进攻英国的计划。7月16日，希特勒发出了被称为“海狮计划”的进攻英伦三岛的指示，实行时间为8月中旬。希特勒一方面准备进攻，另一方面又提出和平倡议。希特勒的试探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这一时期英国的扩军备战活动正在取得进展。比弗布鲁克一直拼命设法增加飞机生产。敦刻尔克大撤退成功后，英国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飞机总共只有331架，而到8月初已增至620架；后备飞机的数量也从36架增至289架。海军已把大多数在外执行护航任务的驱逐舰召回国，以对付

入侵之敌；近海已布上水雷；可能的登陆滩头也已设置障碍。美国送来的枪炮也于7月运到，用来武装征募到的百万名“地方志愿卫队”。

丘吉尔还到一些可能成为入侵地点的地区去进行视察。他在肯特郡看了加拿大师的演习，在色塞克斯郡看了第三师（由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演习。他视察了东西部的哈里奇和杜佛两地的防御情况，还去了东北部海岸。对于丘吉尔的亲临东北部海岸，《泰晤士报》有过这样的报道：

当他经过一个村子时，在场的人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他们或摘下帽子，或向他挥手。看上去精神焕发的丘吉尔先生向他们答礼并露出笑容。……如果丘吉尔先生的笑容能测量他的满意程度，那么他确实是满意得很。

……首相还访问了一家名叫“东北英格兰”的船坞，在那里呆了一小时，也是一下子就被认了出来，并得到大家的高声欢呼。……工人家属聚集在船坞的大门旁。为她们的欢迎热情所感动的丘吉尔先生高喊道：“我们消沉没有？”那些妇女家属大声回答说：“没有。”

8月上旬，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了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证实丘吉尔的声望已增高。在被问及是否拥护丘吉尔的领导时，88%的回答是肯定的，反对的只有7%，持观望态度的5%。丘吉尔获得拥护的这一百分比，是张伯伦从来没有达到过的。

希特勒知道，要实施“海狮计划”，入侵英国，先决条件是德国空军须取得英伦三岛的制空权。因此就需要有一批又一批的飞机越过英吉利海峡去摧毁英国皇家空军，不然德国海军就无法送德军渡过海峡踏上英国本土。所以希特勒计划用四个星期摧毁英国空军，取得制空权，为德国登陆铺平道路。然后，9月中旬可以到英伦三岛作战，9月底可占领英国南部，10月初就能在伦敦举行胜利大游行了。拟订这样的计划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尽管英国在努力增产飞机上取得很大进展，但它当时的空军力量仍不足以抗击德国空军的进犯。德国有1900架轰炸机和1100架战斗机，而英国只有350架轰炸机和700架战斗机。所以当“不列颠之战”于8月拉开序幕时，英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摧毁英国空军的计划于8月10日开始了。德国每天派出100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英国，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一批又一批地升空迎战，双方飞机的损失都很严重。

当夏季逐渐逝去之时，可以看得出敌人的入侵部署针对的位置是南部海岸而不是早先帝国总参谋部所估计的东部海岸。入侵舰队正在哈弗尔和奥斯登之间的各个港口集结，德国空军也在这一带集中。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也就趁这些舰艇尚未启航之时不断地进行袭击。

当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遭受德国的狂轰滥炸时，英国政府曾打算迁往中西部，然而，丘吉尔却认为那样做弊多利少，因为他目睹过法国政府迁出巴黎后造成的混乱。可是著名的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是一座并不坚固的老建筑，虽然已在花园里加建了一个防空壕，可是仍不够安全。于是，首相办公室搬到了斯多瑞门一座名叫安尼克斯楼的附属建筑物内，那座建筑物有防空设施，内阁会议也可以在那里召开。丘吉尔一般是白天在唐宁街10号，晚上在安尼克斯楼，周末到契克斯首相郊区官邸。到了盈月之夜，他往往去稍为远一些的牛津郡的一位保守党议员罗纳·屈瑞家中居住，盈月之夜是一个危

险的时刻，走得稍远当然可以安全些。

9月7日起德国对伦敦的轰炸改为夜袭，意在用狂轰滥炸使英国人民士气涣散、丧失斗志。但实际上这是德国的一个战略性错误，因为德国忽视了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和雷达设备，而且“闪电战”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相持局面，“海狮计划”的实施更遥遥无期。

8月10日—9月14日，德国空军损失飞机846架，英国损失460架。尽管英国空军损失飞机不少，但是德国损失得更多。“闪电战”变成了消耗战，双方都已动用了后备力量，都显示出难以为继的迹象。但是最重要的是希特勒想摧毁英国皇家空军的打算落了空，制空权仍未掌握，德国国防军也未能如愿地踏上英国国土。在这一意义上，至少在暂时，这一战役的胜利者不是希特勒，而是丘吉尔。德国飞机还可以继续空袭伦敦，但是希特勒不得不下令取消了两个月前发布实施的“海狮计划”。

空袭造成的破坏虽然不像预期的那样惨重，但它对其他国家感情上的巨大冲击却是十分严重的，尤其是对美国，以至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此表示了明确的同情，声言将对盟国提供援助，并加强美国自身的武装。罗斯福当时虽然还没有让美国参加欧洲大陆的这场战争，但英美之间在反对轴心国侵略势力方面所维持的关系从此不断加强。

早在那年的春夏之交，英国政界就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争吵。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对打仗时装备短缺极其忿恨，他们并不了解政府在扩军时有意将重点放在海军和空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回来的战士们也并不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能生还，在多大程度上是借助了空军的掩护。所以在议会外面，人们对张伯伦及其追随者特别痛恨。可是丘吉尔明白他们所能起的作用，因为他们仍主宰着下院，还需要依靠他们对自己的支持。这一点并不是谁都能了解的。在5月底，丘吉尔曾想邀请劳合·乔治参加战时内阁，可是劳合·乔治拒绝了。理由之一是“有几位灾难制造者仍在你的政府内充任要职，其中两位还位列指挥战事的内阁之中”。

内阁在政策上确实是有分歧的。譬如，英国对势将参战的意大利应采取什么政策，就有分歧。哈利法克斯十分赞同法国总理雷诺的主张，即希望英国讨好一下意大利，主动向它提出让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岛和苏伊士运河中立化或非军事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要匆忙作出决定，看看形势发展再说。丘吉尔看到了分歧，但是他一再强调内阁要加强团结，并认为至关紧要的是绝不能对内阁中的任何成员进行任何非难。他于6月18日在下院讲话时宣称：

我充分相信，如果我们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展开一场争吵，我们必将失去“未来”。因此我不同意在现政府成员之间划分任何差别。现政府是在危机重重的时刻组成的，旨在团结所有的党派和具有各种意见的各个阶层。

10天后，张伯伦也向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政府内部并无分歧，保守党内并无企图求和的人。“如果我不同意首相的决定，我就会辞职，站到反对派那边去，可是决不会搞阴谋！”有证据表明张伯伦曾对保守党首席督马格松说过，要确保下院的保守党人在7月4日丘吉尔演讲结束时表明他们的支持。

但是争议并未平息。7月初，比弗布鲁克报业集团的三名记者出版了一

本名为《罪人们》的书，更使敌意加深。这时候公布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在对此事表示了意见的人们之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主张张伯伦应退出政府，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西门、哈利法克斯和金斯莱·伍德也都该退出政府。正当这些政治性的争执难以罢休之时，张伯伦于7月尾因患癌症不得不住进医院动大手术，暂时使争执缓和了下来。9月下旬，张伯伦的病情已难以好转了，他只得辞去政府大臣及党魁的职务。丘吉尔任命内政大臣安德森爵士接任枢密院长，又任命赫勃特·摩里逊任内政大臣，他并且让财政大臣金斯莱·伍德和劳工大臣厄内斯特·贝文参加了战时内阁，使战时内阁的成员达到了八名。

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丘吉尔自己也得到保守党内的邀请，要他出任党魁。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因为他曾经脱离过保守党而投向自由党，而且党内对他的长期不很顺从很是不满。可是近几个月的发展使不少人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他在领导政府工作和领导这场关系到英国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勇气和活力，镇定和刚毅，给了人们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演讲和辩才，往往既显得诚恳坦率，又显得生动有力，从而增强了人们对他的信任。从他的演讲中得到激励和鼓舞的不仅是从广播中听到他的声音的广大人民群众，还包括议会中那些老于世故、掌握情况的议员们。因此，他的个人威望已有很大提高。这时候不仅国内的保守党急于把丘吉尔的名字和威望同保守党联系得更加紧密，在国外也出现了支持丘吉尔的支持。譬如澳大利亚在9月的大选中，孟席斯竞选的口号之一便是“孟席斯站在丘吉尔一边”和“支持政府就等于支持丘吉尔”。

在保守党会议上，由哈利法克斯提名丘吉尔继任保守党领袖，资深后排议员乔治·柯索普表示附议。这样，丘吉尔就成了保守党的党魁。据《泰晤士报》1940年10月10日的报道，那天当丘吉尔步入会议大厅时，他“获得了巨大的欢迎，全场起立，向他发出热烈的欢呼”。

同罗斯福和斯大林携手

英语世界在抗击希魔方面的有效合作和美英苏三国“伟大同盟”的建立，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希特勒的渡海登陆、入侵英国本土的“海狮计划”在9月17日被宣布推迟执行后，10月12日他又下令在春天来到之前不予执行，这实际上是无限期推迟，等于取消。可是为了不让英国知道，希特勒仍命令装出一副继续准备入侵英国的外表，以使英国不敢松弛戒备。英国海军大臣在9月向战时内阁报告说，9月下旬开始，由于秋分时节常有暴风雨，用渔艇和平底船横渡海峡不大可能，所以也不必担心德军会在秋冬之际来犯。当时唯一的侵犯是夜间的空袭。

伦敦遭到的空袭要比其他城市多，而伦敦的五个城区中，威斯敏斯特遭到的破坏最严重。可是到了11月14日晚上，德国空军突然改变目标，对位于英格兰中部的城市考文垂进行野蛮轰炸，古老的大教堂被炸得只剩下一个外壳。考文垂遭野蛮轰炸的照片很快见之于报端，传遍世界。丘吉尔的目的是想由此事得到海外、尤其是美国的了解和同情。

自从法国陷落后，丘吉尔便考虑到了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的重要意义。1940年夏，英国便向美国购买大批军火弹药。按照美国国会立法的规定，得现款交易，一手付钱一手取货。为此英国不得不动用黄金储备和美元资产。可是黄金美元的储存量是有限的，而军火弹药的需要，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必须想出更好的办法。此办法就是争取美国的全力支持，使美国认识到打败希特勒不光是英国的事，如果美国继续让孤立主义得逞，总有一天希特勒的魔影会笼罩到美国的头上。

要说服美国尽力解救英国的困境，这个任务只有丘吉尔才能承担。且不说他本来就是半个美国人，以他过去同美国方面的长期交往以及他的著作在美国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加上他曾多次在演讲中阐述过英语民族之间加强合作的美好前景，由他来做这项特殊的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柏林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德意日轴心正式形成。这一来使得英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变得更非局部性了。当时美国正处于总统选举的前夕，民主党现任总统罗斯福力求再一次连任，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则在争取进入白宫。显而易见，如果威尔基当选，美国组织力量展开对英援助必然会较迟缓，虽然威尔基也同意援助英国。11月初，美国大选揭晓，罗斯福连任，这使英国感到莫大宽慰。11月中旬德国空军对考文垂进行的狂轰滥炸，其野蛮程度使美国公众大为震惊。12月初，罗斯福到加勒比海巡视租给英国使用的几个美国基地，途中收到丘吉尔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丘吉尔在信中先描绘了战争的形势，然后要求各种形式的援助以使斗争能继续下去。丘吉尔写道：

我国无力为运输费用和其他供应物资偿付现金的时刻即将到来。为了做到银货两讫，我们愿意尽力而为，决不在正当的牺牲面前退缩。可是如果在这场斗争达到高峰之际，大不列颠却须被迫变卖一切可变卖的资产，从而等到用我们的鲜血赢得了胜利之后，文明固然得到了拯救，美国固然赢得了时间得以充分武装来防止任何不测事件，然而我们却要落得个周身精光，那么这一状况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

实际上也对彼此不利。这一点，我相信您会同意。

罗斯福返回华盛顿后不久，在12月17日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阐明了美国不能再隔岸观火的理由。12天之后，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通过广播向美国人民发表了著名的“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的“炉边谈话”，他说：

前途是存在危险的——我们必须加以防范的危险。

但是我们深知，爬到床底下用被单蒙上头，并不能使我们逃避开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所有的人都将生活在枪口的威胁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艇……

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

他的这篇谈话的思想就是后来订立“租借法案”的依据。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大地促成了美国国会两院于1941年3月8日顺利通过“租借法案”。该法案不仅使英国，还使中国、希腊、苏联等很多抗击德意日轴心国侵略的国家通过信贷方式，得到了迫切需要的武器弹药和其他战备物资。

1940年12月，英国驻美大使罗西安爵士逝世。驻美大使现在是个关键性职位，接任人选颇费斟酌。丘吉尔最初考虑到劳合·乔治，但是劳合·乔治已经78岁，健康不佳，医生也不鼓励他接受这一职务。于是丘吉尔又考虑让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亲任此职，哈利法克斯起先不愿意，最后还是勉强同意赴任，以示克尽厥职。接着丘吉尔又任命艾登接替外交大臣职务，同时为了显示他并无意排挤张伯伦派，他让马格松继任艾登留下的陆军大臣一职。

与此同时，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辞职，大使一职出现空缺。要任命新大使并得到国会批准是颇费时日的。肯尼迪大使是美国富翁，20年后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便是他的长子。可是这位大使在英国颇不得人心，因为他对英国的前途十分悲观，还不时流露出钦佩希特勒的情绪。在新大使尚未选定之前，罗斯福总统决定先派一位私人代表去伦敦，他便是罗斯福的密友、美国前商务部长哈里·霍普金斯。霍普金斯于1941年1月初到英国后，和丘吉尔很快就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在最初的两个星期中，有12个晚上他是同丘吉尔一起度过的。他在1月14日写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对丘吉尔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丘吉尔就等于政府，他掌握着全部战略方针，往往还包括各项实施细节。劳工阶层相信他，陆海空军中人人都坚决支持他。政界人士和上层社会也假装喜欢他。他是英国唯一的一个你需要与之推心置腹的人，这句话我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霍普金斯于2月中旬才回美国，他在英国逗留的日子超过预期的一倍。国会于3月8日通过“租借法案”后不久，罗斯福便指派他负责对英援助的工作。不久美国派出了新任驻英大使约翰·魏南特。

1940年12月，英国驻中东部队司令阿奇博德·魏菲尔将军在埃及边界成功地向意大利军队进行火力袭击，迅速占领了西迪巴兰尼后，便沿着海岸挺进利比亚。次年1月攻陷巴地亚和土布鲁克，2月占领班加齐，俘虏意军总数达11.3万名。2月，德军有横扫巴尔干半岛之势，希腊危在旦夕。战时内阁认为需要采取行动阻挡一下轴心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丘吉尔便让新

任外交大臣艾登同狄尔将军一起访问开罗、雅典以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看一下在那里能做些什么。他们都认为英军应该干涉。3月初南斯拉夫发生政变，新政府主张抵抗德军侵略，得到了丘吉尔的喝彩。但是希特勒的军队立即加强攻势，迫使南斯拉夫新政府在11天之后就投降。接着，留在希腊的英联邦军队共约5万人也被迫撤离，其中大部撤至克里底岛。5月间德军又从海空两路进攻克里底岛，尽管入侵部队遭到巨大损失，最后还是占领了机场，从而稳住了脚跟。英国海军也在受到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将守军再度撤走。丘吉尔看到德军的战略似乎是想进入东地中海到达伊拉克，就嘱咐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下令总督和总司令从印度调遣一些部队去巴士拉，以阻止德军的企图，结果成功了。到5月底伊拉克成立了一个友好的新政府。接着，在丘吉尔和总参谋部的促使下，魏菲尔向叙利亚忠于维希政权的法国殖民政权发动进攻。参加战斗的还有一部分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部队。经过几场激烈战斗，进攻获得了成功，于7月12日签订停战协定。

为了保证在北非大沙漠中主要战役的胜利，丘吉尔和总参谋部派遣了大批坦克直接从地中海下来而不是绕道好望角。战斗于6月15日开始。可是德军司令隆美尔打防御战的战术高人一筹，使得英军无所施展。丘吉尔对这一战役原来寄予很大希望，天天焦急地等候战讯。后来知道战局失利，只得把魏菲尔调任印度，和奥钦力克将军对换了事。这一时期丘吉尔同样关注的另一个战局动向便是希特勒对苏联的意图。已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到1941年4月，丘吉尔深信应该将希特勒的野心告知苏联，提醒斯大林早作防备。丘吉尔让驻苏大使斯塔福·克利浦斯爵士传递信息。克利浦斯大使花了好几天才找到适当机会把信息递给了斯大林，可是未引起重视，苏联也没有因此采取必要的防备措施。6月22日德军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军队竟不知所措，很多苏联飞机是在停机坪上被炸毁的。德军的一时得手，增加了英国政府的惊恐，因为如果德军在苏联获胜，必然会回头重新部署登陆英伦三岛的计划。

丘吉尔是在首相郊区官邸契克斯得到希特勒突击苏联的消息的。在前一天晚上，当丘吉尔在契克斯官邸的院子里同他的新任私人秘书焦克·考维尔一起散步时，鉴于在晚餐席上大家都谈了不少关于德国即将进犯苏联的问题，考维尔便问丘吉尔是否对援助苏联持有保留态度，因为丘吉尔是众所周知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可是丘吉尔迅速回答说：“毫无保留。”他告诉考维尔：“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粉碎希特勒，达到了这一目的，我的生活就会轻松得多。如果希特勒进犯地狱，我至少也得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后来他就寝了，并且下令不准把他叫醒，除非德军入侵英国。英国于凌晨4时就收到希特勒进犯苏联的消息，可是考维尔等到早上8时才把消息告诉首相。丘吉尔听后马上命令考维尔：“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今晚9时我要发表广播演说。”

为了这篇演说，丘吉尔全天都在作准备。他同几位顾问进行了商谈，同几位内阁成员通了电话，听取了总参谋长狄尔将军的军情汇报，又特别征询了两个人的意见，一个是数日前才飞回伦敦的英国驻苏大使克利浦斯爵士，另一个是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前者是工党人士，后者是大富翁。当丘吉尔问克利浦斯苏联是否顶得住希特勒的进攻时，克利浦斯回答说顶不住。他认为德军将长驱直入，“像一把热刀切黄油那样”，并认为苏军的覆灭仅是时间问题。英国大多数将领们，尤其是总参谋长狄尔将军，都持这个意见。

丘吉尔又询问比弗布鲁克的想法，比弗布鲁克却认为应该尽一切可能支援俄国人，应该考虑到他们有众多的人力和巨大的生产潜力。这个意见和丘吉尔的意见是一致的。于是丘吉尔就全力草拟他当

晚的演讲稿，一直到晚上开始广播前 20 分钟才基本脱稿。这是丘吉尔的一篇重要演说，他明确表示要援助苏联抗击纳粹。尽管英国本身岌岌可危，却准备尽其所能在各方面支援苏联。他说：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那就是决心摧毁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一切余毒。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们转移这个目标。我们决不谈判，决不同希特勒或他那伙人中的任何人协商，我们将在陆地上打击他，我们将在海洋上打击他，我们将在天空中打击他，直至我们借着上帝的帮助把他的魔影从地球上清除掉，并把人民从他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任何一个继续战斗抗击纳粹主义的国家和个人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一个跟着希特勒走的国家和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约一个月后，丘吉尔才得到斯大林的直接反应，无论如何双方是携起手来了。双方协议：决不同德国单独媾和；英国派遣 2 个中队的皇家空军飓风式飞机至摩尔曼斯克以护卫北部运输线，同时派军队至伊朗建立当地的供应线并阻止德国夺取油田。9 月在伦敦开了个英美供应会议，决定将原定送交英国的各种军火转交给苏联。

与此同时，丘吉尔需要思考、了解、判断和决策的问题还很多。除了保卫英国本土之外，还有中东战场甚至远东战场的问题。英军在北非暂时难以进展。德国空军和潜艇仍很活跃，使英国海军在地中海东西两端都遭到很大损失，马耳他岛又遭到封锁。英国在大西洋上的供应线也受到极大威胁。而在远东，有很多迹象显示日本准备南进，对英帝国的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倘若如此，美国必将被卷入一场太平洋战争。英美两国需要维护的共同利益更多更广，因而在战略目标和军事行动上的协调一致和紧密配合，就具有关键性意义。

经过磋商，英美首脑会谈订于 1941 年 8 月 9 日在纽芬兰的阿金夏半岛大西洋洋面上举行。丘吉尔搭乘战舰“威尔士亲王”号赴会。战舰一驶出斯卡帕·弗洛便遇到了暴风雨，这使舰长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天气德国潜艇在公海上难以发挥效能。大西洋的恶劣天气使舰长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由驱逐舰护航，那就得降低航速，要么抛开护航，单独高速前进。当时最需要的是安全，而只有高速前进才有更多的安全。丘吉尔终于无比欣喜地让“威尔士亲王”号载着他 and 属下一行单独地高速驶行在大西洋上，能保卫他的仅是战舰上的几尊炮。

罗斯福是搭乘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来到纽芬兰的。这是他同丘吉尔的第一次会见，虽然他们之间曾在电话上交谈过多次。丘吉尔时时不忘自己的地位稍逊于罗斯福，因为罗斯福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国家元首，而他作为首相，仅是政府首脑，因此他很注意对美国总统保持适当的尊敬，他们之间的关系此后也一直非常和谐。8 月 9 日早晨，丘吉尔先登上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转呈了英王乔治六世的信件，随后开始会谈。第二天早晨由罗斯福来到英国战舰“威尔士亲王”号继续会谈。会谈共进行了四天，双方在各项指导原则上意见一致，但是在具体事务上有分歧。最后就一致同意的原则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即被称为《大西洋宪章》的那个文件。

这次会晤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它向轴心国家显示了英美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团结，然而其中并没有从原来基础上向前作出新的发展。特别使丘吉尔失望的是罗斯福会后向美国记者们表示美国“并没有更接近战争”，从而在英国内阁中引起一阵沮丧。其实罗斯福也不曾料到美国距离战争只有三个多月时间了。

10月间，日本内阁改组，东条英机成了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一方面继续同美国政府谈判改进两国关系，另一方面积极着手为袭击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和进攻香港及马来亚作准备。这将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构成极大威胁。英国总参谋部和帝国国防委员会很久以来就认为，保卫新加坡甚至比保卫苏伊士运河更为重要，因为保卫新加坡事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丘吉尔并不同意这种帝国战略观点。不过早在1941年1月29日—3月29日英美参谋人员在华盛顿进行的秘密会商中，英国曾力促美国承担保卫新加坡的责任，可是美国拒绝了。狄尔将军主张英国派兵增强远东地区的防务，丘吉尔没有同意。他还相主外交部的看法，认为日本不会在苏联战败之前在这一地区参战。结果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防御措施十分薄弱，地面部队只有2个印度师、1个澳大利亚师，都未受过丛林战训练。飞机都是老式的“野牛”型，根本无法同日本的零式飞机相比，坦克一辆也没有。丘吉尔曾在7月派德夫·古柏去新加坡了解当地的防御情况，后来又派遣2艘主力舰去，但是已无济于事。12月7日星期日晚上，丘吉尔正在他的契克斯官邸同美国大使魏南特和租借法案负责人哈里曼一起，无意之中他从一架袖珍收音机中听到了“日本袭击美国”的消息，他立即打电话给罗斯福，确证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事。虽然他尚未获知细节，但是他知道整个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他当时的反应是显示出极大的欣慰，因为美国终于正式参加进来了。

珍珠港事件之前，战争只是欧洲的斗争，但是有了珍珠港事件，这场战争便是世界性的了。两大阵营已经清楚地对峙着，只是日本同苏联尚未交战而已。这一新局面的形成使丘吉尔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自从法国沦陷以来，他一直认为，只有凭借美国人力物力的支援才能扭转战争的进程。现在美国，正如罗斯福总统在电话中对他说的那样，和英国“在同一条船上了”。同舟如何共济，这是亟待商讨解决的大战略问题。丘吉尔提议要和罗斯福再次进行晤谈，罗斯福同意了，地点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12月，丘吉尔一行约80人，包括三军参谋长，搭乘主力舰“约克公爵”号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12月22日到达华盛顿后，丘吉尔被招待住进白宫，因此同罗斯福总统有更多的接触机会。丘吉尔向罗斯福提议英美共同对法属北非进行干涉，因为他认识到美国人要比英国人更受当地法国人的欢迎，这里面有个在法国和在北非的法军中将会产生巨大心理效应的问题。罗斯福同意了这些意见。双方还同意美国军队不久将进驻北爱尔兰，以使当地受过充分训练的英军可抽调出来担负其他任务，双方也同意美国轰炸机应参加轰炸德国。两天后迎来了圣诞节，会谈暂停。丘吉尔除了和罗斯福一起参加白宫的圣诞庆祝活动外，还花了不少时间准备将于12月26日向美国国会两院发表的一篇演说。对丘吉尔来说，这将是一次新的考验，尽管他是位著名的演说家，可还从来没有向外国的国会发表过演说。演说的结果当然是受到热烈的欢迎，当他离开国会时，全体议员起立向他热烈鼓掌。丘吉尔发表完演说的当晚，他回到房间里觉得闷热，便去开窗。窗很紧，他费了些力才打开，就在这时他感到有些不舒服。第二天早上他告诉随行医生查尔斯·威尔逊：

“我当时透不过气来。心口隐隐作痛，一直痛到左臂。时间不长，可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怎么一回事？”威尔逊知道这是轻微的心脏病发作，但是为了不让丘吉尔和大家惊慌，他没有明说，只是嘱咐他避免劳累，心里想着回国后得让著名的心脏病学家帕金逊替他检查。继续会谈时，罗斯福提议在西南太平洋建立联合司令部，罗斯福心目中的司令人选是时任印度总司令的魏菲尔将军，司令部的各级官员将由各国军官分任。双方还同意在华盛顿设立一个英美联合总参谋部委员会，狄尔将军被任命为驻该委员会的英方高级代表。这些决定在美方看来都是对英国的让步。丘吉尔接下来对加拿大作了短暂的访问，于除夕回到华盛顿。元旦那天他和罗斯福签署了一项宣言，后来又由苏联和其他同盟国参加签署，宣称各国决不同敌人单独媾和。1942年1月初丘吉尔到佛罗里达州去休息了几天。1月15日他离开华盛顿赴百慕大群岛，“约克公爵”号主力舰正在那里等着接他回国。可是他一时兴至，决定改乘送他来百慕大群岛的那架波音飞机回国。这一改变使他早一个星期回到伦敦，而在当时的大西洋上作出这种少见的重大改变，亦表明他仍具有冒险精神。丘吉尔回到英国时发现全国舆论焦躁不安，主要是因为两艘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击退”号在马来亚海域被日军击沉，另外还因为隆美尔在西部沙漠发动的攻击突然取得了成功。于是他决定就举行信任投票事在下院进行一次辩论。1月27日，丘吉尔在下院带头开展了这场辩论，他在发言中先宣布隆美尔的军队已有三分之二伤亡或被俘，然而他称赞隆美尔是个“非常勇敢、有本领的对手……并且，若撇开战争的大破坏不谈，他也是个伟大的将领”。丘吉尔又谈到对苏联的武器和物资供应，谈到在华盛顿作出的决定——建立西南太平洋联合司令部和联合总参谋部。他描绘了在远东发生的灾难，而且肯定他说还会有更多的灾难到来。他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并且提醒大家，他原来就说过他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他有时把情况说得比真相更严重。他着重说明了这场灾难的普遍性，只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才能对付那些独裁者，因此绝对必需的是人人都紧紧跟着他。他说：“我就是议会和全国应该责备的人，因为我为它们服务得不够好。虽然发生了过去的错误，而且今后还会发生，可是我若得不到它们的信任和诚心诚意的帮助，我也无法有效地为它们服务。”丘吉尔的一大通以退为进的论述，成功地避免了大家对真正的争端进行认真的讨论，那就是他究竟该不该被委以全部权力，能不能允许他独断独行。如果不该和不能，那么他只有撒手不管了！要他管，就得给他全部权力。他的言词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英国和丘吉尔是不能分离的。

赫罗·尼科森也认为丘吉尔的发言是非常成功的，因为：

大家都能切实地感觉到反对之风正随着他的一句又一句发言而在消逝。等到他结束发言时，很明显，已不存在反对意见了——只有某些不安而已……当他觉得整个下院都已站在他这边时，他简直难以掩饰他对自己的发言的欣赏，那也正是他的惊人的魅力所在。

在三天辩论中发言的人多数是同情丘吉尔而对他提些批评的人，他们宣布愿意继续支持政府。也有个别人对政府的机构组织有意见，也有批评首相兼任国防大臣的，也有人提议设立一个比过去的军火部更大的生产部。丘吉尔在最后一天再度发言时宣布接受成立生产部的提议，准备任命一位生产大

臣。最后举行信任投票时，信任政府的票数是 464 票，不信任的只有 1 票，是独立工党的。

丘吉尔赢得这次信任投票的巨大胜利主要是靠了他的辩才，加上一些并不太高深的谋略。可是根本的胜利还得从前线取得。当时不论从海洋上还是从沙漠中传来的消息都令人沮丧。德国潜艇继续在北大西洋击沉英国商船，1942 年头两个月便击沉了 52 艘。新加坡 6 万名驻军于 2 月 15 日向人数比他们少得多的日本侵略军投降了。隆美尔又取得了进展，重新占领了班加齐。更令英国人不安的是在 2 月 11 日夜，3 艘德国军舰从法国港口布列斯特驶出，安然通过英吉利海峡，驶入北海。它们经过杜佛海峡时正好是大白天，可是发现它们时已经晚了。敌舰居然在大门前溜过去而未被逮住，英国本土又如何能保证不让敌人偷偷登陆？

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丘吉尔只能采取对政府进行改组的办法来平息舆论。原英国驻苏联大使克利浦斯爵士任掌玺大臣兼下院领袖，艾德礼任副首相兼自治领事务大臣，克兰博恩改任殖民地事务大臣。金斯莱·伍德仍任财政大臣，但退出战时内阁。格林伍德虽是工党副领袖，但在行政才能上并无特殊表现，便退出了政府。早些时候已成为战时供应大臣的比弗布鲁克患有严重的气喘症，趁机辞职，被派往美国执行别的任务，接任供应大臣的是原在开罗任国务大臣的奥立弗·李特尔顿。对这次被迫改组政府，丘吉尔感到有些难堪。他为了避免同卸任的大臣们进行痛苦的面谈，便用书信通知他们有关的事项。可是这次改组对公众舆论还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下院中的情绪也有好转。

前线传来的仍不是好消息。3 月初，仰光落入日军手中，由亚历山大将军统率的军队历尽艰险才辗转逃出，到达印度边境。日军还在继续进占东南亚。日本海军和空军甚至击沉了印度洋上的英国巡洋舰和航空母舰。新的危险已露出端倪，日军如果在印度那些不设防的海岸登陆，说不定还可能和穿过伊朗而下的德军会师，到那时，整个广袤的亚洲将陷入法西斯之魔掌。

在欧洲，苏联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5 月到英国就此进行商讨，顺便还要研究与英国长期结盟的问题。莫洛托夫要求承认苏联 1941 年的疆界，丘吉尔和艾登毫不让步，理由是这一要求违背了英国向波兰所作的保证，而且也违背了《大西洋宪章》。最后英苏两国同意签订一项 20 年的同盟条约，不提疆界之事。于是，丘吉尔表示可在 1942 年内开辟第二战场。事实上丘吉尔当时还没有拿定主意。他考虑过由英军和加拿大军从挪威北部打过来，从上往下，“把希特勒的欧洲地图卷起来”。这也是斯大林所要求过的。他自己也认为此计甚好，甚至已为之取了一个代号：“木星”行动。但是总参谋部和作战策划人员不赞成，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最后只得作罢。大家觉得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把开辟第二战场一事推迟至 1943 年或更迟一些时间，改为由美英联军从法属北非下手，这样就可以肃清地中海的敌军，有利于运输线畅通。

为了商讨这些前景及其他可能性，丘吉尔觉得有必要再同罗斯福商谈，因为战争即将转入新的局面。6 月中，他轻装简从，仅由总参谋长艾伦·勃鲁克将军和伊斯梅将军陪同，搭乘波音“飞剪”号飞艇赴美。他先坐专列到苏格兰南部的洛克·斯特兰瑞尔，在那里登上飞艇，经由纽芬兰飞往华盛顿。临行前他写信给英王乔治六世，表明如有不测，请任命安东尼·艾登继任首相。

在他启程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英美双方都在战场上获得一些成功。皇家空军于5月30日第一次派出1000架轰炸机空袭了德国城市科隆；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于6月4日在中途岛一役中炸沉了4艘日本航空母舰。这些成功至少表明，盟军尚拥有强大的作战力，远非早些时候人们所认为的一蹶不振。美国庞大的工业机器已经转入战事的轨道，能够大批量地生产军火。丘吉尔知道同盟国最后战胜法西斯必须依靠美国庞大的工业机器。

丘吉尔抵达美国后在首都华盛顿稍加逗留，便飞赴纽约州海德公园罗斯福总统的住所。在那里他同罗斯福会谈的气氛极其融洽。双方都对未来表示乐观。他们还讨论了同制造原子弹有关的问题，并达成了协议。在那之前，原子弹一直还处在科研阶段，现在则需要建造一些大工厂了。双方同意制造原子弹的工作将在美国进行，因为英国资源不足，而且容易为敌人侦察到蛛丝马迹。由于这一问题极为机密，所以不作笔录，没有书面文字记载，因而事后好几个月，这一协议未再被提起。6月20日晚，丘吉尔同罗斯福一起乘火车返回华盛顿。6月21日那天早上，丘吉尔经受了 he 一生中少有的一次巨大震惊。当他刚走进总统的书房，就有秘书给总统拿来一份电讯。总统阅后一声未吭，默默地递给丘吉尔。那上面用打字机打出的字是：土布鲁克陷落，2·5万人被俘。丘吉尔几乎要晕倒了，这不是又一个新加坡吗？其后果甚至还可能比失去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更严重。土布鲁克是利比亚东北角的一个地中海港口。占领了土布鲁克，隆美尔就能挥戈东向，直指埃及的亚历山大利亚了，甚至还可能进而同高加索的德军会师。

当时罗斯福就问丘吉尔：“我们能给些什么帮助？”丘吉尔答道：“给我们大量希尔曼型坦克，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并且尽快运到中东。”罗斯福请来了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决定给英国300辆希尔曼型坦克，还加100座105毫米口径的自行火炮，送至苏伊士运河。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也是丘吉尔此行的重要收获之丘吉尔和艾伦·勃鲁克将军在这次首脑会谈中结识了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并在他们二位的邀请下，花了一天时间到南卡罗莱纳州的杰克逊堡去观看了各种军事演练，包括看了600多名伞兵的空降表演。史汀生是赫赫有名的共和党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出任过政府部长，年龄比丘吉尔还大。对于丘吉尔来说，此次访美事关盟军的作战前途，事关英国的命运，因而取得美国的同情和了解，以及进一步的援助和支持，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6月26日丘吉尔回到伦敦后，发现议会中有少数议员正在大叫大嚷地反对他。他们表示对他已失去信心，甚至指控他在实行希特勒的独裁手法。这部分议员提出动议表示“对这场战争的中央领导已失去信心”。丘吉尔只得接受挑战，在7月1—2日听候下院的抉择。

下院的这次辩论是对丘吉尔的战时内阁批评最厉害的一次。为首的反对派沃德劳·密尔纳爵士，是保守党内老资格的后排议员。他对丘吉尔兼任国防大臣竭力反对，但是他建议的接任者却是国王的弟弟格罗斯特公爵。他此言一出立即全场骚动，有人在下面骂他蠢货，那是因为格罗斯特公爵是众所周知的德薄才鲜的玉族成员，声望极低。反对派拥护这样一个角色，等于把自己同他归类在一起了。有些发言者既批评丘吉尔，又推崇他卓越的才能。也有些批评意见前后矛盾，毫无力量。丘吉尔在答辩时并没有为土布鲁克陷落作解释，而是着重指出反对派对他的指责中的错谬和矛盾。表决时，反对派以25票对475票遭到惨败，丘吉尔又一次获得大队丘吉尔原准备7月上旬

亲赴开罗了解北非战场的形势，可是没有去成。接着，罗斯福派霍普金斯、马歇尔以及金氏海军上将来到伦敦，同丘吉尔讨论未来的战略问题。马歇尔主张早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金氏对马歇尔的主张表示支持，但认为如果不能早日进攻法国，则另一最佳选择应是加强投入太平洋战争的力量。英国总参谋部认为，反正在 1942 年不可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罗斯福知道了英国的意见后决定在法属非洲开展攻势。这一决定是在 7 月 25 日作出的。

一星期之后，丘吉尔偕同总参谋长艾伦·勃鲁克飞往中东，打算更换第八军的领导，然后再赴苏联，访问斯大林，告诉他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在开罗时，丘吉尔任命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接替奥钦力克将军为中东英军司令，并想让高特中将任第八军军长。艾伦·勃鲁克建议由伯纳·蒙哥马利任第八军军长。不久高特中将因飞机被击落而丧生，蒙哥马利便担任了第八军军长，他的主要对手便是隆美尔。随后丘吉尔便飞往莫斯科。当他于 8 月 12 日抵达莫斯科时，在机场受到了全部军事礼仪的接待，又让他住在城外华丽的别墅内，这使他非常高兴。但是他同斯大林的会谈并不和谐。斯大林要求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则认为部队和供应都不足，在 1942 年内开辟不了，这使斯大林很不高兴。丘吉尔又讲了被称为“火炬”行动计划的进攻法属北非的打算。实现这个行动计划是打希特勒的软腹部位，可以把隆美尔赶出非洲。斯大林对之疑信参半。两人的商谈有时候非常激烈，但有时候也互相显示友好。有一次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说，他在 1920 年时曾尽力想扑灭俄国革命。斯大林笑了笑说这些事现在都已被宽恕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说，“而过去是属于上帝的”。

在后来的谈判中，丘吉尔答应在 1942 年下半年同苏军一起攻打挪威的德军，并且同意于 1943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才使斯大林大为释怀。丘吉尔回国前夕赴克里姆林宫辞行时，斯大林留他用餐。彼此交谈近期来战局的发展情况。斯大林情绪极佳，因而晚餐进行到后来变成了盛宴，时间也超过了半夜。由于次日凌晨丘吉尔就要飞离莫斯科，所以那晚他根本没有时间睡觉。只是在他们一行人飞往德黑兰的途中，丘吉尔才在飞机上足足睡了一个上午。

“火炬”与“霸王”

把解放的“火炬”带往法属北非。“霸王”，人类战争史上最壮观的一次两栖作战。

罗斯福派到英国来统率远征军的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他虽然缺乏作战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直得不到上战场的机会），但是他被认为是很适宜于指挥一支由各国军队联合组成的作战部队。丘吉尔作出的安排是每星期邀他到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共进一次午餐，商讨有关事宜。

“火炬”行动的部署是由美军首批登陆控制局势。由于法国维希政权尚同美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其在北非的军队见到美军登陆也许不至于拼命。美国主张只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两处登陆，丘吉尔主张再增加阿尔及尔和波奈两处，以便疾进到突尼斯切断德意军队的供应线。商量结果，一致决定再增加阿尔及尔一处为登陆点。

10月23日，行动开始。先是猛烈的阵阵炮轰，接着步兵登陆，进入雷区为坦克扫清道路。11月2日，美军的坦克（包括罗斯福和马歇尔送到埃及的那批希尔曼型坦克），开始突破，迫使德意军队全面后撤。盟军在8日全面登陆，虽然遇到猛烈抵抗，却在当天就攻陷了阿尔及尔，10日攻陷奥兰，到11日，在北非的法国维希政权第二号统帅达尔朗海军上将下了令，摩洛哥司令官才宣布投降。为了报复，希特勒命令德军立即全部占领尚未被占领的法属北非领土，这又导致了土伦的法国舰队全部凿沉。

丘吉尔对登陆胜利大为兴奋。11月10日，他在午餐会上发言说：“战士钢盔上闪烁的光彩温暖和振奋了我们所有人的心。”他认为，战争的转折点来到了。

进攻北非的初步目标是占领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尔之间的主要港口，不让轴心国利用这些港口作为潜艇基地去增援东面沙漠中对英国部队的战斗。进一步的目标则是要同原来在非洲沙漠中与隆美尔作战的英军协同作战，以期摧毁德意轴心国军队在北非的力量。在北非登陆的同时，蒙哥马利将军统率的第八军也在埃及突击阿拉曼的敌军战线，取得了成功。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胜仗，而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还包括这一时期苏联红军在东线拖垮和消耗了大量德军，以及美国军火生产日益增长所形成的丰富的武器来源。盟军在北非步步进展，逼得隆美尔部队退到利比亚沿海，再西撤到突尼斯。同时，在东线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军遭到苏军从侧翼的攻击，到1943年2月2日，德军全被击溃，不得不投降，被苏军俘虏的德军达9万人。

1943年初，丘吉尔和罗斯福都认为需要就战略问题再进行会谈。他们希望斯大林参加，但斯大林因忙于指挥战争，不能分身。因此丘吉尔和罗斯福就于1月中旬在卡萨布兰卡郊区的海边风景区举行了会谈。

在联合总参谋部的会谈中，英国方面明确指出：最有利的作战地区是地中海，目标是打垮意大利。美国方面，金氏海军上将的主要兴趣在太平洋，而马歇尔则坚决主张在1943年跨海峡作战。但是，由于缺少运输工具，而又有大量盟军在北非，下一步在地中海某地展开攻势比较合乎情理。最后决定在彻底清除了北非的敌军后，下一步应是进攻西西里。同时，驻扎在英国的

美国空军将轰炸德国，作为对英国皇家空军对德轰炸的补充。联合总参谋部的这些决定后来都获得了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批准。丘吉尔直至 1942 年 12 月还主张于 1943 年进行跨海峡作战，只是在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勃鲁克将军对他进行说服之后，才同意采取地中海战略。

法属北非的政治局面一时还很难解决。领导着自由法国部队抗击德军的戴高乐，在平民抵抗分子中名声很大，而法军的正规军官（即那些在 1940 年按照政府命令向德国投降的军人），却一直认为戴高乐是个逃兵。但是当时抵抗分子在北非并不起作用，因此英美在法属北非的首要争取目标只能是当地的法国武装部队。他们之中也不乏反对德国、反对维希政权的力量。

由于英美双方都认为被维希政权监禁在法国南部的吉罗将军能把北非的法军引导到盟国阵营中来，他们便精心策划，把吉罗救了出来，准备让他担任法属北非地区的行政长官。但是北非的法国人对吉罗非常冷淡，他作的广播演讲也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因为当地的法国军官按照传统，都认为应该受效忠宣誓的约束，听从合法统帅的命令，亦即是只有贝当元帅或达尔朗总司令才能命令他们投向盟军，正如在 1940 年命令他们投降德军一样。看来，还得和达尔朗打交道，这一点，丘吉尔早就估计到了。在“火炬”行动计划开始之前，丘吉尔便说过：“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极恨他，但我若能以爬行一英里路来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

经过几番波折，终于让达尔朗以德国入侵法国南部、破坏了 1940 年的停战为借口，转而同美国方面进行合作。吉罗也表示愿与达尔朗合作。于是，达尔朗向法国军队下达了停战命令，制止住了西海岸的战斗，也使法属西非重要城市达喀尔落入盟军手中。

12 月 24 日，达尔朗遭人暗杀，吉罗继任北非临时行政长官，这是获得美国同意的。但是吉罗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相互敌对，而这两股力量的团结是解决法国政治局势的重要保证。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尽管把他们都找了来进行了磋商，两位将军之间仍未达成真正的和解。

为了使英美两国国内的批评者们放心，也为了消除没有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斯大林的怀疑，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重申了盟国一致作战到底的决心，目的是要敌人“无条件投降”，唯此才能达成和平。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原则的确立，排除了对“单独媾和”可能性的任何探测。

丘吉尔于 2 月上旬回到国内后不久，又因患肺炎而卧床休息，但是他仍注意议会的动向。正好在这段时期，下院中发生了一场自丘吉尔的联合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反叛。事情的由来是一位前贸易部专家威廉·贝夫烈治爵士于 12 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引起的。贝夫烈治曾应工党副领袖格林伍德之邀，主持一个研究改进社会服务工作的委员会。结果贝夫烈治在他的报告中除了对现状的调查外，还提出了激进的改革建议。贝夫烈治决心从政府内部发难，声称不能修修补补而须进行革命，须扩大社会服务工作，增加对家庭的补助，实行全民健康保险，以及维持充分就业等。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战争已进行了三年多，战局的发展已使人们看到最终必可获胜的前景。因而有些人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对未来的建设上去，而对眼前仍处在浴血奋战的前线战场开始忽视了。贝夫烈治报告是针对政府的，因此也在下院的政治斗争中发生了作用。工党就整体来说是恪守不同保守党在补缺选举中竞争的诺言，因为它也是联合政府的成员。可是它如今也受到其他左翼团体的

竞争威胁。贝夫烈治报告所提出的要求如果被接受，英国在战后想延长租借法案就困难了，因为美国人不会在本国尚未实施社会福利制度之前，先花钱让英国来实施。因而 1943 年 1 月，财政大臣金斯莱·伍德就给内阁传阅了一份财政部文件，题为《社会保障计划的财务问题》，着重指出战后须承担的开支，以消除人们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2 月，下院就此进行了辩论。丘吉尔患肺炎没有参加。最后表决的结果是忠于政府的有 335 票，反叛的议员有 119 票，其中多数是工党议员，加上少数自由党议员和独立议员。反叛虽然没有成功，但激起的影响不小。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当时英国政治趋势在向左转。数月之后《新闻纪事报》发表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便表明了这一趋势。该测验询问读者：如果明天大选，你投谁的票。结果工党得票比保守党多 10% 以上。与此同时，丘吉尔的个人威望却有所增长，可以说是达到最高峰。民意测验的参加者中有 93% 的人表示同意丘吉尔当首相。

1943 年上半年最重要的战斗是突尼斯战役。这是将德军赶出北非的最后一战，战斗很激烈，德国还从意大利调来德军增援，但未挡住盟军的攻势。3 月底，第八军已把敌军逼到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夫一带。5 月初发起最后攻势。隆美尔看到败局已定，早在这之前就溜了，敌军于 5 月 12 日投降，轴心国在北非的兵力全部消灭。这一战役俘获敌军 25 万，半数以上是德军。

北非之战结束之前，丘吉尔就决定同罗斯福再次进行会谈。他于 5 月 5 日乘坐“玛丽皇后”号离开伦敦赴美。这艘巨型客轮正在充当把美军运往欧洲的工具。丘吉尔在船上把大部分时间花于同他的参谋长们一起拟订把地中海地区的战斗继续打下去的计划，以便同美方商谈。可是到达华盛顿后，他们发现美国的参谋长们并不持同样的观点。美国赞成尽早开始跨海峡作战，而且很坚决。最后双方妥协，由丘吉尔和马歇尔一起去阿尔及尔，同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商量，以决定是否应该攻打意大利。英国还认为：欧战结束后，盟国不应仅仅遏制日本，应当对日本施加不懈的压力，而且需要援助中国，使之继续抗战。丘吉尔和马歇尔于 5 月底从华盛顿飞往阿尔及尔，同时也把艾登召到阿尔及尔，协助促成戴高乐和吉罗达成谅解。在商谈中，艾森豪威尔认为他需要先看看攻打西西里能成功到何种地步，才能决定是否能攻打意大利，而进攻西西里按计划要等到 7 月 10 日才开始。丘吉尔是在 4 月中才意识到，一旦攻打西西里，1943 年便不能发动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原因是登陆艇不足。金氏海军上将在太平洋的作战行动以及欧洲的作战行动都需要大量的登陆艇，因而第二战场须延至 1944 年才能开辟。丘吉尔对于不能让地中海地区的英军和英国控制的军队接连不断地发挥作用很是遗憾。可是他不能违抗盟军总司令的主张，正如他不能不考虑和尊重美国总统的意见一样。

对丘吉尔倾向于先实施地中海战略或巴尔干战略，后进行跨越英吉利海峡作战的想法，人们褒贬不一。在“冷战”时期，曾有些议论认为如果当年丘吉尔的主张能得到贯彻，战后英美在对抗苏联时的实力地位会大为增强。可是这些议论没有考虑到当年战争时期盟国领袖们的想法，那就是首要任务是对付眼前实际存在的敌人，而不是去准备对付假设中的未来敌人。丘吉尔终究没有建议让盟军去干预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倒是向当地的爱国志士供应了武器，那些爱国志士中有不少共产党人。

7 月，盟军在西西里登陆成功。7 月 13 日，希特勒下令取消在苏联战场

对库尔斯克刚发动两天的攻势，而把军队调去增援意大利和西西里，以防意大利万一投降时可以马上接管，免得轻易落入盟军之手。在西西里获得的初步胜利又使丘吉尔考虑，为什么不直接攻打意大利海岸呢？马歇尔这时也感到可以攻击意大利本土了。联合总参谋部接受了这个观点，敦促艾森豪威尔“对那不勒斯直接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艾森豪威尔立即表示同意。7月26日，据宣布墨索里尼已被推翻和逮捕。意大利成立了以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为首的新政府，新政府和盟国秘密接触，其目的不仅是达成停战，还企图易帜投向盟军。

当英美两国的领袖于8月中旬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会晤时，参加会议的联合总参谋部决定，意大利新政府若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履行两项条件，（1）把舰队驶进盟国的港口，（2）释放全部盟军战俘。9月3日，一名作为巴多格里奥代表的意大利将军签署了这些条款。这天正是英军踏上意大利本土的日子，也是英国参战四周年的日子。9月8日，艾森豪威尔和巴多格里奥宣告了意大利投降。意大利舰队遵约驶往马耳他；绝大部分战俘获得了释放。可是德国的反应也很快。当英美军队在萨莱诺登陆时仍遇到强烈的抵抗。

在魁北克会议的参谋人员会议上出现了不少分歧，主要原因是美国怀疑英国根本不想实施跨海峡的作战计划。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罗斯福，说丘吉尔和艾伦·勃鲁克对“霸王”行动计划仅仅是口头上支持，因此这一作战计划必须由美国人指挥。事实上这话也对。丘吉尔在准备“霸王”行动计划的同时，暗中在筹划一个被他称作“木星”的计划，那就是佯装进攻法国，实际上进攻挪威。该计划由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领导的一个特别小组策划。丘吉尔的参谋长们都不赞成“木星”计划，而赞成“霸王”行动——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预定实施“霸王”行动计划的日子是1944年5月1日。英国的参谋长们认为这日子可以推迟几个星期，美国的参谋长们则坚持必须在那日子以前将英美盟军的7个师从地中海调到英国。

在谈到远东问题时，美方急于打通滇缅公路，以便运送物资支援中国，并可在那一带修建空军基地便于出击日本。丘吉尔知道美国舆论非常关注中国。他向战时内阁报告他的美国之行时说：“要是中国退出战争，会比俄国退出战争更令美国公众担心。”然而，丘吉尔不愿意在缅甸的丛林中发动一场战斗。他认为对日本的战争最好是从苏联的亚洲部分直接打击日本本土。可是苏联还没有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谈不上这一点。最后丘吉尔接受了需要在英国控制下在缅甸前进进一步的意见，并且让海军中将蒙巴顿勋爵担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统帅一职。

最后，两位领袖还签订了一项协议，决定相互交换关于原子弹的情报，并保证任何一方如未获另一方同意，决不使用此武器。

开完魁北克会议后，丘吉尔又在离魁北克不远的雪湖垂钓休憩所休息了几天。9月1日他又访问华盛顿，再一次成为美国总统的客人。9月6日他到哈佛大学接受了荣誉学位，11日晚离美返回英国。

德国统帅部对意大利的垮台当然不眼气。它不惜削弱东线的兵力来占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迫使巴多格里奥政府和国王逃往南部。德国的空降部队又把墨索里尼从监禁中救了出来，让他在意大利北部领导新建的法西斯政权。

德国此举无形中使斯大林减轻了压力。斯大林这时觉得应该同西方盟国商讨战略问题和战后的政策问题。这时在莫斯科正举行外长会议，会上作出

了一些重要决定,其中包括 11 月下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三国政府首脑会议。

罗斯福和丘吉尔商定在德黑兰会议之前先在开罗会晤,以决定共同的作战行动,并同蒋介石就远东战争的政策问题进行磋商。丘吉尔的兴趣在于说服美国人在实施“霸王”行动计划之前的几个月内在地中海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将要求得到更多的登陆艇,以求确保早日占领罗马和希腊的洛德斯岛;开辟一条可通达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供应线。这是罗斯福所不同意的。罗斯福一直想任命一位最高司令来负责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全部对德战争。而英国方面则不愿意让一名最高司令集大权于一身。这些问题都得在德黑兰会见斯大林后讨论解决。

11 月 27 日,罗斯福和丘吉尔飞抵德黑兰,斯大林早一天到达。这是第一次三巨头会议,主要是讨论和决定未来的行动计划。斯大林宣称宜尽早实施“霸王”行动计划,合作攻打法国南部。他负责在苏联境内发动攻势,阻止德军从东线调到西线。他还赞成设法使土耳其参战,加入盟国一边。如果保加利亚出面干涉,苏联将向保加利亚宣战。在后来的会谈中,三巨头还谈到波兰未来的疆界问题,一致同意东西疆界都向西移,也即是东边以寇松线为界,西边以奥得河为界。他们还略为谈到德国的未来。丘吉尔认为重要的是把德国南部同普鲁士分割开。他坚称:“罪恶的根源在普鲁士,在普鲁士军队和总参谋部之中。”他主张让德国南部和其他有关国家组成一个“多瑙河联盟”,可是斯大林表示异议,会议未作出最后决定。丘吉尔和罗斯福于 12 月 2 日从德黑兰回到开罗,把同斯大林一起商妥的政策作进一步的细节安排。罗斯福同意丘吉尔的意见,即任命两位最高司令分别统率地中海和大西洋的作战行动。由于承担开辟第二战场、实施“霸王”行动计划的军队大部分将是美军,因此这方面的最高司令将由美国总统来任命。本来人们以为罗斯福会任命马歇尔来担此重任,可是罗斯福认为国内太需要马歇尔了,不能让他离开华盛顿,因而任命了曾在北非大显身手的艾森豪威尔。至于地中海战区的作战任务主要是由英国和其控制下的军队承担的,因此由丘吉尔选择最高司令,他选了梅特兰·威尔逊将军。

12 月 12 日,丘吉尔一行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飞到突尼斯休息一天,准备再去意大利前线视察。可是在突尼斯时,丘吉尔感到不适,只得留在突尼斯休息。他的病被诊断为肺炎,心脏还有纤维性颤动。医生对丘吉尔的健康状况极为担心,怕他一下子垮掉。丘吉尔自己却并不认为有什么大碍,他不愿把全部工作撂下,也不肯对外界的事情一概不问。他在病中给罗斯福发去一份电报,告诉美国总统他所选择的英国新司令官不仅有梅特兰·威尔逊,还有蒙哥马利。后者将在“霸王”行动计划的初期统率全部军队。

过了那年的圣诞节,丘吉尔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便从突尼斯转到摩洛哥的马拉凯什去疗养。虽然他身体仍较虚弱,但是头脑仍极敏锐。他在疗养期间还接待了蒙哥马利将军、戴高乐将军和贝奈斯总统等访客。到 1 月中他才经由直布罗陀搭乘英王“乔治五世”号战舰返回英国。

12 月美国方面同意推迟登陆艇从地中海运至英国的时间。因此英国就有可能于次年 1 月在意大利海岸发起一次新的两栖登陆,地点选择在安齐奥。登陆于 1944 年 1 月 21 日开始,确实出乎敌军的意料之外,但是敌军反应也不慢。安齐奥距罗马约 40 英里,盟军两个师登陆四个星期后仍无重大收获。丘吉尔自我安慰地对下院说:“我们总得在某个地方打击德国人,要不然就

是光站在一边看俄国人打了。在意大利的这场拖泥带水的战斗中使用的部队都是不能在其他大战役中使用的，因此这场战斗也是其他大战役的预演。”事实上，在意大利的盟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属下的精锐部队已被调回英国准备参加“霸王”行动计划，所以在意大利的盟军部队不占明显优势。到3、4月间，这些部队又陷足于泥潭而行进艰难，安齐奥滩头阵地还得从海上取得供应。只是到5月中才出现转机，盟军重新发动攻势，攻占了蒙特卡西诺。6月初，罗马的守敌渐渐不支，美军于4日攻进了这座首都，这对即将开始一场规模更大的两栖登陆战——“霸王”行动计划——的盟军部队来讲，是重大的鼓舞。

尽管西方盟国的地面部队在“霸王”行动计划实施之前所牵制的德军，不如与苏联红军交战的德军为多，然而从空军和海军的作战情况来看，情势就大不同了。对付德国的潜水艇是英国海军的一项经常性任务，其内容还包括替经由北极地带驶往苏联的船舰护航在内，因而任务更为艰巨。在1943年初期，英国海军舰艇遭击沉的数量很大，而德国潜艇的数量却仍在猛增。可是在1944年，情势不断改观，盟军的反击逐渐见效。盟军用美国制造的“解放者”型和“卡塔林那”型超远程飞机在冰岛和纽芬兰，以后又在亚速尔群岛建立了空军基地。这些飞机装备有雷达，可以在被德国潜水艇发现之前先找到对方。因而到了1943年后期，德国的海上舰队，包括两艘大型战舰“提尔毕茨”和“夏恩霍斯特”号在内，都已遭到严重毁坏。

至于空军方面，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大队在战争初期对德国的轰炸是极不准确的。据1941年8月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出动的轰炸机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炸弹落在距目标5英里之内。不过英国皇家空军终于在1942年5月发动了一次用1000架轰炸机对德国城市科隆的大轰炸，显示了一下威力。丘吉尔认为这是英国所能向苏联提供的唯一的军事援助。他在1942年和1943年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总是强调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效果，他自己在参加德黑兰会议时也穿上了一套英国皇家空军的制服，以示对皇家空军的推崇。

1943年末和1944年初，英美两国的轰炸机队又承担了两项其他重要任务，都获得很大成功。一是摧毁德国发射“无人驾驶飞机”，即飞弹的各个基地，二是连续空袭法国的运输网，以阻止在“霸王”行动计划实施初期德军的迅速增援。早在1943年4月，英国的参谋长们便要求丘吉尔任命一位大臣，对德国的“秘密武器”进行调查，他们提名的人选是供应部的联合政务次官，丘吉尔的女婿邓肯·桑茨。丘吉尔同意了。在桑茨的提议下，英国皇家空军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试验站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使德国发射飞弹的计划不得不推迟。设在法国北部的一些发射台也有不少在空袭中被炸毁。空袭法国运输线的建议使战时内阁极为忧虑，它担心平民会遭受伤亡，从而使盟国失去法国的民心。这一点艾登坚持最强烈。丘吉尔同意和罗斯福商量，罗斯福的答复是：他“不打算从遥远的地方来限制负责的司令官们认为使‘霸王’计划获得成功所必须采取的军事行动”。罗斯福这句话被认为是最后的裁定。值得庆幸的是，空袭运输线所造成的伤亡并未如估计的那样大，法国的民心也未大失。

“霸王”行动计划的实施，为期迫近。丘吉尔下令每星期召集会议，由他亲自主持，讨论“霸王”计划对英国的影响，还要考虑有关“桑茨”计划的细节，即在诺曼底海滩建造人工港（在占领更大的天然港口以前使用），

同时还要精心策划如何迷惑敌人，使敌人在判断登陆地点和登陆日期时误入歧途，使敌人相信主要的登陆地点在加莱地区，而不是诺曼底。

由于戴高乐经常对英美的一些既定战略安排显示“独立性”，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并未将“霸王”行动计划的细节安排随时向他通报。这就不免形成了某种外交危机。戴高乐表示不愿向法国人民广播宣传“霸王”行动计划，还声言准备撤回原定同盟军大部队一起登陆的法国联络官。丘吉尔大为恼怒，他告诉戴高乐，如果他不得不在支持美国还是支持法国两者之间选择时，他将永远选择美国。艾登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时，对丘吉尔的这番话很不赞成。

5月中旬，距离预定的登陆日6月5日已不远了。15日那天，英王和首相一起听取蒙哥马利对进攻计划所作的汇报。国王问首相，盟军在法国登陆时他准备在什么地方，丘吉尔回答说他将乘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上亲眼观看登陆实况。国王认为他们两人谁也不能那样做，不能在那样的情况下渡过海峡。丘吉尔本来已为此作出了安排，现在他只能服从，压制一下冒险心理，取消原先的打算。作为战时内阁的首相，丘吉尔无疑拥有巨大的权力，因而在同僚之中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权力和影响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他的主张也有被压倒之时。有一次内阁讨论占领亚速尔群岛一事，丘吉尔主张进行突袭，但是艾登和其他内阁成员主张运用外交手段。结果，多数意见否决了丘吉尔的主张。在1943年内，由于他经常外出（全年有20个星期不在国内）或生病，内阁会议几乎有半数是他没有参加的（176次会议他有80次未参加）。因而这一时期内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相当的限制。在同各盟国的会谈中，虽然他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是还不能每次都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接受。鉴于英国在各种军援需求方面都有求于美国，丘吉尔还不能忽视同罗斯福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而罗斯福也是颇有主见的人，有他自己的一套行事方法，不会轻易听信他人，以至丘吉尔自己也说他有时候还“不得不抓住适当时机扮演一个阿谀奉承的角色”。艾森豪威尔一直密切注意着气象的变化，他要知道能否在预定的日子登陆。“霸王”行动计划所属的全部作战部队和后勤人员都在等待着他的决定。6月4日晨，天气预报有大风，似乎次日不宜登陆，他决定延期24小时。6月5日晨，天气预报肯定第二天是好天气，他就下令一切安排如期进行。因此开辟欧战第二战场的登陆日最后成了1944年6月6日。

欧战胜利大选失败

正当他得意地享受着“英国精神化身”的巨大荣誉时，正当他的威望似乎达到顶峰时，却被命运抛弃了。在长达6卷24册的战争回忆录中，他伤心地引用了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箴言：“对自己的伟大人物不怀感恩之情，是强大民族的一个特点。”

盟军跨过海峡在法国登陆的反攻壮举终于在1944年6月6日实现了。跨海动用的各种船舰达7000余艘，飞机11000架左右，规模堪称空前。参加登陆作战的英军、美军和加军全由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直到收复了相当部分的法国领土后，才改由艾森豪威尔统率全军。

登陆的主力部队在侧翼的空降部队的配合下进展极为成功。当地的德国占领军大部分是从东线俘虏过来的杂牌军，斗志不坚，装备又差。面对突如其来的盟军，颇难应付，幸而海岸防御工事还起些作用，才使他们抵挡了一阵子，但是绝大部分登陆地点都被迅速突破。战斗打响数小时后，丘吉尔就向下院作了初步报告，他的语气充满信心，但是措辞温和，显然是想使敌人相信，盟军还将继续在其他地点登陆。

胜利的喜悦诱使丘吉尔迫切希望能亲临滩头阵地作一番实地视察。六天之后，在得到了蒙哥马利将军的同意后，他踏上了诺曼底的英国占领区，陪同他前往的有总参谋长艾伦·勃鲁克和他的老朋友史未资将军。他们在距海岸5英里的蒙哥马利的临时司令部吃了午饭，然后视察了滩头阵地的几个小港口，看看能如何加以利用。完事后他们一行就乘坐驱逐舰“凯尔文”号返回英国。丘吉尔特别高兴地在舰上向仍由敌军占领的海岸发了几炮，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海军舰艇上亲临“战斗”。

6月23日，苏联开始了曾答应过的东线攻势，以阻止希特勒将东线军队调至西线。红军进展得相当顺利。西线的盟军虽然遭到德军8个装甲师的顽强抵抗，但也于6月下旬和7月上旬先后占领了瑟堡和加恩。

丘吉尔于7月20日又飞往法国视察，3天后回国。8月初他又赴法国一天，视察了美国布莱德雷将军的军队新攻占的一些地区。这个月内，高度机动的美国师歼灭了大量敌军。与此同时，法国抵抗运动也极活跃，8月24日巴黎解放，盟军越过塞纳河继续追击。

西线盟军的迅速推进，还自然而然地结束了德军原来以法国北部为发射基地的飞弹攻势。这里顺便提一下德国在6月中旬首次对英国东南部发动的新的空中攻势。那是一种被称作V—1的飞弹，一种载有炸弹的无人驾驶飞机。它一经发射，到达了事先计算好的距离后，引擎便停歇，经过短暂的沉寂，飞弹便落地爆炸。德国在实施飞弹战术后的五个星期内，共扔下了3000多枚。受害最重的是伦敦南部，可是由于它的投掷准确性较差，总的伤亡人数不算太多。不过也正是由于它的盲目性较大，它对伦敦居民形成的威胁也很大。又不能采取用高射炮击落它的办法，因为即使它被击落，炸弹也照样会爆炸。因而只能命令英美空军设法轰炸位于法国的飞弹基地。

可是到8月底，英国战时内阁又获悉另一项新的威胁即将到来。那就是一种射程比V—1更远的飞弹V—2。它可以从荷兰境内发射，是用火箭推进的，飞临时毫无预示，一受撞击立即爆炸。9月8日，第一枚V—2飞弹落在契舍克，随后就是伦敦，断断续续地轰炸了整个冬天。幸好V—2飞弹的准确

性较差，而且德国当时拥有的数量还不多，所以造成的损害不太严重。所幸的是，德国的飞弹攻势来得晚了一些。盟军已经在西欧登陆奋力推进，逐步解放法国的土地，飞弹攻势的作用自然只能越来越小。

8月初，丘吉尔对早已为联合参谋长会议所通过的决定，即再从法国南部登陆以同从诺曼底登陆的盟军相呼应，又有了新的考虑。他想听从史未资将军早些时候的建议，充分利用进军意大利之便，直捣中欧，可以先于苏军抵达维也纳。丘吉尔把这一建议向美国提出后，后者不同意。罗斯福和马歇尔坚持原计划不变，依然把注意力集中在西线，要在法国西部登陆。

8月14日丘吉尔飞往科西嘉岛，想去观看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次日清晨他登上“金勃莱”号驱逐舰，出海观战。这次登陆几乎未遇抵抗。虽然盟国海军舰艇按计划先向海岸轰击，然后部队登陆。可是对方对此却毫无反应，所以登陆部队可以向北疾进，到9月初便同艾森豪威尔统率的右翼部队会师了。艾森豪威尔从9月1日起才刚从蒙哥马利手中接过对盟军的全部指挥权。

8月21日，丘吉尔来到罗马，住进英国大使馆，准备处理意大利和希腊的政治问题。希腊之所以突然受到关注，是因为德国在巴尔干受到苏联的攻势，为了缩短战线准备撤出希腊。是否让抗击德军最力的共产党游击队从山上下来接管政府？丘吉尔当然认为不可。8月17日，他曾询问罗斯福是否同意英国派军进入雅典，26日接到罗斯福同意的回电。

丘吉尔在同意大利各政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后，在8月25日就去前线，到了离德军只有约500码的地方。这样做是有些冒险。他所坐的汽车只能顺着道上已有的车轮痕迹行进，以避免可能埋有的地雷。他自己后来曾说他那次冒险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听到枪声最多的时刻”。8月28日，他从那不勒斯经由拉巴特（摩洛哥）飞返英国。

现在似乎人人都感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可丘吉尔并不那样乐观。8月初发生在华沙暴动，因得不到援助而使成批波兰爱国者遭到德军屠杀，令人触目惊心。而这正是在红军已经挺进到距华沙不远处时发生的。

到9月初，想要马上举行一次三巨头会议显然不切合实际，丘吉尔就再次赴美与罗斯福会谈。尽管他不久前才从一场轻微的肺炎中康复，他还是带了一大群随从人员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搭乘“玛丽皇后”号邮轮前往美国。当这两位领袖会面时，由于欧洲的战线推进得十分迅速，已很不容易再对之进行共同策划，所以当时的会谈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对日本的作战问题上。丘吉尔曾在赴美途中同参谋长们磋商过把地中海的部队转调到东南亚之事，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以勿过早削弱在意大利的部队力量为上策。尽管如此，在会议上蒙巴顿勋爵仍被命令去承担夺回缅甸的任务，而丘吉尔还担心美国将来会因英国对击败日本无所贡献而看不起英国，因而坚持必须把英国的海空力量派遣到太平洋作战。这一建议立即获得罗斯福的赞同。德国在西线加紧顽抗，艾森豪威尔的先头部队受到阻击。英国第二军虽然已占领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但要迅速取得重大进展仍有待于加强兵力。丘吉尔决定再次会见斯大林。罗斯福因忙于竞选总统，不能远行，因此无法举行另一次三巨头会议。丘吉尔这次访苏是在10月8日，由艾登陪同。他想同斯大林讨论波兰问题和巴尔干国家问题，希腊问题也在其中。波兰在伦敦有个流亡政府，而在卢布林，在苏联支持下也成立了一个波兰政府。希腊问题则是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当地已有相当影响，丘吉尔和美国都不愿意看到左翼力量在战后执政。

苏联这次对丘吉尔的接待是极为友好的。丘吉尔不仅被安排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一幢别墅，而且在市内也为他安排了一处设备齐全的、舒适的住所。斯大林还陪同丘吉尔到大剧院观赏了芭蕾舞和歌剧片断的演出，并让他受到了全场观众非常热烈的鼓掌欢迎。

两位领袖在讨论军事问题时，斯大林表示一旦结束对德战事他就准备对日本作战，可是双方对丘吉尔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并未能达成谅解。10月19日，丘吉尔一行离开莫斯科回国。

在法国，戴高乐已被公认为全国领袖，到10月，在丘吉尔的一再说服下，罗斯福同意正式承认戴高乐政府，于是丘吉尔便准备对法国作一次正式访问。11月10日，丘吉尔一行到达巴黎，受到盛大接待。第二天丘吉尔和戴高乐在凯旋门会面，并一起在克列孟梭和福煦将军的墓前献了花圈。他们受到的法国民众的欢呼，据新任英国驻法大使德夫·古柏称，是他所曾听到过的“最响亮、最自发，最真诚”的声音。12日丘吉尔被授予巴黎荣誉公民称号。

1944年11月30日，丘吉尔度过了他的70岁寿辰。家人和亲友照例欢庆了一番。第二天他到母校哈罗公学作了一次深怀旧情的访问，随同的有妻子、弟弟约翰，以及几位也是哈罗公学出身的大臣。

1月初，丘吉尔致电斯大林，要求他在东线早日发动攻势。斯大林答应不迟于1月中旬。后来，斯大林在1月12日就发动了攻势。可是在西线的阿登的反攻却日趋疲弱，到1月中旬几乎停止。那是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下过一道命令，让军队暂时撤出斯特拉斯堡，以巩固盟军的战线，可是此举使法国方面惊骇不已，致使戴高乐和丘吉尔都向艾森豪威尔提出政治上的强烈反对意见。结果艾森豪威尔撤回了那道命令。这时蒙哥马利却举行了一次很欠考虑的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表示他是来纠正美国将军们所犯的错误的。丘吉尔闻讯一惊，只得赶忙设法补救，以免英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1月18日他在下院的报告中表示：“美国军队承担了几乎全部战斗任务，承受了几乎全部损失……根据我所掌握的专业咨询意见，我认为（美军）针对伦德斯台特的反击所作的一切，都是既坚决又明智，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正确无误的。”两个亲密盟友之间，在一些具体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发生矛盾以至双方时有龃龉，也不足为怪。其实还有一个促成双方心绪不快的原因，那就是重大战役已经打赢了不少，可是敌军就是不投降。眼看着这场战争胜利在望，可是大家还得在异地荒野上再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这就不免使人容易暴躁。丘吉尔有时也显得如此。他在内阁中有时也对同僚大声呵责。艾登在他1月12日的日记中说这个内阁“糟糕透顶”，每作一项决定都要浪费大量时间。过了几天，艾德礼也鼓起勇气给丘吉尔写了一封长信，指出丘吉尔在处理需要内阁作出决定的事务时缺乏正确的方法。艾德礼说他认为首相至少可以在由于他专心致志于军事战略而不得不忽略了的内政方面，多听取一下内阁阁员们的意见。他还怪丘吉尔过分依赖掌玺大臣和宣传大臣（比弗布鲁克和布雷肯）的意见，而他们两人都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丘吉尔对艾德礼的信很不高兴，但也找不出这封信中有明显不公正的地方。三天后，1月22日，他简短地复了一信，对艾德礼表示感谢，并说“您可以相信我将永远尽力从您的批评中获益”。

苏联答应丘吉尔在东线发动的攻势相当成功。那时德军装甲部队已无后备力量，苏联红军迅速肃清了原来属于波兰领土的那片地区上的德军，并深

入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境内。苏军的进展使三巨头又有了会谈的必要。这时罗斯福已第四次当选总统，他表示一俟在1月份就职后就能外出。斯大林则不愿在这时作长途旅行，建议三巨头在黑海之滨的雅尔塔会面，其他两人都同意了。

雅尔塔会议于1945年2月4日举行。面临欧战胜利在望的前景，三国领袖都神情欢畅，但丘吉尔注意到罗斯福在抵达时显得“体态虚弱、面有病容”。美国总统被安排在过去沙皇居住的丽华狄亚宫。为了他的方便，会议就在那里举行。丘吉尔和他的部分随行人员被安排住在数英里以外的伏龙佐夫宫，那是19世纪初按照一位英国建筑师为伏龙佐夫亲王设计的图样建造的漂亮住宅。这位亲王曾任过数年俄国驻英大使。会议的气氛极为友好。但在罗斯福宣称他不准备让美军在战争结束后留驻在欧洲超过两年时，丘吉尔大为吃惊。考虑到英国在承担占领德国的责任时不能无其他西方大国的支持，丘吉尔就力促让法国也在德国得到一块占领区。这一点获得了其他两位领袖的同意。关于建立战后的联合国组织一事，三国领袖都同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建议，决定建立。他们还同意让各大国都在安全理事会中拥有一票否决权，担任常任理事国。这些大国除了美、英、苏之外，还要加上中国和法国。这个新的联合国组织的成立会议将于4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苏联要求在联合国大会中也给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以代表权，这也获得了同意，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度和英国的自治领都有代表权，而苏联很难认为它们是自治的。会议还达成了关于波兰疆界的协议，即波兰的东西疆界都往西移，使德国丧失一部分领土而使苏联得益。只是关于未来的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未获结果。但就整体来说，会议是成功的。斯大林提议为丘吉尔祝酒，称他是个“百年难遇”之人。

对于雅尔塔会议的后果，人们有各种议论和看法，姑且不论。在参加会议的三巨头中间，对会议结果最感不满的或许是丘吉尔，他可能觉得西方大国对苏联让步过多，不过当时他仍是信任苏联这个盟国的。他在回国后还在下院声称，他不曾见过一个比苏联政府更信守诺言的政府。罗斯福当时健康状况虽然不佳，但并没有因此影响到他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他对待苏联仍极友好。他之所以愿意向苏联多作些让步是为了换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本的战争。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丘吉尔于2月14日飞往雅典。那里内战已经结束，丘吉尔受到了希腊群众的热烈欢迎。他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向广大群众作了简短的讲话。第二天他就飞往埃及，在那里分别会见了法鲁克国王、叙利亚总统，并约见了沙特阿拉伯国王萨乌德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他于2月19日飞返英国。一个星期后，下院就雅尔塔协定展开辩论时，有25名议员，其中大多是保守党人，投票反对政府允许苏波边界西移。

西线的战争在这期间十分激烈。整个2月间蒙哥马利将军统率的第一加拿大军团和美国第九军团，在杜塞尔道夫北面沿着莱茵河全线靠拢。这时已很明显，只要再发动一场最后攻势便能彻底击溃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从而结束这场战争。艾森豪威尔将军准备让蒙哥马利统率的几个军团和两个空降师从北翼强渡莱茵河，可是后来在艾森豪威尔前方的雷马根占领了一座架在莱茵河上的完好未损的铁路桥。这样一来，盟军在那一带过河已不成问题，从而使蒙哥马利发动一场最后攻势的意义不似原来那么重大了。到了3月，盟军在数处强渡莱茵河，到3月下旬，盟军距柏林只有300英里了。鲁尔已

被包围，德国的交通线被严重破坏，残存的工业很难再支持继续作战的德国军队。纳粹德国大势已去。丘吉尔这时决心要亲眼看一看战场情况，便于3月23日飞抵设在靠近德国边境的荷兰小城梵罗附近的蒙哥马利司令部。当夜他便目睹了蒙哥马利的军队渡河的情景。过了一天他又参加了艾森豪威尔同蒙哥马利的会谈。后来他还让蒙哥马利允许他乘汽艇在河上巡弋了约半个小时。

英国的空军元帅们对于如何能最有效地运用空中打击力量摧毁敌军，意见分歧。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主张轰炸敌人的油库；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的泰德空军元帅则主张轰炸敌军的交通网；而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哈里斯仍想推行曾经奏效的“区域轰炸”。这时盟军的空中力量已大为增强。英美的轰炸机司令部于1944年向德国城市投掷的炸弹已达25.46万多吨，而上一年只有14.35万多吨。可是，后来在丘吉尔出国参加雅尔塔会议期间，盟军方面在苏联的请求下作出了轰炸德累斯顿的决定。英美两国派遣轰炸机轮番夜袭德累斯顿，估计炸死了13.5万名德国人。后来当这场大毁灭的消息广为流传时，丘吉尔于3月下旬给总参谋部写了一封信，指出：“对德累斯顿的毁灭，已使人们对盟军的轰炸行动产生了严重的疑问。”4月1日，他又要求对“区域轰炸”政策进行重新审查。不过在那时，战事实际上已接近尾声了。

敌人终于显示出准备投降的迹象。3月下旬德国某些军方人员同亚历山大将军司令部的军官在瑞士进行接触，但并未产生结果。3月22日，莫洛托夫给英国大使一信，指责西方国家背着苏联同德国谈判，丘吉尔又发了火，认为是受到了“侮辱”，因为事先曾就该事通知过苏联外交部。罗斯福对此也有同感。但是当丘吉尔向罗斯福提议敦促艾森豪威尔迅速越过易北河，抢在苏联前面攻占柏林时，罗斯福没有同意。艾森豪威尔在此之前早已直接告知斯大林盟军的主攻方向不是柏林，这是经过罗斯福和美国的参谋长们同意的。所以丘吉尔在这个问题上只能作罢，认识到自己确实是力不从心。

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突然因脑溢血逝世，丘吉尔闻讯大为震惊。他本想亲自赴美参加葬礼并同新总统杜鲁门见见面，但是难以分身。最后让艾登去了，因为艾登本来就准备同艾德礼一起去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后来，丘吉尔对于未亲自去又感到后悔。因为按照美国的政治制度，总统所思考、磋商、以至决策的各种考虑，副总统未必都知道。尽管新总统杜鲁门声称决心继续其前任的政策，但是丘吉尔同罗斯福之间那种可以神交意会的关系却消失了。不通过个人之间的密切往来，这种关系是很难重建的。

4月下旬，苏军包围了柏林。在意大利战场上盟军的攻势获得很大成功，迫使当地的德军司令官于4月29日无条件投降。这时德国正在拐弯抹角地通过暗示进行试探，目的是在西线安排休战，以便德国全力对付苏联。这类暗示或建议都遭到了盟国的拒绝。德国政府必须向所有同盟国家无条件投降，这是坚定不移的原则。

4月末，墨索里尼携同情妇克拉拉从意大利北部企图越境逃往瑞士，被意大利游击队截住，逮捕，并枪决。希特勒也在4月底在总理府内自杀。他在自杀前任命了杜尼兹海军上将为继承人。接着就是准备投降事宜。5月7日，德军总参谋长约德尔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于5月9日零时生效。届时又在柏林举行正式批准仪式，参加者中代表德国的是德军总司令凯特尔元帅，代表西方盟国的是艾森豪威尔的副手泰德空军元帅，代表苏联的是朱可夫元帅。

被战争拖得精疲力尽的英国人民终于等待到了庆祝胜利的日子。5月7日，人群拥集在白厅面前，目睹丘吉尔乘着一辆敞篷汽车满怀欣喜地从人群中间经过。第二天丘吉尔正式向全国宣布战争结束。下院的感恩礼拜定在圣玛格烈教堂举行。丘吉尔由反对党代理领袖格林伍德伴同，带领议员们从下院行进到教堂。后来首相还同国王和参谋长们一起照了相。他还应国王的邀请，同王室成员一起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露面，接受无数深感庆幸的人民的欢呼。

庆祝对德战争获胜之余，还得想到对日战争仍在进行。要获得最后胜利还需要时日，还需要付出代价、作出牺牲。当时人们估计结束对日战争还需要一年半时间。

丘吉尔的政府已经成立了五年，而本届下院已经选出九年半了。欧战既已结束，联合政府是否仍有需要便成了突出的问题。

德黑兰会议时，丘吉尔曾经告诉过另外两位巨头说他自己是他们三人之中最易被免职的一个，因为首相的更迭只在下院的一念之间。现在，更新议会权力的时刻又来到了。需要决定的是在今后的对日作战中和以后逐渐转变到和平时期的过程中，将由谁来执政。

丘吉尔首先必须决定何时举行大选，是在6—7月就举行，还是等到10月。5月18日丘吉尔写信给艾德礼，请他考虑是否将联合政府继续维持下去直至击败日本为止。为了使其他工党领袖更易于接受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在草拟这封信时还得到了艾德礼的协助。这是一封正式的信件，其副本还同时送给了自由党领袖辛克莱爵士。艾德礼本人原是赞成继续让联合政府存在下去的，当时工党年会正在布莱克普尔召开，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工党的大臣们在讨论这封信时，摩里逊强烈主张尽早大选，原来同意艾德礼想法的贝文和道尔顿也逐渐改变了主张，最后，多数都不同意让联合政府继续维持下去，而主张早日大选。艾德礼只能接受多数人的意见，就给丘吉尔复信说：他们不同意将联合政府继续下去直至对日战争结束为止，而愿意延长至10月份，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为大选作准备。丘吉尔觉得既然联合已告结束，竞选已经开始，就不必再拖延至10月了，因此大选日期就定于7月5日，即6个星期之后。5月23日那天，丘吉尔正式提出辞职，随即被国王邀请组织新政府，即所谓“看守”政府，其成员包括保守党人、自由党人，及少数无党派人士。内阁扩大到16名成员，把三军首脑都包括了进去。5月28日，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举行了一个“招待会”，把即将解散的联合内阁的各位高级大臣请来相聚。丘吉尔盈着眼泪对他们说，“历史的光辉必将照亮你们所有的钢盔”。他还说，为了保证万一他在大选中失败后仍能确保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他提议请艾德礼陪同他去参加三巨头会议。这个会议在选举结果尚未揭晓时就得举行，那便是定于7月中下旬举行的波茨坦会议。

大选拉开序幕后，各种竞选活动纷纷开始，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内问题上来了。丘吉尔前后发表了四次广播演说。他除了对选民表明他主张建立福利措施、解决房荒等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外，还对工党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甚至说工党如获胜必将求助于某些盖世太保的体制。这类言论使他的形象从一个全国的领袖变成一个党派利益的维护者了，舆论对此都表示惊讶。艾德礼在广播演说中以温和的语气指出丘吉尔的演讲虽然仍是他的声音，却已是比弗布鲁克的思想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对抗，终于到了投票日。投票后还需要三个星期才

能完成计票工作。7月15日，丘吉尔飞往波茨坦参加三巨头会议，艾登和艾德礼也去了。丘吉尔觉得他在获知大选结果之前简直无法去处理会议中的重大问题。他于7月16日去柏林转了转，见到了已毁损的希特勒的总理府和希特勒最后死在那里的地窖。17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他，两星期前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试验原子弹获得成功。第二天他和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单独共进午餐，他们想相互了解对方的想法，谈论了两国之间争执的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

7月22日，在丘吉尔和杜鲁门以及他们的外交大臣艾登和国务卿贝尔纳斯一起举行的一次会谈中，英国方面对美国准备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计划正式表示同意。随后他们草拟了一份准备几天后发表的公告。公告警告日本在面临盟军的强大威力之际，须注意继续顽抗下去的危险性，而未提及原子弹。

7月25日，三位英国领导人回国，等待大选结果于次日揭晓。丘吉尔本来对大选中获胜是颇有信心的。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确信能得至少56席的多数，一向乐观的《每日快报》则认为可超过对手60席以上。因此丘吉尔晚上睡觉时还颇为自得，可是他在破晓之前被身体一阵刺痛的感觉弄醒了，他立刻觉得准是大选出了毛病。

到中午时，情况表明工党将在新议会中占多数席位。一连串的内阁大臣遭到击败。丘吉尔本人在他的选区是赢了，保住了议席，不过他的竞选对手、独立人士汉考克得票之多也令人惊讶。丘吉尔原来曾考虑过大选结果双方票数接近的可能性，可是这次大选的结果并不是双方票数接近，而是工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下院工党共获393席而保守党只得197席。

丘吉尔在当晚7时就进宫提出辞呈，并请国王召见艾德礼。国王觉得那次会见很伤心，他想给这位卸任首相授予嘉德勋章，可是丘吉尔觉得他不适合在那时候接受荣誉，便转荐艾登，可是艾登也以同样理由婉拒了。半小时后，国王召见艾德礼，请他组阁。波茨坦会议尚未开完，当了五年多战时首相的丘吉尔便这样在一次大选失败后下了台。

晚年生涯

英国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幸运，瞻仰他的遗容时，向他作最后致敬的人多达 32 万。

当议会于 8 月 1 日重新开会时，丘吉尔已是下院反对党领袖了。原来设想还需一年半的对日作战，竟在 8 月中旬就胜利结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了最后胜利，这给同盟国带来了无比的欣喜和欢乐，盟国领导人接下来考虑的是治疗战争创伤，规划和建设战后世界。

如今，身为平民的丘吉尔趁议会休假期间又开始了他所爱好的国外旅行。9 月初，他带着女儿莎拉和医生莫兰以及亚历山大元帅替他配备的两名青年军官，来到了意大利北部的科莫湖。他们住在亚历山大元帅在大战期间用作司令部的一所别墅中。科莫湖是个风景秀丽、气候温和的休闲胜地，丘吉尔可以在那里尽量蓄精养神、恢复元气，也可以外出绘画写生或择地野餐。他在休闲期间也可以翻阅他自己的战时纪事录并为准备撰写回忆录进行思考。

在科莫湖度过了三个星期的假期后，他又转赴法国东南部的海滨休憩胜地，两星期后才返回英国。1946 年初，他让艾登代理他的反对党领袖的职责，自己搭乘“伊丽莎白女王”号邮船外出旅行。他到美国，去佛罗里达州一位朋友家度假，又在迈阿密海滩休养了一阵子。2 月初又作为古巴政府的客人，到哈瓦那住了几天。他接受了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邀请，于 3 月初去该学院演讲。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故乡就是密苏里州，因此杜鲁门亲自陪同丘吉尔乘总统专车前赴密苏里州，并且由杜鲁门亲自把丘吉尔介绍给来听他演讲的听众。

丘吉尔为这次演讲曾经过充分准备，但是这次演讲产生的巨大影响谁都不曾事先预料到。丘吉尔开头讲的内容包括呼吁建立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主张西方大国保留“原子弹的秘密知识和经验”，以及要求为维护“英语民族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保存联合参谋部。随后他又公开说出了他对东欧遭到“暴政”统治的印象，这是他在一年前在同杜鲁门总统的私人通信中谈到过的。他向听众说道：

在整个欧洲，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降下了一块铁幕。在这条界线后面有着中欧和东欧各个古国的全部首都，……几乎每个国家都是警察政府掌权，迄今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都没有真正的民主。

当时大战获胜未久，英美公众对苏联尚抱有较友善的情绪，而丘吉尔用了“铁幕”一词，立即在各国舆论界引起骚动。斯大林反应很快，他在接见《真理报》记者时说，丘吉尔“现在竟采取了战争贩子的立场”。艾德礼和杜鲁门都拒绝公开评论丘吉尔的这次演讲。但丘吉尔在向艾德礼汇报时说，杜鲁门“在事前事后似乎都同样高兴”。可是美国国会中却又掀起了一阵强烈的孤立主义之风。1946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麦克马洪法案，规定不向英国交流任何涉及原子弹的情报。此举被艾德礼认为是“背信弃义”。可是在那次国会会议中同时也按照 1945 年秋季谈妥的一项协议，授权给予英国一大笔低息贷款，丘吉尔于 3 月 11 日对此公开表示热烈赞扬，艾德礼还为此向

丘吉尔拍发了一封感谢电报。

早在 1945 年 11 月，丘吉尔在布鲁塞尔所作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出了欧洲各国联合成一体、建立某种类似“欧罗巴合众国”的思想。1946 年他从美国回到英国后，虽然有时候也在议会中出现，对工党政府提出些批评，但是多半时间他花于访问西欧各国，接受名誉学位、荣誉公民称号、奖章和礼品，忙得不亦乐乎。他在西欧的历次演讲中都一再阐述他关于“欧罗巴合众国”的思想，他认为这是解决欧洲战后困苦处境的良方。

战后英国经济状况比较平稳，但西欧各国的恢复工作仍困难重重，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力量虚弱，美元短缺。1947 年 2 月，英国通知美国：英国不久将停止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杜鲁门总统迅速作出反应，要求国会提供必要的信贷，并宣称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抗本国和外国的压力。丘吉尔认为这正是表明他的“铁幕”演讲的正确性的一个例证，也表明美国已愿意负起“遏制”苏联的重任。

这时，已成为杜鲁门政府国务卿的马歇尔于 1947 年 6 月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美国愿意对整个欧洲提供经济援助，只要欧洲各国合力制订一项利用援助的计划。马歇尔演讲所表明的思想，可以说是来自丘吉尔首创的“欧罗巴合众国”的思想。马歇尔的这一提议立即得到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的欢迎，随后就在巴黎召开了欧洲国家会议，苏联和东欧各国未参加。会议开始筹划一项“欧洲复兴计划”，即所谓“马歇尔计划”，这项计划对战后西欧的重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亚洲，印度独立问题是当时工党政府关心的问题之一，丘吉尔认为由于印度社会深刻分裂，英国撤离恐怕会造成印度的内乱无法遏止。工党内阁于 1947 年 2 月宣布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将不迟于 1948 年 6 月结束。丘吉尔马上对之进行攻击，他不同意赋予印度次大陆以自治权。可是他这一立场在保守党内也不是人人都同意，曾任印度总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上院发表演讲，对工党政府的计划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艾德礼首相任命了声望极高的蒙巴顿勋爵接替魏菲尔为末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是一位极富紧迫感的人。他在就任后几周之内，就决定提前于 1947 年 8 月移交权力。他认为实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是解决这块次大陆持续多年纠纷的唯一办法，丘吉尔最后只得承认他反对印度次大陆自治是失败了。1947 年 8 月 15 日，英联邦的两个自治领——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告成立。丘吉尔事后欣然接受了印巴分治的现实。1949 年当尼赫鲁到伦敦出席英联邦总理会议时，丘吉尔宴请了他，两人从此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

当丘吉尔于 1945 年的大选中遭到失败时，他已经是 70 多岁的老人了。这一般来讲，如果一个政党在大选中被击败，人们总会归咎于党的领袖人物。但是这一次看来至少是议会中大多数保守党人都认识到，选民们不满的是这个党而不是其领袖个人。丘吉尔在以后的几年中也考虑了改进保守党的组织和方针政策问题。尽管总有人想把他替换下来，可是那几年中保守党的境况逐渐好转。1946—1947 年新党员增加了 22.6 万名；1947 年夏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保守党已领先于工党。一般说来，中产阶级人士已对定量配给制和各种限制措施感到厌倦。而当保守党发起一场新的征募新党员运动时，一年之内便完成了 100 万名的目标。到 1948 年 11 月在埃德蒙顿进行一场补缺选举时，很多选票转向了保守党，使丘吉尔备感鼓舞。

1949 年春，准备一场新的大选的时机已经到来。丘吉尔于 1945 年后期

指派的保守党研究室主任、原在战争期间任教育大臣的巴特勒，在这时候写出了一份详尽的政策声明，称作“不列颠应采取的正确途径”，丘吉尔为之写了序言并在公开演讲中对之大加赞扬。工党内阁也频频讨论何时举行大选最为合适，但艾德礼在初秋时节宣称，年内不会举行大选。

1950年1月11日，艾德礼宣布2月3日解散议会，2月23日举行大选。丘吉尔闻讯马上从度假地回来，为大选作准备。这次大选总的说来比较平静，丘吉尔最后在他的伍德福德选区仍以获得最多选票而当选，他的工党对手所获票数几乎只及他的一半。但是全国的投票情况在最后揭晓时表明工党仍是多数。最后下院的席位分布是工党315席，保守党298席，自由党9席。在这次选举中，丘吉尔的两位女婿——长女黛安娜的丈夫邓肯·桑茨和幼女玛丽的丈夫克里斯多弗·索姆斯——分别在各自的选区当选，可是他的儿子伦道夫却再度落选。

大选的结果使两大党都极为失望。保守党的力量有所恢复，但尚未恢复到能掌握多数席位的地步。工党虽然保持了多数席位，但席位数大减，是一个不稳定的多数，更何况工党的领袖们已经显得老朽了。财政大臣克利浦斯爵士于1950年10月因病辞职，1952年4月去世。接替他的是休·盖茨格尔，他是1945年才进入下院的新议员。1951年3月，贝文因心脏病不得不辞去外交大臣职务，4月间即去世。接任者最后是摩里逊，他对外交业务几乎一无所知。艾德礼本人于1951年也因患十二指肠溃疡而住了一段时期的医院。

两大党的席位数如此接近，按惯例在年内还得再举行一次大选，可是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战争爆发后，工党政府应美国的要求，从香港就近派去了一旅军队听候美国指挥。工党政府决定派兵是获得两党都同意的。不过丘吉尔认为，如果当时是他在掌权作出这一决定，他一定会遭到工党的猛烈批评。

1951年9月下旬，国王患病，肺部有肿瘤，必须动手术。在此之前国王已敦促艾德礼在秋季举行大选，以达到国内的政治稳定。因此议会于10月4日解散，25日举行大选。

这次保守党提出了两项在1950年大选时未提过的施政建议，一是征收军火公司超额利润税，二是每年建造30万栋房屋以解决房荒。欧洲统一问题大家已无兴趣，便不再提了。保守党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丘吉尔究竟是不是“战争贩子”。事情的来由是不久前因伊朗把英伊石油公司的炼油及其他设施都国有化而引起了英伊之间的争执。丘吉尔主张采取较强硬的路线。摩里逊质问丘吉尔是否认为政府应同伊朗作战。丘吉尔在10月6日的竞选演讲中答复说，摩里逊的质问是在散布谎言，说保守党想发动又一次世界大战。丘吉尔声称：“我确信，如果是坚强的保守党政府执政，波斯危机根本不会那样地发生。”他表明他并不认为有同伊朗作战的必要，也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不过如果大战打起来的话，他说，第一个扳枪机的无论如何不会是英国。

1951年的大选，工党和保守党双方势均力敌。这是第一次利用电视助选，但是由于电视机尚未普及，其能发挥的效用还不大。大选结果，原来工党的微弱多数转移到了保守党一边。工党政府垮台了。于是在1951年10月，年将77岁的丘吉尔又再度拜相组阁。外交大臣仍是艾登，财政大臣提升巴特勒担任。伊斯梅勋爵应邀担任了联邦事务大臣。麦克米伦任住房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负责每年建造30万所房屋的计划。国防大臣暂时由丘吉尔兼任，

等时任加拿大总督的亚历山大元帅任满回国后再由他担任。

这是丘吉尔第一次担任和平时期的首相。他面临的任務同 1940 年时大为不同。

1952 年初，丘吉尔上任不久就赴华盛顿与杜鲁门会晤，商谈的主题仍是如何加强英美合作。丘吉尔始终把英语民族的团结看作英国的主要依靠，而对欧洲防务集团之类兴趣不大，认为它不会真正有效，至于欧洲联盟，那更不是英国应当参加的了。丘吉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仍强调这一主题，呼吁美国帮助英国增加军事力量。《泰晤士报》驻华盛顿记者在报道丘吉尔的访美之行时说，虽然丘吉尔的行动比过去要迟缓一些，但是他仍“反应敏捷、消息灵通、思想丰富、语言生动，而且诙谐机智一如既往”。

1953 年初，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2 月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逝世，3 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面对着美苏两国都换了新的领导班子的形势，丘吉尔认为必须同美国新总统进行会晤。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于 6 月 2 日举行时，女王授予丘吉尔嘉德勋章，以表彰他对英帝国所作的贡献。

6 月 23 日，丘吉尔在宴请来访的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时，即席作了生动的发言。宴会结束时，他突然站不起来了。他得了轻微的中风，左边身躯出现麻痹症状。医生嘱咐他至少休息一个月，于是原来约定同艾森豪威尔在百慕大的会晤只能延期。

到 8 月，他才渐渐恢复。8 月 18 日他又主持了内阁会议，开始恢复正常工作。9 月他由女儿玛丽及女婿索姆斯陪同，去法国尼斯休养，9 月底回到伦敦。10 月初保守党大会在马盖特召开，丘吉尔发表演讲，获得很大成功。他在谈到他的去留时说：

如果我暂时还不离职，还在这把年纪负此重任，原因并非我留恋高位或大权，
这些我已消受够多了。如果我不走，那是由于我感到我可以通过已发生的事情，
对我所最为关心的一件事——缔造扎实而持久的和平——产生影响。

美英法三国政府首脑终于在 12 月初在百慕大举行了会谈。丘吉尔最先到达百慕大，迎候法国总理拉尼埃尔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会谈中，丘吉尔发现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并不是艾森豪威尔，而是他的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看问题的方式是非黑即白，他强烈反对举行“高峰”会议，反对同苏联新领袖马林科夫会谈。他先要法国参加欧洲防务集团，然后再考虑同苏联“和缓”。

1954 年 1 月的柏林外长会议就德奥问题而言并未获得成功，但一致同意 4 月在日内瓦开会解决远东问题，尤其是印度支那的战争。法国陷入了那场战争而无法自拔。日内瓦会议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后，终于使印度支那战争得以停止。但是当欧洲防务集团问题于 1954 年 8 月由法国国民议会辩论时，遭到了否决。原来打算建立的西方防务计划又落了空。丘吉尔为了完成他成为“和平缔造者”的理想，仍希望能同苏联领导人会谈。他见美国不愿意，便准备独自去会见马林科夫，但是马林科夫在 1955 年 2 月又下台了。

丘吉尔觉得自己已力不从心。他在 1954 年 3 月对巴特勒说道：“我感觉自己像一架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可我还正在寻找安全降落的地点。”丘吉尔知道他不久就该退休了，他不可能再参加下次大选，准备让艾登接他的班。

1954年11月30日是丘吉尔的80岁寿辰。除了家中按习惯为他举行了庆祝聚会外，议会两院也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了一次特别的祝寿会。全体议员向他赠送了一幅他的肖像画，仪式由反对党领袖艾德礼主持，大家还送了一只直径三英尺的大蛋糕。

他最后决定的辞职的日子是1955年4月5日。外交大臣艾登正在远东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丘吉尔立即召他回国。4月4日，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举行宴会，女王夫妇应邀参加。他向女王祝酒，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女王也向即将退休的首相祝了酒。4月5日中午，丘吉尔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下午4时30分，他便前往白金汉宫，正式提出辞呈。

5时许，丘吉尔搬出了唐宁街10号。离开前，他举行茶会招待全体工作人员，包括服务人员。当他走出屋子步向他的汽车时，全体人员都唱起了“他是个好伙伴”的歌。丘吉尔口含雪茄，伸出两指作V字状，向大家致意，在一片欢呼和祝愿声中，汽车缓缓地驶离了唐宁街。

安东尼·艾登就任首相后不久就解散议会，于5月26日举行大选。大选结果，保守党的席位有了增加，从只占17席的少数变成占58席的多数。丘吉尔在他的选区继续当选。不过他不像过去那样每次下院开会必到了，也不经常作他那著名的辩论发言。他的主要活动是写书，致力于几卷本的《英语民族史》的写作，还有旅行和绘画。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的军事行动遭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普遍批评。保守党内也对艾登这一决策不满。丘吉尔并非不同意艾登的政策，而是认为艾登考虑不周。而既然行动又半途而废，实在是大错。艾登本来健康已欠佳，受此挫折后遵医嘱休养了一个时期。1957年1月9日，他正式向女王提出辞呈，担任首相尚不足两年。艾登未推荐继任人。后来女王召见资深的保守党人征求意见，多数人推荐麦克米伦。丘吉尔也主张麦克米伦，于是麦克米伦继任首相。

1959年大选时，丘吉尔仍继续当选，但是他出席下院会议的次数更少了。他在85岁寿辰时继承了“下院之父”的荣誉称号。1963年5月他正式宣布退休。1964年7月，当时的首相道格拉斯霍姆提议，将下院对丘吉尔“对议会、对国家和对世界所作的贡献，所表示的无限敬佩和感激”记录在案。

丘吉尔的身体明显地虚弱了——需用助听器，腿脚不灵便，走路经常要人搀扶。他曾在1960年和1962年跌过两次跤。前一次在卧室内，跌断了背部一根骨头，躺了三星期。后一次是在蒙特卡罗旅行时在所住的旅馆中跌断了腿骨，上了石膏后，送回伦敦手术。

1964年11月他度过了90岁寿辰，女王赠送了礼物，新任工党首相威尔逊也来祝贺。他现在已失去很多兴趣，老朋友多半已故世，过去当议员时每天接触政治大事，现在都不接触了。他仅有的兴趣是饮酒、用餐、抽雪茄。但是到1965年1月9日那天，他生活习惯突然起了变化，不抽雪茄，也不饮白兰地。第二天他躺在床上，连对用餐都不感兴趣了。医生检查后认为他又患了一次中风，他逐渐陷入昏迷状态，接连14天毫无动静。1月24日早晨，他的呼吸逐渐停止，终于逝世了。英国政府立即宣布为丘吉尔举行国葬，时间定于1月30日。国葬的决定是七年前麦克米伦当首相时，由女王建议决定的。议会在此期间休会。瞻仰遗容时，排队等候向他作最后致敬的人达32

万以上。灵柩四周站立着守灵的军人，议会议长、三大政党的领袖、四位参谋长也都参加了守灵。女王和其他国家的来宾出席了隆重的葬仪。灵柩起运时，鸣礼炮 19 响，皇家空军的闪电式飞机举行空中分列式。最后的旅程是用火车运载到靠近他诞生地布伦海姆宫的一个车站。被邀随乘这趟火车的一位丘吉尔在战争年代的秘书莱斯利·饶文写道：

我从火车窗户望出去所看到的两个人物，生动地向我显示了丘吉尔在普通人民心中的地位：首先是在一所房屋平坦的屋顶上，有一个人身穿皇家空军的旧军服，向火车立正敬礼；离火车轨道几百码远的田野中，一个简朴的农民停下手中农活，脱下了自己的便帽，低头默哀。

丘吉尔比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活得更长久，因而对下一代来说，他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必然会令人产生过时的感觉。例如，种族平等，将亚洲人、非洲人和白种人同等看待，这就不是丘吉尔的思想。但他又不是白种人优越论者，他反对希特勒的排犹主义，认为凡是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他对英帝国的态度是维多利亚时代式的，他习惯于说“英格兰”，而较少说“不列颠”。在他的意识中，似乎苏格兰、威尔士，以及各自治领中的自治民族，都是以威斯敏斯特为中心的英帝国的一部分。

丘吉尔缺乏宗教信仰，这同他现代观点较多是一致的。然而，他并不反宗教，环境需要时也参加一些宗教仪式，但是并无个人的宗教习惯。他突出的信念是英国式的爱国主义，是对君主的忠心，对自己家庭和亲友的忠诚。当英王爱德华八世几乎被所有的人抛弃时，他仍给予支持。他敢于顶住外界的批评，按自己的信念行事。他一生有过多多次冒险的经历，可是仍不退缩。他能在危急时刻保持镇静，这一点在他 1940 年临危受命担任战时首相后，在纳粹严重进逼的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曾被很多人看作是“冷战”的先驱，可他也是西方世界在 50 年代第一个寻求并达到一定程度“和缓”的政治家。

艾德礼是他的政敌，但是两人的私人关系很好。艾德礼应《观察家》报的要求，对丘吉尔作评论时，把丘吉尔比喻为一只多层蛋糕，其中一层是 17 世纪、一层是 18 世纪、还有一层是 19 世纪，最厚的一层当然是 20 世纪，可是另外还有很奇怪的薄薄的一层，可能就是 21 世纪了。

艾森豪威尔曾在他当总统之前写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中对丘吉尔是这样看的：

他是一位很有威望的领袖。他具有英国人在困难时所表现的勇敢而坚定、在顺利时所表现的因循守旧的典型性格。他有非常强烈的信念，善于争论和答辩。……如果有一种信念和他的观点发生抵触，这时要想争辩过他确实是很困难的。……我钦佩他，也喜爱他。……他是一位对战争发展和军事史有深刻研究的专家，即使和他讨论纯专业问题，也不是毫无益处的。……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如果他不是那样伟大，他就会使我的工作更加艰巨；因此，尽管我对他的一些重要决定并不喜欢，但对他的一贯彬彬有礼和热诚支持，我始终表示无限感激。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丘吉尔活跃的一生跨过了英国历史的一整个时代。他最早参加的战争是用步枪甚至长矛作战的，可是他最后领导的战争却已用上了原子弹。他对历史和对现实同样重视，甚至对未来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非但不守旧，

而且力图创新，这和他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不无关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示的领导才能使他被承认为现代英国最显赫的政治家，名震全球的英国一代名相。在他之后，英国尚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这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